揭开周恩来面具

揭开周恩来面具

第 1 集－良心卖给魔鬼的两面派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 集 。田丰先生在他的文章 《面具后面的周恩来 初探》中说，“他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恩惠”。 他一生作伪，给自己争得短暂的名利，留给后人的却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国土。” 中共历届当权派把周恩来装扮成完人与尊神，是为了愚弄人民，以便延续中共的独 裁统治。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就是要还原周恩来的本来面目。这次节目的部分 内容来自胡平先生的文章《解读晚年周恩来》和田丰先生的文章《面具后面的周恩来 初探》”

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 1937 年大清洗时讲过：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怜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令人厌恶的不仅是斯大林及其帮手，也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杀害非党人士凶狠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恩来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 61 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 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伶，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 年 12 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 ’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向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 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 1966 年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对周恩来心醉神迷顶礼膜拜最甚的是一窝中共高干子弟，为了维系这一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刻意把周恩来塑造成一尊超凡入圣的偶像，念叨他“在文革浩劫中保护了大批老干部”。然而，从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可知，迫害老战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致死，制造彭罗陆杨冤狱等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他还指导专案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各该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四字。他亲自掀起与操控的“抓五．一六份子”运动迫害了数千万无辜民众，其中几十万人被折磨致死，几百万人因酷刑致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就是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

总而言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

周恩来外表温文儒雅，待人笑容可掬，接物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气，直到二〇〇一年，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做过十四个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巨册八十万言回忆录**证实周恩来曾于一九三一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卅七人分别掩埋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周的恩人(斯励)都逃不过他的毒手。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还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这一切表明了，这个被人为套上夺目光环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明哲保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行为凶残的滥小人。他不是浩劫中扶危济

困的善人，而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不是善于在政坛走钢丝绳的杂技大师，而是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派。

周恩来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还表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三次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喇嘛回国，说尽了好话，许尽了善愿。然而五十年代末，他下令残酷镇压抗暴起义的藏民，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六十年代中期他派遣红卫兵入藏“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甚至强迫班禅喇嘛吃屎。

周恩来把良心卖给魔鬼，还想要人民记住“恩惠”。他一生演戏作伪，给自己争得短暂的名利，留给后人的却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的国土。他以伪善的面目遮掩了阴险、狡诈、冷酷、卑鄙、自私、贪婪的真面目；他瞒天过海，耍尽浑身解数，欺世盗名，无所不用其极。

第 2 集－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剪影，剖析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 集，这一集我们给大家剖析一下“ 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

毛泽东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 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恩来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

来汪同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中共早期党员司马璐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司马璐，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

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还有一件怪事是在 1943 年 11 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网上另有一篇文章“我亲眼见过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说，文革时期在看电影时，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纪录片中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下跪。为什么出现下跪的镜头？那是毛周接见外宾以后，当外宾走后，周恩来双手托起外宾送来的礼物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坐在那里，而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的地上，双手托着外宾留下的礼物， 翻译王海蓉就站在旁边。我那时还小，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新社会还有下跪的事情，只有在反映旧中国和古代题材的戏剧电影里才见过下跪的场面，所以看到周总理下跪，觉得不太对劲。现在想起，当时做为年轻人的王海蓉，为什么不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礼物，代替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只有一个解释：王海蓉熟知周恩来的习惯，知道她不可能代替周恩来下跪。

万润南先生在“《清华岁月》:周恩来和清华文革”中对有这么两段描述，

“1966 年 8 月 18 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少奇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胡平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还有这样一段评述。胡平先生说，有些人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周的表现只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绝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 “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是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 --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決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朝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中共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正像大纪元专栏作家唐子先生所说，如果确定毛泽东就是中共里的一号魔鬼，二号魔鬼非周恩来莫属。中共所以能把中华搅乱八十多年，基业就是这两魔奠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没有周恩来，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成功。所以中共有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之说。对于中共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天魔，周恩来是人鬼。

第 3 集－支持毛江结合,助江坐稳夫人交椅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 集。中共一直把江青塑造成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凶狠的敌人。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是怎样在延安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在重庆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的婚礼，并多次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的。

支持毛泽东和江青结合

周恩来对于江青，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我已经仁至义尽。" 江青当年刚进入毛泽东的窑洞，引起中共高层各方非议，认为毛以党的领袖之尊，将经历长征共同患难的妻子贺子珍赶走，炕头尚温，就公开与上海影星同居，成何体统？只有极少数人支持毛、江的结合，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康生，他提供来自特工系统的调查证明，江青在白区"表现清白"。他是山东诸城人，江青的老乡，传说在家乡做少爷时代就和她"有一腿"，查无实证。他的支持除了老乡情谊，主要是投毛所好，有向新主子表现忠诚的意思。另一个是贺龙。他扬言"堂堂主席，搞个把女人算什么！"但真正有力支持者还是周恩来，正是他调和各方意见，力排众议，铺设堂火，毕竟成了他俩的好事。否则，便不会有日后权倾朝野的江青同志了。周恩来的出发点是否比康生要高尚一些？看不出来。

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前，江青与毛泽东经常发生争吵，斗气。无非生活习惯的差异，鸡毛蒜皮本是夫妻间难免的事。但双方的个性都极强，闹到各不相让，

江青便只得找周恩来哭诉，由他出面调解、劝说，让毛泽东化怒气为春风，让江青破涕为笑。正如当初异口同声地反对，中共中央机关从最高领导层到一般警卫、秘书，没有几个从心理承认和瞧得起这位夫人，只有周恩来对她待之以礼，不含半点歧视和轻蔑。这给心性敏感好强的江青以极大的精神慰籍，使她逐渐化解敌意环境带来的伤痛，重新建立自己的形像和自尊、自信，终于等到二十年"约法"到期，一跃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周恩来在毛、江家庭关系上做好事，充当黏合剂与稳定剂的作用，绝不仅仅在延安时代，而是持续到建政以后，甚至文革期间。都说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管家"，管家管家，毛的家他不管谁管？

力助江青坐稳第一夫人交椅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首谈笑古今、暗含霸王之风的《沁园春. 雪》，争取了天真的第三党和文化界的众多知名人物，以为寄托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在其后三年的国共争霸战争中，感情倾向多在共产党一边，形成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的局面。毛泽东此行，周恩来功不可没就不须细说了，单说他派专机从延安接江青来重庆"治疗牙病"一节，就可知他的煞费苦心。这是江青首次以中共第一夫人的身份公开亮相，为了是这一身份合法化，周恩来在张治中的寓所为毛、江二人补办了盛大婚礼，江青后来经历了贺子珍回国、癌症、更年期、老年色衰等动摇"夫人"地位的重大危机，而每一次毛都终于放弃"废后"的念头，与周恩来当年安排的这一婚礼既成的影响不无关系。

一九四七年，贺子珍带女儿娇娇随王稼祥夫妇从苏联回国，暂居哈尔滨。江青大为紧张。因为他曾接受的"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就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毛、贺的"夫妻关系"，一直到死都"没有正式解除"过。一九四八年冬，贺子珍的妹妹、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遗孀贺怡找到毛泽东，闹着要为姐姐讨一个公道。毛让步，同意贺子珍回身边，说"还是按中国老传统办吧！"江青深感会要做"小老婆"甚至被休掉的威胁，又跑到周恩来那里一顿哭诉。而周也再一次施以援手，以组织名义作出决定，不准贺子珍进京与毛泽东会面。

贺怡在哈尔滨接姐姐和侄女娇娇，乘火车走到山海关，被自称"组织部来人"的两个男子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阻止他们到石家庄。结果，贺子珍被安排到了沈阳，而由贺怡带娇娇去见毛泽东。娇娇后来竟从江青的本姓改名为李敏，更确定江青的继母地位。由于周恩来的悉心部署，贺子珍一直未有机会进京复辟。直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才由毛泽东另一弟弟（毛泽民）的遗孀的后夫、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的秘密安排，将贺从上海接到山上与分别二十年的毛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此时的贺子珍，已是一位满头华发、容颜憔悴、语言迟钝的老妪，毫无吸引力可言了。连毛泽东也暗自惊诧："她怎么变成这般模样？"

江青最信得过的大好人

这里要补述一段的是，性情刚烈泼辣的贺怡，见到姐姐被弃、大伯子兼姐夫的家庭重组已成定局，心有不甘，于是想出最后一招，到江西寻找毛泽东与贺子

珍所生的儿子毛岸红。这是毛的第四子，毛岸红小时活泼可爱，模样酷似毛泽东。一九三四年中共中央红军撤离江西长征逃窜，年僅两岁多的岸红托给了留下打游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一次战斗中，岸红被寄放在一个农民家里，后来失去了联系，而毛泽覃也在瑞金红林山区阵亡。江青无子，毛长大成人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争，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贺怡深知这个可以找到的儿子对于恢复姐姐的名分的重要性，她又是唯一知道毛岸红线索的人，于是一再深入江西农村寻找。谁知突然的一场车祸，贺怡死于非命。这唯一的线索就此中断。这场车祸完全是意外，还是缘于某种周密的安排？有待新的史料证明。

周恩来的恩惠，江青当然不会无感于心。从她一进入中共最高层的生活，就把周恩来当作最可以信赖、最善解人意、最能排忧解难的好人。毛泽东说， 江青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其实不对，周恩来就是一个好人。”

接受中共高层的"约法三章"后，江青过了好一段夹起尾巴做人的日子。她放弃了马列学院的学习，放弃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演剧安排，收敛起好表现、出风头的性格，专心一意地为毛泽东烧饭做菜，洗衣浆衫，甚至缝缝补补。言谈举止也一改先前的"都会明星味"，而变得朴实大方，待下人也和蔼友善。这是很自然的，她不想永远被孤立、被当作众矢之的。只有在周恩来面前，在这个经常往来于大都市重庆与山沟沟延安之间、身上总带着那么一股城市味的中年男子面前，她才敢彻底放松自己，而不必顾忌使对方侧目。

周恩来对江青的吸引力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周恩来到毛的窑洞谈工作，毛请周代他到中央党校演讲，在家闷得发慌的江青一定要跟着同去。因延河涨水不能开车，于是骑马而行。小路狭窄，江青策马在前飞奔，周恩来紧紧跟上，不料江青忽然勒马一个亮相，周的马骤然受惊，后腿直立，将周摔下马背。撞在石崖上，造成右肘小臂下端粉碎性骨折

骑术精湛的周恩来，怎么会摔得如此狼狈？文革后有人追溯这段往事，把它解释成江青对周心怀怨望，故意使出手段给他一个下马威。其实不确。江青刚入毛的帷帐，毫无根基，连窝都没呆热，岂敢向堂堂的周副主席故意使手段？何况她对周恩来的通情达理，十分信赖、敬重乃至倾慕，若说是心怀什么"愿望"还差不多，哪有一点"怨"的影子？往最坏处说，她也只不过是想抖一抖御马的功夫，展现一下矫健的身手和勃勃英姿，给周恩来一个美好的印象，原因还是出于一种爱慕的心理。

江青当时才二十五岁，久经情场风波，最后嫁了个比她大二十一岁的毛泽东，虽说是一代枭雄，二人恋爱也完全自愿，还冲破重重阻力与世俗偏见，毕竟带有青春与权利结合的影子。如果毛泽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很难想象她会爱上这个满嘴浓重湖南农村口音、满头油渍的长发、脾气火暴、抽烟、吃茶叶、嗜好辣椒和肥肉、经常拉不出屎的南方土包子。周恩来生于南方而成长于北方，比江青大十六岁，曾赴东洋、西欧，到过苏联，表面上比较尊重女性。对生长于北

方、个性开放好幻想、喜欢读外国小说、从事文坛工作出身的江青有很大的吸引力。

只是，她的第一次"示爱"——说得重一点是调情，说轻一点叫"示好"，就闹得人仰马翻，伤筋动骨，实在晦气。这应该是一种预示，在诡谲多变的中共政坛上，这样的非分之情将带来怎样惨痛和震撼！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右臂终生不能伸直，也使不上力，等于废了半只手。

侍卫士们赶到，他已经从摔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痛得脸色苍白，冷汗直冒，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倒是毛泽东事后大发雷霆，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一百个江青也不抵我一个周恩来！"对江青惹的祸极为恼火，因为他痛惜在国共关系中举足轻重的周恩来的受伤，倒不是怕江青敢红杏出墙。文革后期，江青对周恩来的怨望（真正的"怨望"）日深，力图倒周，指使御用写作班子在报上撰文批判"鲁国的宰相"孔丘，故意在孔的形像上加了"端起胳膊"四个字，以影射周的弯臂。而那弯臂，实是当年因爱而造成！

曾大量采访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作家权延赤记述，在延安"江青喜欢接近周恩来，当年的卫士们都知道这个情况。"毛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江青很倾慕周恩来，常不避嫌地对身边人员说，周性情好，谦恭有礼，风度翩翩。她还希望毛泽东向周学习，改掉粗鲁的农民本性，惹得毛大为光火。

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赵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第 4 集－周恩来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是怎样在文革中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的。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赵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决策并亲自发动的。一开始，周恩来并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矛头对准谁的运动。他只知道毛主席说的就要照办，邓小平时代批判"凡是派"，其实最大的"凡是派"就是周恩来。及至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他还不晓得到底是指谁"何其毒也"，惴惴不安地去探毛的口气，听说不是自己，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文化大革命，协同毛派力量推波助澜。

文革过来的人都记得，当时人们心里很清楚，这几个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绝不能炮轰和揪斗的，他们是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这种印象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凡在文革初期贴大字报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造反派，当即都受到"上面"授意的有组织的反击、围攻和批斗，事后必遭严厉的处罚、关押、劳改、判决直至枪决。炮轰周恩来和炮轰林彪、江青一样，其他诸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都会集体出场表态，厉声申诉，威逼利诱，迫使对方就范。唯一的区别，文革结束后所有

参加炮轰受到迫害的人都被不同程度地平反，只有反对过周恩来的人永远不能赦其罪。

文革的首要目的是倒刘，并清除刘在党政系统的势力。目标一定，"毛司令部的人"倾巢而动，共同完成这场战役。除了副统帅林彪很少露面，几乎只跟随毛泽东出场外，其余如周、陈、康、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爬虫们"，到处看大字报，视察、演说、计划、接见、会谈、表态、劝慰、阻拦、发布指令拉一派打一派……。为文革依照毛的意图朝纵深发展竭尽全力。有人说周恩来没有参与政治迫害，他所做的都是保护别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中共中央"四人帮专案组"在搜集罪证时，也发现文革冤案中几乎所有的逮捕令，都是由周恩来签署的，包括逮捕前面说到的他的养女孙维世。另外，所谓"共和国最大冤案"的受害人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身份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文件，也是由周亲手签署的。这一事实让专案人员"震惊"和难以接受：周恩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做的这一切是真诚还是虚伪？（阮铭《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

江青由一个宣传部被人瞧不起的副处级干部出山和坐大，固然获得毛泽东的支持与肯定，但毕竟还得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来逐步完成，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数。否则，他也就完全没必要耗神费力发动这样一场大的战役，来歼灭他的政敌了，也不会在背后里怨林彪"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六句，相当于六万句，半句也不顶"了。

江青得中央文革副组长的显赫位置，并挟其势取代中央书记处，甚至凌驾于政治局之上，周恩来出的力最大。试想，林彪名为副统帅，实际影响只在军内；陈伯达、康生原先的地位也远不及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他们怎么可能把江青抬得比书记处还高呢？能依照、实现和发挥毛的意图，把江青稳稳地捧到这样一个地步，只有周恩来。

　　康生，尤其是陈伯达，对江青的公开吹捧诚属过火：周恩来居然也站出来"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就更叫人肉麻。康、陈二人都是投靠毛泽东，凭籍揣摩毛的思想登升高位的，从感恩戴德的情分上，总还有一种说法。周恩来功高位显，驰骋政坛数十年，影响遍及全世界，凭什么要向江青表衷心？研究文革的学者们，往往只记录下康、陈这些百经官方定性的"反派角色"，而将周恩来这样的圣人的言论偷偷剪掉，藏起来，好仍人们忘记历史的真相，忘记周恩来是怎样在人民大会堂前振臂高呼："誓死捍卫江青同志！"

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

这里记录一段周恩来当年的公开讲话，以为见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誓师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特别是三十年代她最初当了中国共产党

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份子、国民党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有鲁迅那样硬骨头的勇敢，对迫害、压迫、诋毁、诽谤、污蔑的人进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

前章曾提到，文革初期周、江之间也有过摩擦和矛盾。就在周发表这段演说前 十几天，江青还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争吵："孙维世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狼，成元恭是你周恩来养的一条狗。"江青的骨头可真够硬的，迫使周将成元恭这位延安时代就跟了他的警卫员送去进学习班、五七干校，直至周死后才返回北京。

如果说这就是周恩来与江青进行的"斗争"，那也太可怜了。多少有些迂腐之气、被称为"老夫子"的陈伯达，也和江青有过观点之争，但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亲密关系。即连康生，也曾在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国宾馆大骂江青不是东西，逼得"老夫子"要自杀。他后来还在临终前叫毛泽东的女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去告诉毛：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这同样也不能证明，康生与江青关系不好、进行过"斗争"。能证明的只是这样一条政治学的重要原理，即"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周恩来的确保护过一些人，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他的人马，包括他的部属、与他多年相交的"民主党派"人士、与他亲近的文化界人士、他在军队和地方的心腹亲信，还有一部分是可以争取和收编的别的派系的人马。不过有一条原则绝不能违反，那就是毛泽东、林彪、江青一定要打倒的人不能保。不但不保，有的还要落井下石，甚至直接进行迫害。

文革派其实都保护过人

在一场全民性的、几乎人人过关的大灾难降临之际，凡是身居要职、权倾一时又胸怀大志的人物都有可能出面保护一些人，因为这是收买人心、扩充势力的最佳时机。如林彪，就出面保护了被整得呜呼哀哉的黄、吴、李、邱，还有空四军的政委江腾蛟之类，这些人对林彪自然感激涕零，宣誓效忠，成为其死党。就连毛泽东也是保护他人的好手，"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就是他说的，这句话所起到的保护作用，比周恩来高喊"你们要抓陈毅，请从我身上踏过去吧"要有力的多；后者只是阻止了这一次揪斗，前者才使陈毅终不被彻底打倒。

毛泽东还保护过朱德："谁说朱德是黑司令？他是红司令嘛！"延安时代还保护过许世友，这位身怀少林武功的将军后来死忠于毛，镇守一方，令林彪势力不敢妄动。江青也保护过人，没有她的保护，曾划为右派的剧作家汪增祺怎能进样板剧团改编京剧《沙家邦》？ 没有她出面"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那么多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造反学生，怎能那么快得以平反？

江青甚至出面保护过陈毅。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晚，她与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造反派，亲口称赞陈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比如陈毅同志，说错话，写过一些诗，说话说过头也有，我甚至可以当面同他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他都说，这是好的。从整个历史上讲，他也有错误的。他和你两人可以争得脸红脖子粗。…..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们不能去，

他们有很多工作。我对陈毅以前不太喜欢，最近几年看他很坦率。广州会议他说得不好，说过了头。一九六二年夏天他就做过检查。现在也是。他历史上有很大的功绩。比如新四军，项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一万多人装在人家口袋里，这是我党一件奇耻大辱。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路线，重新发展成二、三十万人。"

周恩来保护高干及其子弟

旅英女作家张戎在她的自传作品《鸿——三代中国女人故事》一书中，详细记述了她母亲进京找周恩来，寻求政治保护的一段往事。张父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时期遭到省委新领导逮捕。周恩来在接见完四川红卫兵代表后，仔细听完了张母的申诉。"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留心这件事，"张戎说，"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面对着进京告状的红卫兵，周只讲些"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要大联合"、之类的普通应酬话，一听到"高级干部"受压，却立即差人取来国务院抬头的公文纸，亲笔写了一张保护性质的字条。

　　除了保护"高级干部"，还保护高级干部的子女——俗称"高干子弟"。以高干子弟为主要成员的红卫兵，当发现革命浪潮汹涌而至，被冲击的首要目标竟是他们自家父母时，被惊的目瞪口呆。失落感、使命感、优越感，混杂着强烈的不满、愤怒、恐惧与惶恐，使他们纠集起来铤而走险，组成红色恐怖组织"联动"（党政军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私设刑堂、水牢和劳改所，任意打死、打伤和打残"黑五类"，像"暴走族"一样呼啸街头，一再冲击中共公安部。联动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数百名骨干分子被逮捕，其罪行公之于众。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经毛泽东批准，很快即将他们释放。周恩来接见他们时讲话："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而正是这位周恩来，在听到如遇罗克一类非高干出身、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的"反革命案"时，就不把他们划为"党和人民的孩子"了，毫无同情之心下令处决，以绝后患，如湖南大学数学系青年讲师、被指为湖南"省无联"黑手、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陈光弟，案报国务院请示周当即下令秘密处决。

第 5 集－周恩来是“红卫兵”恐怖行动的支持者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5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和周恩来是怎样在 1966 年夏策划和支持北京市“红卫兵”恐怖行动 的。这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宋永毅先生文章““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了解一些“文革”历史的中国人往往认为，1966 年 8 月发生在北京市的“红色恐怖”只是由中共高干子女组织的第一批 “老红卫兵”的过激行为。这些“老红卫兵”在校园里以“批斗”为名杀戮教师；在社会上以“抄家”为名抢掠市民的财产，以“阶级斗争”为名残杀所谓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为名，把

近 10 万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仅据官方非常不完整的统计材料，当时至少有 33,695 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抢掠，有 85,196 人被驱赶出城。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都市蔓延，多达 40 万的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或边远地区。

然而，后来披露的一些历史档案表明，这类的“遣返”行动其实是中共早在 1962 年就开始安排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文革”前担任市长的彭真就公开讲过，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所谓“成分不好”的居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 年 5 月 15 日，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 通知”发布前夕，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刻上书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付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

5 月 16 日宣布打倒所谓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后，这个工作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 5 月 18 日起调 63 军的 189 师和 65 军的 193 师进驻北京各要害部门及所有的宣传机关之外，工作组还有一个长期计划，即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驱逐所谓的“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八月”当中“老红卫兵”任意对北京市约占居民 2%的人抄家、杀戮、遣返，不但未被中共当局阻止，相反还得到了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上述“首都工作组”的副组长、公安部长谢富治当时曾公开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那些事”（指“红卫兵”的乱打乱杀），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

下面通过两个案例，说明中共国家机器和周恩来，谢富治当时是如何指导或参与“文革”中的暴力与屠杀事件的。

案例之一：在北京市 1966 年“红八月”期间大红罗厂南巷 20 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血案中，韩模宁一家五口被与其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残杀身亡，据国内学者调查，将这些“红卫兵”引到韩家行凶的是当地派出所的民警罗某。[6] 负责当地治安的片警敢于领人行凶杀人，且血案发生后听任凶手扬长而去，这肯定不是民警个人的自行决定，他显然是奉有上级指令的，否则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那么罗某背后是谁呢？答案不言自明。

案例之二：1966 年 8 月 25 日，北京第 15 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去广渠门大街 121 号的房主李文波（小业主成分）处抄家，这些杀气腾腾的女“红卫兵”们翻箱倒柜、掀开屋顶，殴打李文波、刘文秀夫妇，逼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枝、黄金”，甚至还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在忍无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于是被当场活活打死。据一位大陆学者的调查，又是当地的片警和居委会把那些女“红卫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凶的。

该血案发生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为“反动资本家对红卫兵行凶”；接着周恩来又下令，由北京市法院于 1966 年 9 月 12

日以“行凶杀人”的罪名将李文波之妻刘文秀判处死刑。其实，就连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都没有说刘文秀本人有 “行凶杀人”行为。此后，周恩来还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护“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这样，“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行为就得到了国家机器的直接指导、支持和保护。得到政府鼓励与支持的“老红卫兵”们更加肆无忌惮了，他们竟然把迫害、凶杀案件誉为反抗“阶级敌人的报复” 的“洒碧血”事件。接着，“老红卫兵”们以打击“阶级敌人的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疯狂的杀人高潮。李文波夫妇被害血案在 1981 年已经被平反，但无论是当时参与行凶的“红卫兵”，还是公开动用国家机器为“红色恐怖”助威的周恩来，谢富治都未承担任何责任。

“红八月”期间在北京主持杀戮行动以及驱逐近 10 万城市居民的臭名昭著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是在周恩来的 “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是由周恩来的亲信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许明（国务院付秘书长）、李梦夫等人修定后公布的。不难看出，中共上层和周恩来早已决定了所谓的“净化北京”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计划，而 1966 年 8 月“老红卫兵”不过是打头阵的法西斯式“冲锋队”而已。

由于被强行抄家、殴打和驱逐的近 10 万居民不断上诉，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布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中共 中央 1967 年 101 号文件将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这一文件转发全国。这一“通告”仍然声称，所谓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后表现不好的）”、“查有证据漏划的地富反坏份子”、“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房产主”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等不得返回北京。由此可见，对北京市居民的抄家驱逐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和预谋，并非“红卫兵”的一时过激行为。

有一种说法不加分析地把文革时期的社会成员说成是“人人有罪”、“人人有错”，这是十分荒唐的。“文革”中至少有一个社会群体，可以说是根本无罪，甚至没有 一点错，却无端地遭到残杀，他们就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政治贱民”“黑五类”或“黑七类”。如果按照中共的习惯表达，以总人口的 5%来估计其人数，“政治贱民”的总数达 3,000 至 4,000 万人。从 1949 年以后直到 80 年代初，这些“政治贱民”一向被视为所谓的“阶级敌人”，从来就是中共的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绞杀对象，在“文革”中则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无论是“保守派”群众团体还是军队及其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在对“黑五类”大开杀戒时都从不手软。尽管中共的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保守派的主要成分）明明知道，“文革”时期的“法律”（如 “公安六条”）严格禁止任何“黑五类”分子参加群众组织，而这些“政治贱民”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从不参加“派性斗争”，但军队、公安、武装民兵及党团骨干仍然不遗余力地杀戮“阶级敌人”。这种屠杀行动不仅是为了表现杀人的政治“优越地位”和“正统性”，也是为了向上级邀功请赏。对“政治贱民”的迫害屠杀是中共长期以来制造“阶级斗争”以维持“红色恐怖”政策的延续，在中共建立的“血统论”政治意识影响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类”看作是政治对手（如某些“造反派”组织）的“社会基础”，借屠杀“政治贱民” 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

“文革”中发生了这么多惨绝人寰的屠杀案件，中共的最高领导者、“文革”发起人毛泽东是否知情，他对这些暴力和杀戮行动的态度究竟是什么？由于“文革”档案至今仍被严密封存，现代史研究者至今无法看到毛本人对这些大屠杀事件的具体批示。而不少中共的官方回忆录都说：毛一直反对武斗和暴力。事实上，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自 60 年代就开始准备把北京市近 10 万“黑五类”强行驱赶出北京，毛显然不可能不知情；而周恩来 1966 年建立“首都工作组”的计划是经毛批示同意的。在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中，毛虽然也讲过“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同时他也表示：“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17] 毛的这一讲话当年在施虐一时的“红卫兵”中曾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暴力和杀戮如“星星之火”般地在中国“遍地燎原”，自然就毫不奇怪了。

虽然 10 年“文革”中的许多类似案例仍被官方掩盖着，仅凭上述案例仍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文革”中的许多著名的暴力屠杀案件完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有些甚至是当局的决策。无论是毛泽东、林彪还是周恩来、叶剑英，在领导这一国家机器吞噬无辜公民时是完全一致的；尽管他们的看法会有差异，对某些高级干部或平民遭到打击会有不同态度，但在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和残杀“政治贱民”上，他们并没有分歧。其次，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大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因当年“表现积极”而受益。由此可见，把“文革”中暴力杀戮事件的责任一概推给“四人帮”或符号式的所谓“造反派”， 既非史实，也严重地扭曲了国民的集体记忆。

2001 年 7 月在纽约召开的“纪念‘文革’发生三十五周年”讨论会上，一位在美国长大的年约 14 岁的华裔中学生听了北京 1966 年秋天的“红八月血案”后提问：“当时的北京有没有政府？是谁允许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问题的答案很明显，让这些‘老红卫兵’杀人的，是中共当局、是毛泽东、是周恩来。

第 6 集－中共是怎样编造文革中周恩来的表现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6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是怎样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的。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宋永毅先生的文章“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象”。

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周恩来传》（四卷本）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是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 “历史著作”。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剪裁者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貌。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

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恩来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中共关于周恩来三本史着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

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说，

“（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 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 并说，“（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周恩来《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

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着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周恩来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说，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

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

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5月4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8日到１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书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着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5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

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５．１８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

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于周恩来第一个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立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开始。

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１９８０年3月２０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

第 7 集ー跟毛泽东比私生活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7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张若名。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赵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妻妾的人数是遥遥领先的。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逝。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 67 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廷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如果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后再结婚，就属于正常的婚嫁。中共领导人中另一种婚嫁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领导人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补空白。前妻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她坚决不肯过黄河，要陪毛泽东在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周恩来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历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分得比较清楚。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是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么样，动不动就要"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于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为的作风。人们认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像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殴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看来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

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 看来北洋军阀还不能控制法院。

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 Bordeaux 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实际上刚到欧洲的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 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离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尘和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而死。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第 8 集－私生子？孙维世死亡的内幕!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8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旅欧期间的荒唐和孙维世之死背后的内幕。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赵 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访问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然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这位德国女子"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钟编《周恩来批判》第 183 页）

一般而言，盛传的事如果没有可靠证据，不能作为定论。但中国的事情较为复杂，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小道消息往往并非空穴来风，而且比正常渠道公布的官方报导更令人可信。

这里可以一说的是孙维世。她是一个"奇女子"，而且也的确是周恩来生活中的一个值得一提的女人。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老战友、中共的烈士，一九二七年"清党"时被国民党处死。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岁的孙维世和哥哥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人员见年纪太小不允，她竟当众大哭，张口就要找最高负责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认出了他们兄妹俩，经邓颖超同意，收她为干女儿，并送往延安。不久，她在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中担任女主角，大获成功。而也是刚到延安不久的上海影星蓝萍（江青），只在此剧中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怎么的。

那么孙维世的故事更像莎士比亚的宫廷悲剧。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义女送到延安以后，颇是出过一阵子风头。她不仅在话剧《被蹂躏的人》中一举击败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还轻轻巧巧地夺走了她的未婚夫。失恋的蓝萍只得钻进树林，拉了一夜的二胡，尔后擦干净身上的树叶与泪痕，义无返顾地走向那伟大窑洞的热炕头。孙维世仗着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很快取得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朱德等诸位中央领导住处的特权。这特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养臂伤，孙维世在专机起飞前吵着要同去。周恩来说："要去，也得经过组织批准。"孙维世一听，策马飞奔赶到枣园，求毛泽东批准。毛笑着签了个字。孙维世兴高采烈，高举着毛的指示又策马赶到机场，穿一双草鞋登上了飞机。

这位传说与四位巨头（毛、朱、周、林）有过瓜葛的奇女子，其实并未犯下"淫乱宫廷"的大过。周恩来是她的义父。朱德是他父亲孙炳文生前的好友，当年同在德国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他的哥哥孙泱当过朱德的秘书。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曾向她求婚，但是被她拒绝了。毛泽东是唯一一位嫌疑最大的人物。

孙维世与江青这次不经意的交锋，使江青永远结束了演员生涯，也与孙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埋下三十年后将孙置于死地的伏笔。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了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泽东赴苏联时，她被选为第二译员。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浑身赤裸死在监狱的一堆干草上。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她死于江青的迫害。但是，江青即使与孙维世有仇，为什么一定要置她于死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够置她于死地？须知孙维世也不是个一般角色，出身、背景、关系都是相当当、硬邦邦的，和文革打击的重点目标刘少奇、邓小平亦无瓜葛，而周恩来居然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养女？

电影《周恩来》中描写道，一天深夜，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看一份材料说"叛徒孙维世死在狱中"顿时怒不可遏，愤怒地派人去清查。似乎想表明，孙维世受到诬陷、迫害，周是不知情的；同时暗示，这是江青一伙打击周恩来的行动步骤之一。事实上，从文革一开始直到林彪垮台前，周恩来与江青的关系一直甚佳，配合默契。虽然也有一些认识和行为方面的偏差，乃至有过一些小的摩擦，实际远不及江青与林彪、甚至江青与陈伯达之间的矛盾那样激烈和公开化。

但经过后人的夸大和改换性质：周、江之间仿佛一开始就形同水火，不可调和，这是不合乎史实的。

曾任胡耀邦理论助手的中共学者阮铭，在周恩来逝世一年后查证"四人帮"罪行时，赫然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他自己的养女孙维世。这就证明了，孙维世的死，周恩来要负很大的责任，绝非事前毫不知情。说得严重一点，——但绝不过分，——他也亲手参加了对孙维世的迫害。那么孙维世与周恩来、江青之间，究竟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恩恩怨怨？

江青在文革中必欲置孙维世于死地而后快，原因是延安时孙以"周副主席养女"的身份，抢了她的头彩，有不经意地夺了她的未婚夫。虽说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毕竟失马之痛难以心甘。加之孙维世是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在毛、周、朱面前撒娇卖乖、软磨硬缠惯了， 恃宠而骄，向来不把江青放在眼里，终于引出杀身之祸。孙维世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是周恩来，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周恩来签署文件将她逮捕入狱。这是什么缘故？

艾蓓女士的《叫父亲太沉重》中 ，透露出其中的秘密。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恭候总理大驾，特意请他过来处理一起"严重事件"——一批从孙维世家抄来的照片："你几次派他出国，凭什么？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是个什么东西？是苏修特务！"

"有证据吗？"周恩来沉着地说。

江青拿出一揽公安部的材料。

"你事忙，材料我带回去看。"

这时江青的秘书近来报告："您请来的秘书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

江青："快请她进来。"

周恩来正要走，忽然见到来客，——竟是"安然"！

"总理，不用介绍了吧？"

周恩来赶紧与"安然"打过招呼，寒暄几句，然后告退。

江青手上的材料，有孙维世整"安然"的揭发信，内容无非是对（朝鲜）战争的害怕，在战场上见到"血与兽性"等等。更有公安部搜集的孙维世在国外的一些言谈举止，包括与苏联各色特嫌人物的交往。 周恩来权衡利害，亲笔批示将孙逮捕。

安然是什么人我们将在下集向大家介绍。

第 9 集一《叫父亲太沉重》(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9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 介绍艾蓓女士的著作《叫父亲太沉重》出版后的风波。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和赵无眠先生的文章《真假周恩来》。

一九九四年三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总第二十期），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副标题是“周恩来与神话的终结者：艾蓓”。

孔捷生的文章说，“在黑箱里封存了太久的秘密， 一个个神话的碎片，覆没于共产主义阵营的瓦砾之下，成了本世纪最具文史价值的殉葬品。其中若干片段，内蕴着那个逝去时代的最隐秘的信息密码，它们从未和日光 ——甚至是空气接触过。然而，在世纪更迭之际，它们被发掘出来脱魔解咒，实系迟早的事。

自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仅仅一年》的轰动退潮之后，这个世界已沉寂得太久。突然之间，地平线倾斜了——齐奥塞斯库家族，金日成家族，昂纳克，卡斯特罗非婚生的女儿，毛泽东的私生活 ……。二十世纪末是一个解咒年 代。现在，历史学家的手指将要触摸到最后一个"黑匣子"了。

周恩来，褪色的神话仅存的一尊偶像。它的油彩虽渐渐剥落，却仍屹立不倒…. ….殊不知，神话的终结者现世了——她，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一个在黑匣里封存了太久的秘密，一段长达三十余年的血泪时光，凝结和聚变成一部长篇——《叫父亲太沉重》。”

《叫父亲太沉重》书中写到，

"因为这本书，如果你永远回不了国，你是受不了的。"有人对艾蓓说。

"大姐活不了多久了。"艾蓓回答说。

"不光是大姐，党内有一批有权有势的老人，他们也不会容许你写这本书的。"有人又说。

"事情会变的，社会主义阵营都瓦解了嘛。"艾蓓又回答说。

"结论太早，中国不一样，老一代的势力还很大，否定社会主义等于否定他们的一辈子。"有人又说。

"你也这么精熟政治？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想写一个人，写一本书。" 艾蓓又回答说。

《民主中国》杂志以独家版权拥有的方式发表了艾蓓的多张照片。她长得的确与周恩来有几分相象，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稍淡于周）。大眼……

书中，周恩来曾搂着十五岁的作者，脸贴脸地对着镜子："你看我们的眼睛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嘬嘬嘴…"

该书一边行销，一边引来无数的批评。不断有人出来叫阵：要艾蓓把证据掏出来瞧瞧！曹长青先生，在《世界周刊》上发表长文，分开质疑艾蓓身份的真伪。连带为该书称好的作家孔捷生，和私下为艾蓓辩护的诗人北岛，也受到曹文的嘲笑。曹文要求艾蓓拿出证实身份的证据，比方，现代科学这样发达，她完全可以做亲子血液测定嘛！她敢不敢？

"问题是，"孔捷生反诘，"谁来做这个测定？"

是呀，谁来做这个测定呢？你当然不能期望，从中共政府那里得到周恩来的生理组 织标本，这是一；第二，即使得到这样的标本，是在中国做还是在美国做？

这时，中共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却发表了一张艾蓓的照片：年轻时代的艾蓓，一个安徽偏远山区的农村姑娘，站在她的母亲，一位满面皱纹的乡下老太太身边。新华社说，这位所谓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出身微寒、却不肯认自己的亲娘、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势力鬼。

但是，中共新华社的信誉，或者说代表中共政府立场的中共官方新闻机构的信誉，并不是那么良好。这张照片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照片上的"艾蓓"，与《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显然不是一个人。农村姑娘"艾蓓"头骨较高，脸较短，下巴较尖，也不是嘬嘬嘴。作家艾蓓做出的解释是：那位农村老大娘的确是她的母亲，不过却是养母。文革期间，她那位做大官但倒了霉的继父把她送到安徽农村一个远亲家寄养，并且顶替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姓名。新华社在这里玩了个调包计。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刊载专题报导《她的父亲不是周恩来》，根据中国军方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证明艾蓓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是某导弹基地负责人的私生女，她的生母后被一位高级领导人看上而嫁给了他。艾蓓则被托付给别人抚养成人。艾蓓写《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是受到"阴暗报复心理"的驱使。

尽管艾蓓指这种说法是"分文不值流言蜚语"，但它至少说明，艾蓓确实是私生女，而非农村姑娘。

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艾蓓撒没撒谎？现在多了一个：新华社撒没撒谎？且不论艾蓓是不是周氏所出，作为官方权威新闻机构的新华社公布的照片，谁都一眼可以看出不是引起讨论和争议的那个人。就是说，首先是中共新华社欺骗了我们，新华社造谣也不是第一次了。

后来，艾蓓邀请了《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的"铁证"。这件事后，资深记者在报纸上报导，他的确看到了"铁证"，同时还有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在场。 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没有公布。

艾蓓讲述了一个对父亲既爱且恨的故事。她的书名恰当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结：《叫父亲太沉重》。虽然是父亲，但叫起来太沉重，但毕竟是父亲！

她笔下的母亲——"安然"。她是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千金小姐，北京某医学院学生，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援韩。赴韩前夕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握手时她像含羞草一般哆嗦，感受到父亲的温热和怜爱。在一次美机轰炸中，她受伤回国治疗。周恩来到医院看望从战场上下来的"最可爱的人"，恰好推开了安然的病房："你瞧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

二十年后，周对安然说，当时你看见我，脸直红到耳根。我扶你躺下，你浑身发抖，你晓得吗，你这是鼓励我….

受到"鼓励"的周恩来，决定把安然介绍给孙夫人宋庆龄。伤愈后，她接到宋庆龄家庭舞会的请柬，周恩来邀他共舞，又亲自到门旁送别，给她系好围巾："太冷了，别冻着。"然后捧住了安然的脸，一阵热吻如同雷击，令少女惊骇、瘫软。她哭了。

不久，在团中央举行的联欢会上，她再次见到周恩来，他把她介绍给邓颖超。周对他的面赤气粗、举止慌乱视而不见。邓颖超夸道"真是漂亮，比想象的还漂亮。"

"想象"！她觉得大姐一瞥之间就窥破了丈夫和她已发生和将可能发生的一切。

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定后，安然应彭德怀的邀请，出席中南海春藕斋志愿军英雄和烈士眷属招待会。周恩来把安然介绍给干女儿孙维世，并提出要一起去她家。第二天深夜，门铃响了，门外站着一个大衣领口竖起，帽檐压低的男人：他一个人来了。于是发生了"古往今来，大抵如是"的事。

一九五三年秋，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上海休息了十天，某日，他持一束白色马蹄莲造访在上海的母亲家休养的安然。当晚，他俩进影剧院看电影《梁祝哀史》，没看完就摸黑离开了。接下来的可以记述的幽会：一九五四年冬夜，没有随从的周恩来，在北京图书馆门前的公共汽车站被乘客们认出，引起轰动。他们去三座门俱乐部跳舞，周送她出来，被一扫马路的老清洁工认出，惊喜交加，安然只好溜回俱乐部。一九五六年，他们一道游香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未结婚的安然在上海早产下一个女儿——"爱蕾"（艾蓓）。

第 10 集－ “我在偷情中诞生，阴影里长大。”(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摘要介绍艾蓓女士的著作《叫父亲太沉重》描写的的爱蕾童年时代部分内容。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

"我在偷情中诞生，阴影里长大。在枪口和我脑袋之间，外婆用双臂编织一座我的儿童乐园。"——摘自《叫父亲太沉重》

严峻的一九五七年十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周终于须为自己的"反冒进 "言行支付代价：他受到毛的尖刻批评。这是中共建政后周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机。周恩来和安然失去了联系。他给上海打电话，孩子的外婆不接。安然在杭州养病，等到他陪同一东欧国家的总理到了杭州，安然正好离开了。同年某日，周给安然写了一短柬。现此信还存留在人间

他终于见到婴儿和安然。他这才晓得孩子的名字叫"爱蕾"（我们姑且沿用作者艾蓓所取的名字）。周的双目闪出了泪光。周与安然及孩子的外婆谈了很久。最值得记录的一句是——"也许孩子离开我， 离开我周围的环境，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在南宁亲自主持会议，毛这样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 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五十米远了！"十三日，周送走了一个外国代表团便直奔南宁。十六日，其它中央巨头也赶到。这天的会议上，毛手扬柯庆施的《承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文章，说："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 ？"全场震惊！十八日晚及十九日，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同年初，安然回京，孩子则留在上海外婆家寄养。

同年二月，周在北京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讨。十一日，他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三月，在成都召开的西南、东北地区各省市领导人会议上，周又重复检讨，被毛厉声打断："关于反冒进，在这样的范围，再讲也没多少人要听了，我们在南宁、在北京都听过了！"

很明显，毛要周在全党代表大会上认罪。刘少奇见势不妙，赶紧作出自我批评。周回京后，让一秘书住进总理办公室，草拟在中央全会上的检讨书。周断断续续地口授，这时陈云来电，周听罢脸色阴沉，挥退秘书，独自枯坐，半夜时分，警卫瞧见周在面壁无声地哭泣。

同年五月，中央全会，毛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周的八千字检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全体代表。就在这时，安然被邓大姐请进中南海家中作客。邓转弯抹角地告知她周的艰难处境。安然惊愕非常，她天天读《人民日报》，竟不知周犯了错误！邓又委婉陈情，安然总算明白了。她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舞台上本来就没有她的位置。

周被毛摧垮，从此腰杆再未挺直过。他成了大跃进的应声虫。对毛亦步亦趋的周所闪避的那份历史责任，另由一副厚实的肩膀独力扛起来，他就是彭德怀。彭负起这具沉重的十字架，一直走向命运的深渊。

与周老部下成婚

一九五八年秋，时年三十岁的安然由邓介绍，与一局级干部结婚。邓亲自主持了婚礼。周很晚才赶到，他送一枝帕克笔（它无意之间构成的象征意义，竟于四十年后重写关于他自己的历史）。邓精心调度宾主，让周和新娘有了一小会儿单独相对的时间。据安然的日记，有两段话值得录下来："再过一个月零二十三天， 我们认识八年了。我六十岁了，忙，又没有自由，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罪"；" 今后我没有机会来看你了。上海那边，每年给我报个平安，我也就知足了。有什么事要是找我不方便，就找邓大姐，让她转告我"

丈夫对安然很好，他早就认识她，并心仪已久了。他喜欢孩子，愿当一个称职的父亲。他说自己四十岁了，不知还能否生育。自然，关于这孩子，他知道的不太多，也不算太少。他是周的老部下。问题在于小"爱蕾"，这孩子与新爸天生就是仇敌。她在上海外婆处养育，妈妈总想接她来北京。第一次来北京孩子哭闹一夜，次日发高烧，只好回沪。

第二次进京，她已会跟继父斗气，找别扭。而上海的外婆每次送她北上，在车站月台都哭得象个泪人似的。"爱蕾"那小巧的精神宫殿里，最重要的支 柱就是她外婆。这一点，是了解孩子性格成因的钥匙。外婆是她那个阶级的精英分子。四九年前，她几乎是独力经营着大片工厂和银行 。她耻于与官府和权力周旋，以不与他们打交道为荣。

四九年后，她捐献了全部财产 ，成了普通老百姓，却是唯一敢给总理脸色看的中国老百姓。她曾拒绝周的电话， 拒绝给戴着口罩或帽子的周开门。一次，周因失去安然的音讯而固执地揿响这幢 上海洋房的门铃，天下着雨，周却拄着伞，衣已半湿。外婆在楼上隔窗俯瞰良久， 淡淡地说："有伞不打，这就是总理。"

总之，"爱蕾"极强的个性，使得她与继父漫长的战争早早地就揭幕。一次在四 合院的雪地里的大哭大闹，导致肺炎住院，外婆亲自来京接她时，月台送行者中多了邓大姐。大姐带来了一双小手套和皮鞋，说是她和总理伯伯送的。矜持的外婆则一直沉默。

"爱蕾"不能选择自己的血统，然则她的精神法统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我们还将可以看到，在其生父去世后，她还给共产道德的楷模——邓大姐带来许多莫名的烦恼。

"我存在的本身，就象个叛徒、告密者，或是一出恶作剧。" —摘自《叫父亲太沉重》

周还是偶尔和安然见面的，却都由邓大姐传召并一同在场。这回他让邓找安然来，是为了"爱蕾"。他拿出一罐麦片和一小袋黄豆， 要安然捎到上海。周在亲自检查她有无浮肿时，发现她又怀孕了，于是恭喜，并坚持让她把粮食留下自己吃，他会另托宋庆龄女士带一些到上海。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八日，毛突然从杭州回到北京，刘少奇当晚求见被拒。次日，刘、周被毛召去痛斥一 通。未几，刘被"炮轰"和"火烧"。刘又求见毛，毛扯了一通不着边际的闲话。四天后刘家的电话被红卫兵切断，刘精神濒临崩溃，竟带领全家高呼："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上涌动着人海旗林，高音喇叭同步转播中南海里斗争刘少奇的实况。刘最小的三个孩子也被押到斗争会现场。刘被拳打脚踢，嘴角沁血，当他被揪着白发硬抬起脸来照相时，他那六十二岁才生下的小女儿一声尖叫， 痛哭着跌跌爬爬逃离现场——她才六岁。当国家主席被打得嘴啃泥巴，双脚只剩下一 只袜子一只鞋时，王光美突然挣脱束缚，冲向丈夫，死死地拉住他的手。刘抬眼投出最后的一瞥——这是诀别。

上海,红卫兵推倒了宋母的墓。中华民国前后两任总统的丈母娘的碑文被红漆涂上了触目惊心的大Ｘ！革命小将勒令宋庆龄剪去发髻，破除四旧。宋向周求救，后者总算保住了其发髻，修复了公墓。

爱蕾外婆家当然被再三抄过了。外婆发结没有那么好运气，未能保住。安然神秘兮兮地回了一次上海，和外婆关在屋里秘谈，未及和女儿亲热一下就离去。外婆的家世太显赫，造反派当然还未尽兴。外婆不得不拿出军属证、财产交公的文件、陈毅和宋 庆龄的信和周造访时和女主人的照片。还说如有疑问，打电话给周。以外婆的秉性，说这话已尊严扫地了。造反派暂且收兵。但不久又开始了第四次抄家。 命令她搬出 洋房，和一干资本家挂牌游斗。外婆的辩解遭到当场棒喝："你那女儿、女婿在北京隔离审查！你女儿一九五八年结婚，你这孙女却是五六年底在医院门口捡来的——真是这样吗？快老实交代！"在一旁的"爱蕾"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古怪来历。

接着 ，她听到了毕生难忘的一段电话对话——外婆当即拨动了一个号码，一遍一遍都接不过去。外婆断然道："告诉他，我是小蕾，有急事找他！"造反派边抄家，边象看猴戏似的瞄着外婆——电话居然接通了，厅堂上顿时一片肃然后来，他们退走了。周在电话中表示，他会给上海革委会去电，并问她是否愿意到香港治疗心脏病 。外婆问外孙女能否一同去。答复是简短的二字：不能。外婆说："我如一个人走，四九年就走了。"周另指出一条路，到杭州疗养院暂住，外孙女可同行。

外婆与周这段暧昧的对话改变了"爱蕾"的一生。她执意到北京去"串联"，去找妈妈。外婆没有执意阻拦，只是给孙女做了个 红袖章，还把二百元钱和粮票缝进她的军装里……

第 11 集－周恩来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1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摘要介绍艾蓓女士的著作《叫父亲太沉重》描写的周恩来活活痛死在红色十字架上的场景。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孔捷生先生的文章《解咒年代：本世纪

最后的"黑匣》。

七十四岁的周恩来有二十五年住在中南海，他终于要离开它了。在移驾至手术室和特设的病房暨办公室之前，他对邓颖超有很多嘱咐，其中特别的一项是请她将一个牛皮纸信袋交安然保管，等"小蕾"长大后，再交给她。邓说，她自己也有一个信袋要交给她，好不好放在一起？ 邓颖超的的信袋有一叠钱和总理祖父、父亲及周自己小时候的旧照片。邓将丈夫的信袋放进去，却没打开，周告诉邓，里面是一千多元钱。

一九七五年一月，周做了第一次大手术，看来很成功；两个月后，病灶转移， 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在这期间，他不曾稍息，与政敌明争暗斗，不分日夜地找人谈话。在王洪文动身到长沙告御状时，王海容、唐闻生也接踵而至，她俩是受周委托而来向毛汇报的。连极少出面的朱德也亲自给毛写信，寥寥数语，点出了《红都女皇 》事件。这一回合，"左营"的凶焰受到了弹压，毛训斥了王洪文，在朱德的信上批示，骂了江青。

毛表示，人大的筹备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负责，毛同意了周的举荐，由 邓小平主持 党政工作。病得只剩半条人 命的周当即南下向毛谢恩。此时，十七岁的"爱蕾 "成了中原某医学院的"工农兵学员"，从县、地区到省 里，各级招生委员会莫名其妙地一路给她开绿灯，却不知此人是个什么来头。而她果然严守亲人的嘱咐，断然舍弃了进京上学的诸多机会。

一九七五年四月，周靠近肝脏的大肠壁又多出一个恶性肿瘤，他请示毛，批准作第三次大手术。挨刀前夕，他招见了老部下及其妻子安然，后者和他谈女儿近况。他说："我知道了，学医好，学医可以解除人的苦难，不过我是看不到她穿上白大褂了。

周上手术床前，还细致审查了毛的白内障治疗方案，亲自试服为毛准备的镇静药，命令每日消毒手术器械，毛随时可能同意这起拖延已久的手术。但几近失明的毛还是坚拒，说："医生的话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 最后竟是贴身护士小孟说服了毛 。手术极顺利。病入膏肓周提前两小时来到中南海"游泳池"，一直守候至手术完结。

但周的第四次手术失败，第五次大手术前，政坛再度风云变幻，毛开始"批宋江"，全党都得读《水浒》一百二十回本，读得津津有味而又不知所云。此时周瘦得不足八十斤，身高萎缩了一寸多。推进手术室前，他突然嘶哑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手术再次失败，癌细胞全身扩散。但是他的生命并不属于他自己，以叶剑英为首的那个阵营将他奉为"定海神针"，做了第六次大手术，周的膀胱及下体已烂掉，仅靠八根管子输液、输氧、排尿，吊着一口气。止痛药用到极限，周只能强忍剧痛。贴 身警卫劝他："您哼出声来吧，会好受些。" 邓颖超却握着他的手："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要坚强！"周某次从深度昏迷中醒转，第一句话是问主席身体怎样，继而问刘（伯承）帅病情怎样。众人感动得泪洒当场。

然而，周终于打熬不住了，他呻吟，哭泣，哀求医生：快打止痛针。邓颖超与医疗组商量，太痛苦了，让他这样下去，不如.......。 但是，叶剑英一言九鼎：要想尽办法，能延长一天，哪怕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一切努力。周生命的意义已超越了这具气若游丝的肉身，成了一种象征。为了政治，为了党的至高利益，他必须活活痛死在这副红色十字架上！

在大小共十三次手术后，已是一九七六年元旦，周距生命的终点还有八天。叶剑英天天来看他，直到周已语不成声，还把耳朵贴到周的嘴边。一次，叶挥退所有警卫和医护人员，下令连送水送药也要按门铃。两人密谈了一个钟头。叶临走对警卫说："你们准备好笔纸，二十四小时守在周身边。周原则性强，很多事闷在心里不讲，最后有什么话，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警卫最后交给叶的只是白纸一张。按指示安放在床边的录音机也只录下一个字。周含混不清地吐出这个字时，邓颖超在他身边，听罢就离去了。

周过世前的最后两日，邓颖超没来过。他死得极其孤苦，咽气时身侧没有一个亲人。 后经反复测听录音带，周吐出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信"。 没人能破译这个字的含义。周死了。

噩耗第一时间传到中南海"游泳池"，报讯者把写成字条放在外间客厅的桌上。护士 小孟闻声出来，读毕独自垂泪。毛此时在床上翻看《鲁迅全集》，小孟回忆说，她将字条放进兜里，不敢即刻告 诉主席。字条耽搁了六个钟头，直至下午政治局送来了讣告的清样，毛实际上还不知情。直到他午休起床，精神看来不错，小孟才在读报读文件时把讣告插在中间读给他听。

直到追悼会开始那一刻， 仍苦等着这尊超神宣示一两句什么，或在某个仪式上露一 面。中央警卫局已勘察好行车路线，轮椅和氧气袋也备齐，随时等待着毛参加遗体告别、吊唁或者追悼会。然而 ，毛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护士小孟曾给汪东兴打电话："总理的追悼会，是否问问主席参不参加？"汪答："政治局没发通知请主席参加追悼会，你就不用问了。"

安然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在花丛之中，她看到了自己献上的白马蹄莲，及静卧在党旗下的周。守灵的邓大姐向她伸出了手，而安然的身后并没有女儿的身影。女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时，灵车已远去。

几经翻覆，神州巨变。"爱蕾"毕业成了医生。八十年代，她被调入北京某部队，拿的是笔杆子而非枪 杆子。过问她的人事调动之人，其地位之高，排在屈指可数的那三几人之列。但，她竟然还是背叛了自己本应身属的那个阶级。

最后一段插曲——继父通知，邓颖超要见她。"爱蕾"去了，邓陪她仔细看了一遍周的故居，说了很多话，最重要的那几节是："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正编写总理的传记。我想让你参加这个写作组。不过你不是党员，进写作组名不正言不顺。你把总理 过去给你们的信件字条收集一下，再写点回忆文章，一起给我，我看

看能不能把你推 荐进去。"听者却十分警觉，断然拒绝。

邓颖超开始发怒，展示了与她的固定形象大相径庭的另一面："我知道你们盼着我早死！你们可以任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无视党和国家的尊严，无视他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她又一字一顿地强调："历史是不容篡改的！"两代人谈得极不愉快。

临别，邓颖超忽又冒出一句："你医生当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写作呢？"不知是否从这一刻起，"爱蕾"萌生了写一部大书的念头。

现在，应该把称呼改一改了。《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于一九八九年初应美国新闻署的邀请短期访美，未几爆发八九民运，接着是"六四"事件她被搁浅在新大陆美国。一九九三年底，她完成了这部书稿："我用最粗浅的线条将它勾勒出来——你以为这是个编织的故事？是个爱恨交错的 凄婉童话？ ""不！这是历史。你和我都在其中。"

艾 蓓这四十万字的巨制，给历史故宫中的徜徉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考查角度。关于邓颖超，艾蓓的刻划异常生动和犀利。摒去她个人与邓间微妙的心理对立和磨擦，就细节而言，相信与历史真实并无大的出入。此处将绝大多数与邓有关的细节抹去。愿知其详，请读艾蓓的 原着。

关于"安然"，这是另一个活着的人。书中的描写则较为逊色。艾蓓告我，她太爱她妈妈了——所以无法写得好。她母亲自始至终都在阻止她写这本书，但我们可以想 象得到，她母亲在捧读它时之老泪纵横 。

至于知道此事的人，当然还有不少尚在人世，有的仍在出将入相，身居至尊的高位。如果他们掷下话来，谓："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我们将由此对这些大人物的党性与德性，以及他们背后的那个机制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不过，想他们都会三缄其 口，良心与党性各自相安无事。若是少壮官员出来指斥及证伪，倒觉得不足为怪。 诚然，他们背地里自会再三细阅这部书，他们自己不免也 觉出了往昔"党内生活"的阴暗可怖。

这是一部完全可以与斯大林女儿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及《仅仅一 年》媲美的鸿篇巨著。俄国有着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深厚文学传统，斯大林女儿同样重心理刻划，把灵魂的每一颤栗注进笔端，故此知识分子读来甚为震撼，但它至少不曾进入处于同一制度下的中国民间。

中国的文学传统则为"文以载道"或"文以记史"，艾蓓的笔端并不"载道"，但是每个出没其间的人物的命运与感情，都嵌进了苦难深重的历史里。你读他们，就是读历史。你读历史，也就读出了他们。

——我们敢断言，这是我们几代人都需一读的书——不管你读懂了多少。

第 12 集－中山舰事件毛周的第一次合作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2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第一次合作。本次节目部分内容来自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和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不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深受封建官场文化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在政治上走钢丝的人格色彩。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骜不驯，崇尚斗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恩来则为人内敛，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富于封建官场的圆滑世故，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不倒翁"。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激进青年，五四运动后，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

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曾东渡日本求学，屡试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于政治。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 O 事件)之后。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斗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对蒋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作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俄国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

第 13 集－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3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红四军七大前后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本次节目内容主要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和张戎女士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恩来并不是从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着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是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主导的中共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共被迫转入地下。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共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首先认识到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是在农村。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出"城市中心论" 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格外被共产国际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着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来说是 "党内奴性"

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并且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中央的"二月来信"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搞政治斗争的高明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个人还不害怕；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平易近人，人缘又好，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刚从苏联受军训归国的刘安恭，上海派他来当朱毛红军的第三把手。刘安恭发现毛挤掉了朱德，非常愤慨，说毛“抓权”，“书记专政”，“家长制”，“自成体系”，不服从中央”，说朱德是“拥护中央派”，而毛泽东是“反对中央派”。

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毛躺在担架上离开了红军总部，跟着他的有妻子贺子珍和几名亲信。其中一个后来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毛离开部队后，便着手跟朱德捣乱。他在朱德的队伍里有个同谋：林彪。林的自尊心极强，绝对不能忍受批评。朱德作为上级批评过他，他对朱德怀恨在心。林上井冈山后不久，毛就开始拉拢他，说的话都是顺耳舒服的，还单请林去演讲。毛、林从此建立了特殊关系。

一九二九年七月底，国民党军队进攻。作为军事指挥官，朱德制定了作战计划，令所有部队在八月二日集结。但时间到了，林彪却不见踪影，他跟毛和毛控制的闽西红军待在另外的地方。这两支部队合起来差不多占红军(当时有六千多人)的半数。朱德只得率领一半的兵力反击国民党军。虽然朱德没受到太大损失，但半数红军不听命令，总不是个办法。在这种分裂的状况下，朱德指望中央给他拿主意。

这时党的总书记是没什么能力的向忠发，莫斯科任命他纯粹是基于他出身"无产阶级"，当过水手、码头工人。中共负实际责任的是周恩来，做决策的是莫斯科在上海的代表。这些外国人执掌着中共的财政大权，一分一毫都由他们说了算。

周恩来直接处理朱毛问题。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求：.......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威信；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圜，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

第 14 集－宁都会议-毛被剥去军权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4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毛周结怨。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电报而起。用周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原因.

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被国民党抓住处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在此之前，当周恩来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在国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提出的大胆计划和冒犯共产国际尊严的话语，大为震怒。李立三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十分忌讳的。他们对李立三的批评开始升级，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1931 年 1 月 7 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楼里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 37 人，其中中央委员 14 人，候补委员 8 人。中央全会理应中央委员参加，可自称为“国际派”的人中没有一个是中央委员。经过特殊安排，15 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员同样的权利。

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一直严格保密。有的代表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召开什么会议，有的被告之召开紧急会议，而进入会场后才知道是四中全会，还有的人根本没有被通知到。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处于设计师和裁判员的地位，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限定在一天之内完成。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的中央委员名单。

王明的老师米夫在会上作结论，大讲王明等人“是坚决地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又说，立三是反对王明的，而瞿秋白和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来反对”这些 “正确路线的代表”。米夫的这个讲话为王明上台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周恩来在会上对三中全会的错误承担了责任，表示忠于共产国际，支持米夫。周恩来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王明、王克全、刘少奇。

全会选举时，米夫宣布：凡参加全会的都有选举权。在积极的强令将王明等补选为中央委员之后，接着选举政治局，王明又顺利地当选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并兼任江苏省委书记，实际上已经控制了中央领导大权。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全面掌权。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没有看清哪一方会获得胜利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大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必须贯彻执行以反对党内右倾和实行积极进攻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共产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打击一切与此相违背的倾向。作为犯调和错误的留用人员，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觉腰杆不硬，胆怯心虚，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

应该说，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还是"相安无事"的。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 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和毛一道共事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找国民党军队主力作战，以击败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

当时中共在前方的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就是周给后方中央局的这封电报导致了宁都会议的召开，完全剥去了毛的军权，与毛结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在下次节目继续向大家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怎样结怨的。

第 15 集－毛甩手不干 坐了两年的冷板凳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5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 介绍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时，善于转向的周恩来 同毛划清界限。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

来》。

中共宁都会议之前，周恩来在给中央局电报中这样说到：

"前方每遇商榷之事，……，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下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因为活脱脱地勾画出了那个为人们所熟悉的毛：为人恣肆不羁，做事大而化之而又反复多变，谈问题往往不着边际，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

顺便一提的是，对于周恩来的这封信，目前大陆中共学术界不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就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刻意为周遮掩，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解释，因为它实在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甚放心对共产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对周恩来力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因为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而训令是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背道而驰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诸领导人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撤换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的，"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

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不过，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执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指周恩来)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应该说，后方中央局成员对周这种心理的揣测还是基本上准确的。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我个人有实验之心，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是实情。"

毛泽东可不是逆来顺受之辈，同时也明白周恩来挽留他的用心，因此并不买他这点"团结之意"的账。相反，既然不能取得后方中央局的全权信任，毛就索性甩手不干，回后方去"养病"，也决不肯委曲求全，留在前方戴罪立功，帮周一把。当然，毛也并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还是刻意为自己预留了转圜的余地，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在这里是故伎重施。他看出周恩来的胆怯，不是主持大局的帅才。他的如意算盘是用不了多久，自己就会被重新请回军中来收拾残局，就像当年红四军九大时一样。因为在自视甚高的毛看来，红军是他一人创建的，离开了他，谁也指挥不了。然而，毛未曾料到的是，此举几乎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大错，他由此被完全排除在处理军机大事之外，无人理睬，整整坐了两年的冷板凳。而妨碍毛重返军中的最大障碍便是周恩来。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的日子也不好过，承受着内外夹攻的双重压力。在外部，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为骨干，分左、中、右三路，对江西中共根据地实行分进合击，大军压境。一场兵力悬殊的大战已经迫在眉睫。偏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宁都会议又决定临阵换将，毛泽东也不愿留在前方作帮手。于是周恩来只好硬着头皮，独立承担起前方作战指挥的重任。

周恩来深知自己被推上背水一战的境地：第四次反围剿一役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一旦作战失利，其严重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他在主持战事中更是事必躬亲，一直坐镇在前方指挥所中，不分昼夜处理军机，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胜仗，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相比，前三次只是消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而这次则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并创造了以往红军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对此，蒋介石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就连原先准备在一旁等着看笑话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发动围剿以来败得最惨的一次。这一胜利使周恩来如释重负，一扫心中自中共六届四

中全会后的郁闷之气，而且也令他在红军中的声名大震，一时间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接受红星奖章，风头甚健。

相形之下，在一旁坐冷板凳的毛泽东则黯然失色，备受冷落。毛此刻内心的不平之气可想而知。更令毛窝火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不仅使他迅速东山再起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长期以来在红军中所形成的地位面临着周恩来的挑战。周不仅已在名义上取代了毛，成为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总政委，而且凭借以往在军中的广泛人缘脉关系加上新近的大胜，很快就站稳了脚跟，成为红军中新的政治中心。而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驯顺屈从，凡事总是委曲求全的态度，又使得他成为在党内掌权的王明教条宗派刻意拉拢的对象。这两股力量在政治上联手使毛的复出更加渺茫。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帮衬，吃莫斯科洋面包的王明派连一天日子也混不下去。尽管他们气势汹汹，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国际路线"压人，但他们在党内缺少根基，并不是自己的对手。而周恩来则不然，在党内颇有人望，在军中也有深厚的根基，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再加上周为人圆滑，善于在党内斗争中左右逢源，从来不会站在失败者一边。而且正是由于周在政治上随风倒，甘心为"洋房子先生"抬轿子，卖力打天下，那帮人才得以在党内军中立足，令毛想很快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更让毛泽东不能原谅的是，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正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予理睬，把毛晾在一边，而一头倒向以共产国际为靠山的王明教条宗派一边，为他们跑腿办事，支应局面。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

第 16 集－中共红军湘江惨败 周恩来三人团之一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6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后期，中共红军在湘江惨败的情况。当时，8 万 6 千红军，死亡和失踪约 3 万 1 千人，被俘约 6 千人。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三三年一月，周恩来还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于在上海的处境日益艰难，也不得不迁入江西。博古等人一到根据地，便以临时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把党务大权抓到手里，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局，取代了周原有的地位，成为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由于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军事作战问题，而博古本人对此一窍不通，于是他又从上海搬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为他的靠山，授予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此后，博古和李德抱成

一团，博古在政治上为李德捧场，李德则在军事上为博古撑腰，两人联手在中央苏区主宰了一切。

应该说，当时最有条件阻止由博古一人独揽大权的便是周恩来，如果他敢于站出来一争的话。周是当时在江西中央根据地中唯一的一个由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资历和个人才干都远在博古之上。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前连普通的中央委员都不是。

博古当时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除了有着共产国际有意扶植王明教条宗派把持中央的大背景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在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后，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已经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的缘故。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不过当时有言在先，指明这只是临时中央，不仅要上报共产国际批准，而且待日后多数中央委员在一起时，须开会补办手续。对此，周恩来是当时少数知情人之一。

然而，当博古到江西后想当然地接管并独揽大权时，周恩来却没有当面捅穿这一点，提议召开中央会议进行确认，而是在一旁默不做声，听之任之。这是因为他不敢得罪有共产国际撑腰的党内留苏派。既然博古他们绝口不提这件事，周也就不愿意出来唱黑脸，自讨没趣，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周恩来的退让，并没有使一心抓权的博古善罢罢休，相反更得寸进尺，继集党务大权于一身后，博古又一步步地把军权抓到自己手里。他先是将随军行动的中央军委移至后方，增补他本人为委员，由后方对前方发号施令，剥夺了前方对军事行动方针的决定权；进而又根据李德的提议，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干脆撤销前方总部，把周调回后方，由李德一人把持整个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以后，周本人虽仍作为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参与军机，但已沦为一个跑腿办事的角色，凡事都要听命于李德。

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恩来之所以没有被排挤出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以及他所具有的组织能力确为中共所需。周氏的这两个特点，特别是前一个，既是他能够屡次在党内斗争中涉险过关，成为政治上不倒翁的原因。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这时期(指博古、李德当政时期) ，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周恩来的在政治上的隐忍和屈从，在他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再地显露出来，每次检讨过关之后，依然如故。与其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如说是周恩来在中共异常残酷的党内斗争中为了自保而有意识地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而且经过多年磨练之后，已经完全化为一种下意识的生存本能，两者水乳交融，很难分清何者为先了。

军队对中共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蒋介石根据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的建议，改弦更张，施行"战略攻势，战术守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力略，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边推进边修路筑碉，一点点地进攻中共中央苏区。

而作为赛克特的对手，同为德国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却在战略上犯了绝大的错误。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拟定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寸土必争，并且生搬硬套欧洲街垒战的教条，命令红军构筑要塞式防御阵地，采取"以碉堡对碉堡"和 "短促突击"的战术，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红军东堵西截，穷于应付，并且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前往湖南西部，同在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然而，这次转移十分仓促，连在中共政治局内部也没有讨论过，只是在当时中央"三人团"的核心圈内进行了筹划。"三人团"是在中共中央苏区大门广昌失守后，为了突围西征而设立的党内最高权力核心，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由于行动的仓促，这次突围转移实际上变成了一次搬家式的大撤退，随军携带的甚至包括笨重的造币机，致使军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行动迟缓，一路被动挨打，最后在湘江一役遭致惨败，军力折损过半，由刚出发的八万五千人骤减为三万余人。

当时蒋介石已判明中共红军南进突围的目的，是要经桂东北去湘西北与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红军还未完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就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湘、粤、桂军和中央军，共 26 个整师、30 余万兵力，全力“围歼”红军。

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8 万 6 千红军官兵，死亡和失踪约 3 万 1 千人，被俘约 6 千人。殿后的红八军团不复存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军团六师 18 团和红五军团 34 师全军覆灭。其余各部编制在湘江之战均只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红军大量缩编。

自离开中共苏区，突破历次封锁线，红军损失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 3700 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 9700 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 8600 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共损失近 38000 人，而且主要是骨干作战部队。加上沿途红军征召的新兵，此时红军已不足 30000 人。(苏区出来的民夫和新兵大量逃亡) 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等一军团将领为死亡官兵安葬。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

12 月 1 日这天，对于中共中央红军生死攸关。因为三分之二的部队还未过江，而国民党军逼进，与红军抢夺渡口。凌晨一时半，中共中革军委向全军下达紧急

作战命令。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又联署保证执行军委命令的政治指令说"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

湘江之战，从 11 月 25 日中共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湘江战役后，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叫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水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几十年后，当林彪位于中共高级领导职务时，也曾去过一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怀旧，但他再也没有回过界首。在中共的军史上，湘江战役是惨败。

第 17 集－遵义会议 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7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中共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以及毛泽东成为周的副手。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杀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但一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毛在暂时隐忍的同时，一直在暗中活动，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党内军中已有的政治影响外，还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揽人心，寻找新的政治盟友。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有意识地与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企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圈中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当时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打游击的政治局委员项英曾对此表示忧虑。李德写道：“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反攻，现在也

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当红军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

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中共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顾：“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动了。他们死抱着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一个。 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 49 年中共建政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的争论。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批评李德， 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周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成员，周恩来态度的转变,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和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周的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与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丰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最后，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这一手十分老到，既作出了高姿态，使得博古，李德陷于孤立，促使会议形成了最终的决议。同时，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数人的谅解，在政治上渡过了难关。

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作为确立了毛泽东党领导地位的标志而大书特书。特别是当毛在世时更是如此，对历史真相讳莫如深。

毛泽东死后，随着历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这一定论发生了疑问。中共官方说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问题。

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通过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打了个翻身仗，根本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关于这一点，陈云在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象这样的谎言在中共党史中比比皆是。

第 18 集－毛泽东搞诡计 周恩来变成毛的副手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8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怎样搞诡计，使得周恩来变成毛的副手。本次节目的部份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上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中共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的副手。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取代了周恩来在中共军中的地位，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的？这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一直是个避而不谈的话题。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被推举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当时红军正处于危境之中，任何一个决策错误都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因此，周此时临事而惧的心态比以往更甚。表现为在遵义会议后有意退让，而让毛泽东在实际指挥中唱主角。周恩来的这种作法，正中毛泽东的下怀，给了他施展阴谋，反客为主的机会。毛泽东想新官上任三把火，通过打胜仗来为自己立威。此外，对毛来说天赐良机的是，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通讯联络已经中断。这样天高皇帝远，更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了。

毛泽东采用改变中央常委内部分工的方式，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解决的组织问题，迫使博古交出党内负总责的权力，推由他的政治盟友张闻天取而代之。这一招有一石数鸟之功：既堵死了博古在政治上卷土重来的路，同时又藉此拉住了具有国际派背景的张闻天，拿他当挡箭牌来堵住共产国际的嘴，使毛本人在实际上主导党内最高核心的决策而又不枉担虚名。

不过，毛泽东并非是个常胜将军，他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土城战役就没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败仗”。这一挫败虽然没有对毛在党内军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损害，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他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稍后讨论攻打打鼓新场时，当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反对攻打，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时，结果竟然弄假成真，与会者通过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是毛在遵义会议后所获得的军事指挥上的实权职务。这样一来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周恩来居中转圜，才帮助毛解脱了困境。

这场风波，对毛泽东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挫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重演，毛随即以作战指挥需要独断专行为名，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这一提议随即获得通过。

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

的最高领导人。事实上，当时在军事三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书。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逐渐被毛泽东所取代。毛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独断专行、不甘久居于人下的人，在形势有了转机后，更是觉得主持军中大计非他莫属。于是，毛便施展权谋，在其政治盟友张闻天的配合下，反客为主，一步步把发号施令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劫后相逢，本应同心协力，共渡艰难。然而在短暂的欢聚之后，双方便因歧见而彻底闹翻，分道扬镳。表面上的原因是对行动方针的 “北上”与“南下”之争，实际上却是党内两个山头之间的权争，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和毛泽东一样，都是个人领袖欲极强的人。张自恃是中共的元老，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当时又兵强马壮，实力远在中央红军的疲惫之师之上，于是便以此作为资本伸手抓权，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要求，自任军委主席。

但是，已经大权在握的毛又岂能将刚刚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忍受张某骑在头上发号施令？红一方面军虽然在实力上不及红四方面军，但因当时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们随军行动，占有天时人和之利。于是，毛便以正统自居，与张国焘施计斗法。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张闻天的傀儡地位表现得淋彻尽致：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而周则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没有熟悉情况前，暂留军委帮助工作。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更能显出毛泽东心计的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人缘很好，又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为了避免周被张拉过去，形成张、周两人联手的局面，毛又预作防范，随后任命周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善于搞阴谋诡计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一方面军中的领导地位。

恰好就在这时，周恩来病倒了，得的是肝脓疡，病情来势凶猛，连日高烧不退，不能进食，当时急需排脓，但在行军途中又没有条件开刀，医生只好用冰块敷在肝区上降温，其余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周恩来病倒而暂时不能理事。正好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可趁之机来改变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使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名正言顺。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

然而，毛泽东还不想善罢罢休，尽管他已经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因为取代周的方式毕竟不那么光彩而令毛时时感到心虚。再加上周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并且仍然担任着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在军中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消除的。毛十分担心周目前的让权退让只是策略上的暂时隐忍，一旦时机有利，他将会卷土重来。因此，毛决定趁热打铁，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摆脱红四方面军后，随后在俄界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在会上报告同张国焘争论的经过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这样一来，周恩来不仅在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而且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变得可有可无。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甚至几乎被排挤出军队。由张闻天出面，藉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政治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提出周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还是留在军中为好。毛一见张的方案碰了钉子，又转而出来做好人，假惺惺地推让说，军事工作仍由周负责，自己当副手。

对毛泽东这种表面文章，周恩来当然心知其意，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周虽愿意让毛主持军事，但也不想就这样被排挤出局，于是顺水推舟，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就这样，毛出任了所谓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央军委)主席，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从此以后，这种格局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初期，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容忍周恩来一直留在军中，主要的是需要周做实际工作。原因在于毛缺乏组织能力，而且不愿做具体工作；而这恰恰是周氏的所长，正是毛需要依赖他的地方。

毛泽东改变了企图将周恩来完全排挤出军队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既把周视为可能向他在军中的领导地位挑战的对手而始终存有戒心，不断敲打，又把他看作是可以争取和使用的对象。终其一生，毛对周始终没有摆脱这种矛盾心理。

第 19 集－周恩来要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19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怎样走钢丝，并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要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斯大林死后，毛泽东终于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触发了他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与苏联一争高低。毛闯下饿死四千万人的大祸后，担心中共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追究清算他的猜疑妄想，把中国一步步推向通往文革的灾难之路。

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共共产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的危机意识已经十分强烈，被所谓“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一类的忧虑，搅扰得整日心神不定，寝食难安。毛深知自己闯下大祸，但又不肯认账，害怕有人出来追究他的历史责任。毛因此而变得极端多疑猜忌，感到在党内日益孤立，大权旁落。

更让毛泽东忧虑的是，刘少奇这位在延安整风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和一手扶植起来的接班人，正在背叛他。毛在“大跃进”中惹出乱子后，随后以退为进，把中央分成一线、二线，自己退居幕后，而把刘推到一线，替他收拾烂摊子。但没想到的是，此举却弄巧成拙，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主席”的局面，刘少奇利用收拾困局的机会，培植个人势力，树自己的旗子，在中共中央形成了另一个司令部，与他分庭抗礼。

非但如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所采取的种种经济调整的举措，并不是在帮助他渡过难关，而是在乘人之危，否定毛的“三面红旗”，有意在政治上和他唱对白戏。更触动毛泽东那根敏感神经的是，刘竟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实则暗中进行逼宫，迫使他检讨下台。 像公开散布造成国家困难局面的原因是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自己提出的缺点是“一个指头”唱反调，乃至提

出“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 ”等等，就是冲着毛来的，蓄意挑动舆论，准备秋后算账。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心结日深，认定他心怀异志，其心可诛，就是那个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这成为毛挥之下去的梦魇。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已在认真考虑解决这一问题。不过，由于刘少奇在中共党内的地位经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且刘所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更足为他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声望与日俱增。在这种隋况下，通过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已经难以解决刘的问题，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除掉这一心腹之患。这种想法随着毛泽东日益老迈年高，急于安排后事而变得愈发强烈起来。

在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周恩来一直试图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积极配合刘少奇主持的对“大跃进”后果的纠偏，同时又尽量顾全毛的面子。并且试图缓和毛、刘之间的紧张关系，充当和事佬的角色。

周恩来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当时又担任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内心是赞同并支持刘少奇所采取的调整举措的，以挽救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但是，他又深知毛的为人--既不甘认输，而且还在伺机杀回马枪，因而表现得小心翼翼，处处谨言慎行，尽量顾全毛的面子。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在一九六二年初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当时会上主要有三种声音。一是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和讲话，强调对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反对套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并借湖南农民之言，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碍于毛泽东的面子，刘少奇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的问题不便直接表态，只是含糊其辞，说不急于作结论，等五年、十年以后再说。而刘的头号大将彭真则直言不讳，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指名道姓地点毛的名，指毛本人应对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办食堂等问题负责，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分之十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

二是林彪在大会上独树一帜的发言。他离开会议的主题，给处于困境之中的毛泽东捧场帮腔，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都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捧场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干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三是周恩来的发言。虽然也谈困难形势和调整，但只涉及经济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就事论事，绝不言及其它，并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

担责任，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

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书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

毛泽东对林彪给予的支持自然心存感激，把他视为在政治上斗倒刘少奇的头号盟友，同时也注意到了周恩来在态度上与刘少奇的差别。这让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毛看来，在与刘的摊牌问题上，仅仅与林彪结成联盟是不够的，还必须争取周的支持，至少是使其保持中立。原因在于周这类党内中间派的倾向攸关政治力量的对比，这和当年扳倒王明、博古时的情形有相似之处。眼下毛对周在政治上两边都下得罪的作法虽不大满意，但却判定他不会和刘少奇联手，因此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刘一个人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在政治上施展欲擒放纵的把戏，动身离开北京，自称“徐霞客”，游历名山大川，在京城唱起了“空城计”，看刘少奇如何表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下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

在一九六二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会前，主管会务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刘少奇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经过这场风波，一直在评估形势的毛泽东也达到了试探虚实的目的，认定日后在对刘少奇动手时，不仅周恩来会跟着他走，而且在党内也不会有什么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作对，这样一来，让毛大大放了心，开始认真考虑发动文革的问题，并为此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将其付诸于行动。

第 20 集－周恩来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怎样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施展权谋，故布疑阵，作了精心的部署。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毛泽东从舆论准备、组织措施乃至军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筹划，深谙兵不厌诈一类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断放出风声，制造自己快要见上帝，将不久于人世的假象，同时又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夸刘和批周的内容)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故意迷惑对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大造舆论，有意在党内制造要出大事的紧张空气。与此同时，毛泽东暗中放出江青作为炮手，在上海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向刘少奇势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发难的重磅炮弹。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序幕。

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才能与之争胜。他看出刘少奇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暗中排挤林彪，拉拢在军中掌握实权的贺龙和罗瑞卿，公开散布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而罗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与林彪以及军中其他老帅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在政治上做倒刘的大文章，毛决意利用林彪、罗瑞卿之间的矛盾，拉林打罗，反制刘插手军队的企图，以确保军队在最后摊牌，林站在自己这一边。

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多年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现在更成为他与刘少奇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为他保驾护航的“尊神”。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对林彪关心备至，格外迁就，不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与林彪互通声气，而且在倒罗的问题上形成默契，就在罗瑞卿即将大祸临头的前夕，毛还特意让罗向林彪传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 而林彪也正利用这一点，趁机开出自己入伙文革的价码¬——拿掉罗瑞卿。

毛泽东这时也发现罗瑞卿跟刘、邓、彭很紧，让人不大放心。特别是当发现罗瑞卿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认定罗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导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一幕。毛本人亲自出马，指罗“个人独断，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这样，为了毛、林之间的这笔政治交易，罗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毛一改五十年代后期因“反冒进”问题而每次会议都批周的做法，对周竭力拉拢，软硬兼施，力图借重他在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来达到钳制刘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为三十年代追随王明路线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传阅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时，特意笔下留情，对周网开一面，专门加写了一段批语说，总理是功大过小。另外毛在政治上采取重大动作之前，都事先向周打招呼，比如在打倒罗瑞卿的问题上，就个别和周通了气。

对邓小平，毛泽东打算采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恼火邓在文革前政治上日益疏远自己而跟着刘少奇跑，因而决心狠狠整他一下。 毛并不真想打倒邓，只是想教训教训他，因而始终对他与刘有所区别。这既是出于在政治上对刘少奇势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时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暗中对林彪预留一手。毛的疑心极重，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包括他眼中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内，邓便是毛准备日后对付林彪乃至周恩来的一张牌。

为此，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据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一书中讲，邓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谈话，结果只谈了一次，两人就谈崩了。谈崩的原因书中没有提及，可能是林彪看出此举的用心，有意不肯转圜。即便如此，毛后来在文革中还是要把刘、邓两人“拆分开来”，对邓小平的批判适可而止。

至于对刘少奇，毛泽东是施展权谋，故布疑阵，虚虚实实，在政治上打诸如“中央出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哑谜，让人们对文革的目标莫测高深。与此同时，为了稳住刘，毛泽东表面上与之虚与委蛇，大摆迷魂阵，假惺惺地表示要“让贤交班”，让刘少奇来挂帅，做主席，邓小平做秘书长。暗中则不动声色地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刘一步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还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将彭德怀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的“文武合壁”。原因是刘曾向彭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这话令毛极为紧张，深知彭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为了哄骗彭德怀离开北京，毛泽东亲自出马，找彭谈话，故意做出和解的姿态，表示真理也许在你这一边，劝说彭去大西南三线工作。接着又如法炮制，把彭的副手黄克诚送到山西。与此同时，毛又不动声色地将曾依据刘少奇的批准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要害岗位，换上长期担任他本人贴身警卫的汪东兴。在组织上安排妥当以后，毛开始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向刘本人步步逼近。

在文革前夕密云下雨的日子里，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一线领导人被蒙在鼓里不同，周恩来由于事先有毛泽东的打招呼，心里多少有些底，知道毛在政治上将有大的动作。尽管这时他对毛的全盘意图还不完全清楚，不过凭借其多年来的经验，已经觉察出政治气氛的诡谲，山雨欲来，并且看出了其中的某些名堂。像罗瑞卿的问题，周恩来就看出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在政治上的交易。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各项准备大体就绪后，抛出了姚文元的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下令全国各地的报刊转载。然而出师不利，不仅在学术界受到抵制，普遍对该文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颇多非议，而且在北京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决定北京各报刊暂不转载，甚至连《解放军报》也按兵不动。

这种情况，让毛泽东大为恼火，更加认定北京是由刘少奇控制下的“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为此，毛亲自打电话把周恩来叫到上海，表明自己的态度，要他出面进行干预，解决转载问题。

周恩来先是说服彭真，提议召开专门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讨论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把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发表，并亲自修改审定了编者按，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还煞费苦心地大段引用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毛泽东对周恩来这种和稀泥的作法很不满意，不过毕竟是帮了他的忙，解决了在北京转载的问题，从而在对手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初战告捷后，毛并没有急于扩大战果，而是继续在幕后静观势态的发展，等待抓对手的辫子。所以，当彭真携带旨在试图对已经迅速扩展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批判运动加以约束的“二月提纲”专程到武汉汇报时，毛再次施展"阳谋"，故意对这个明显违背自己意图的文件表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便引蛇出洞。与此同时，毛又对江青面授机宜，让她到林彪那里搬救兵，以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让军队介入这场斗争，在政治斗争中扮演威慑力量的角色。

一个月后，一直在幕后评估形势，寻找做文章的题目和时机的毛泽东发动了第二波攻势，拿刘少奇所掌管的对“兄弟”共党的工作开刀。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日常工作的刘决定派代表团前去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采取在会上与之斗争的方针。同时在中日两党联合声明的问题上，考虑到日共非执政党的处境，同意在两党联合声明中不点苏联的名，而代之以“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对此，毛泽东大发雷霆，怒气冲冲地把外交部的简报批给在京中央常委，说：一个大会为什么一定要到呢？不到就要砍头吗？是否要发贺电，也值得考虑，不发就犯了罪吗。完全推翻了中共在北京常委原先所作的决定，给刘一个耳光。

接着，毛泽东又向纵深突破，矛头直指刘少奇的亲信彭真。他利用一九六六年三月中旬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机会，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一篇话，对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压制学术批判的问题，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针对中宣部扣压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稿件一事，警告说：宣传部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中共农村工作部因鼓吹推行“包产到户”而被毛撤销。

毛泽东本来是想在这次会议上以搞“独立王国”的罪名，一举解决彭真的问题，打掉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左膀右臂，但在常委内部试探了周恩来、邓小平的态度时，却没有得到两人积极的响应。刘本人更是不会赞成，所以毛只好暂时收手。但是，很快毛泽东就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在周恩来的配合下打倒了彭真。

第 21 集－周恩来在打倒彭真时所起得作用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1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打倒彭真时所起得作用，以及周的“保持晚节”。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1966 年， 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康生利用陪同接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汇报了“不久前，彭真让中宣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批评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一事，说这是彭真“整到主席头上厂”。 这一下，毛泽东终于有了整倒彭真的把柄，可以师出有名了。

于是，毛泽东决心利用刘少奇出访的机会，揭开彭真问题的盖子。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他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话，严厉批评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并表示：“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并让康生立即返回北京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

当时，因刘少奇不在国内，邓小平去西北视察工作，中共中央一线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一人在北京留守。因此，他的政治态度如何攸关事态发展。对周的态度，毛心中有数，早就算计好了的。周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知道自己正在面临着一次政治上的重大选择。所以他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有意压了一下，以便有时间可以从容考虑一下。实际上，周已经觉察出毛对彭真日益不满的态度，而且也看出这是冲着刘少奇而来的。

从个人关系上来说，周恩来对彭真的为人并无太多好感，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期间。当年彭真追随毛泽东、刘少奇整肃党内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霸气，让他很不以为然。不过，当时周自觉理亏，并没有过多

计较。在工作中，更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对彭真的欣赏和重用，让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常务工作而对他尊重有加，乃至以党的副主席之尊，主动向他请示汇报工作。对此，彭真曾多次对自己下属提起这一点。

即使在后来毛泽东已对彭真表现出明显不满以后，周恩来也并没有马上就跟着变脸。如前所述，当毛在三月杭州会议上，根据江青的告状，为沪剧《芦荡火种》到北京未能演出一事，批评彭真在北京搞“独立王国”时，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小心翼翼地为彭真缓颊，表示：“我还没有什么感觉”，让毛泽东碰了一个软钉子。

这次，周恩来无法再这样做了。从毛泽东充满火药味的谈话中，他已经看出毛抛出彭真的决心已下。 经过两天的考虑，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周恩来正式写报告给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及为贯彻落实毛的指示而准备采取的措施。报告中说：“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 (即“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不仅如址，周恩来的表态对不在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也是一个有力的牵制。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囿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谡”的一幕了。

根据周恩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提议，一九六六年四月九日至十二日，被紧急从外地召回北京的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贯彻毛的指示。会上，邓表态拥护毛批彭的指示。康生、陈伯达这两位后来文革中的红人充当炮手，系统批判了彭真在学术批判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周则以监军的身份坐镇会议，和邓一起指出“彭真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并一起检讨了常委“失职”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撤销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二、成立以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为中央草拟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这就是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最高指挥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由来。

远在国外访问的刘少奇对祸起萧墙的情况毫无所知，甚至在回国后，奉命紧急飞住杭州，参加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专门解决彭真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途中，仍被蒙在鼓里，还把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也给彭真准备了一份。面对毛

咄咄逼人的攻势和党内力量对比的悬殊形势，刘少奇没有作任何抵抗，便接受默认了毛对自己头号干将的开刀问斩。这样，彭真成了文革祭坛上的另一个牺牲品。

一九六六年五月，作为文革全面发动标志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通过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文件《五 ． 一六通知》。

本来，这次会议完全是山毛泽东一手策划的，特别是对会议所要通过的主要文件《五．一六通知》，毛更足煞费心思，亲自主持修改，增添了大段内容，并饶有深意地在结尾处加了一段，点出文革斗争的目标就是那些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 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在会议期间，毛却有意滞留外地，躲在幕后“委托”刘少奇出面主持会议，让他用自己的手砍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毛又与林彪达成默契，让他在会议上唱主角，作一个和当年七千人大会时一样有份量的发言。

五月十八日，林彪按照预先的安排，在中央常委中率先发言，从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始，大讲“防止政变”的问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搞政变的恐怖气氛。然后，他又对毛泽东大加吹捧，说：“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

林彪的讲话随即成为会议的主调。与会者人人自危，纷纷在发言中对照林彪的讲话，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同时对彭、罗、陆、杨群起而攻之，唯恐不能划清界限。会议的气氛非常紧张，形成人人过关的场面。多年赋闲在家的元老如朱德因不明底里，在发言中走了题，被责令“脱裤”检讨，招来众人的围攻批斗。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中第二个发言，谈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周氏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党的正式会议上的首次发言。与林彪的讲话相比，这篇讲话，尤其是第三部分，虽然语不惊人，但实际分量一点也不亚于林彪的讲话。

周恩来在发言中表态拥护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为清除政治隐患而对彭、罗，陆、杨所采取的措施，宣扬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是有预见的，早就有感觉和材料，抓得准，抓得狠；并联系彭真等人当年在延安整风中“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的表现，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的道理，来说明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思想原因。

“保持晚节”是周恩来通篇讲话的中心，话虽不多，却是他在审时度势之后所精心选择的话题，刻意向毛泽东所作的内心表白。他表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态度，周氏甚至提出：“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下能定论”，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因为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都经不起考验，变成了革命的叛徒，瞿秋白临死前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而李秀成在被俘后向清廷写了“自述”，全都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周恩来说“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邓小平马上紧跟周恩来，强调周所提出的保持晚节的重要性，说：“保证不打自己的旗帜，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这样就是在一些路线性质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我们也比较容易改正。这一点，恩来同志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林彪甚至私下概括出：“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这样一类的心得。

中共党内对毛泽东风行君臣之道的这种搞法，根子还在延安整风。当年刘少奇和彭真大力鼓吹毛泽东思想，开了恶劣的先例。

第 22 集－出卖陶铸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2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是怎样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出卖陶铸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依靠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

八月下旬，针对造反派查抄工作组"黑材料"，冲击中共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拉拢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放低身段，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由于 1966 年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畲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安排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

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告以毛泽东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

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于是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会后，周恩来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随后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陶铸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央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很清楚陶铸是在代自己受过。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一开始他采取保的态度，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为了保全自己，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还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品德的低下，是欠了陶铸账的。

在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

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第 23 集－周恩来为什么在贺龙遗像前连鞠七个躬

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保护了中共党内外的一些人，不过他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他亲自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文革中不少大的案件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

周恩来绝不会出来对什么人都保。在保什么人的问题上，周煞费苦心，权衡掂量政治上的各种利害关系，除了要力争毛的支持外，还必须同时兼顾林彪和江青两方面的态度，尽可能地在毛、林、江三者往往各不相同的态度中，找出一个不得罪任何一方的立脚点来做这件事。周恩来为了争取毛泽东的首肯，就很少保党内属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北方局系统的人，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像姚依林就是北方局的人。因此，这批人在后来东山再起后，对周的怨气很大，始终不能给予原谅，也是事出有因的。

周恩来在文革中利用手中拥有的职权，有选择地保护了一批人的同时，也签字批准抓了不少人。对此，大陆官方一直讳莫如深，极力封杀，唯恐捅出来有损周氏的形象。然而，历史的真相是掩盖不了的，总是要大白于天下的。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大的冤假错案都逃脱不了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地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死亡难辞其咎。

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在专案审查的问题上，周除了抓总以外，还挂名分管了其中的一些专案，如彭德怀专案、贺龙专案等。高文谦先生曾接触过其中的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

这些东西都是周恩来本人历史上的污点，白纸黑字，是抹不掉的。

至于被毛泽东，林彪、江青钦点而被打倒的，像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等人，周恩来十分注意把握政治上的分寸，绝不越雷池一步，最多只是在枝节上做点文章，或者始保终弃。前者如刘，彭，后者如贺龙。即便如此，也可以从中看出周非常会做人，手腕圆通，善于左右逢源。他为了自保，不会挺身而出为他们仗义执言，却会在职权范围内做出某种有人情味的表示和举动，让被打倒者感激下已。

在贺龙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一样，一开始是采取保的态度。应该说，毛、周两人对贺龙是很了解的，特别是周与贺龙的交往更是长达四十年，是对贺龙投

身中共革命乃至整个人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但是贺龙与林彪，以及两人的老婆的关系却是非常坏的。

林彪之所以要打倒贺龙，有两方面的原因。贺龙的战功虽然远比不上林彪，但军中资历却比林彪老得多。当年中共南昌暴动时，贺龙是暴动军的总指挥，而林彪才只是一个连长。而且贺龙还有他自己二方面军的山头，是军中唯一有实力和林彪抗衡的人物。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称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子"。更让林彪窝火的是，文革前，贺龙在代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与罗瑞卿打得火热，一唱一和，在全军中搞大比武，获得了毛泽东以及中央一线领导人的好评，大出风头，而把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抛在一旁。

文革一开始，林彪在扳倒罗瑞卿之后，很快便开始对贺龙下手，指使他的亲信向毛泽东写告状信，指贺龙插手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的运动，企图篡军夺权。并且通过康生散布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的谣言。稍后，林彪亲自出马，以接班人的身份，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向各方打招呼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担心主席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在倒贺的问题上，林彪和江青两人联手，不断掀风鼓浪，社会上打倒贺龙"之风愈演愈烈。

毛泽东本来对贺龙一直有好感。原因在于行伍出身的贺龙曾在历史上帮过毛的大忙，一件事是当毛执意要和江青结婚而遭到党内众人反对时，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贺龙拍毛马屁，乃至耍起粗来，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 另一件是毛泽东在与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斗争中，贺龙虽只是一介武夫，却坚决站在毛这一边，说：毛主席的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王明懂什么？他要骑在主席头上，我就一枪撂倒他。贺龙的这番话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

周恩来本来也是力主保贺龙的，为了表明贺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周还利用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的机会，有意把贺龙安排在毛所乘坐的第一辆检阅车上，而把林彪放在第二辆车上。为此，周恩来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说这张新闻照片不能发，因为不能反映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双方斗了一个晚上，最后还是周本人想出来个补救的办法，提出在林彪的那张新闻照片中，另外加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文字说明。这样，林彪在政治上的分量超过了贺龙，这场风波才算过去。这也是林彪在文革中被称为毛的"亲密战友"的由来。

但是，后来"打倒贺龙"的势头越来越猛。周恩来看出来者不善，背后是林彪在指使时，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他不愿意为此而得罪身为副统帅的林彪。不过，好在毛泽东的态度还没有大变，因此还可以利用毛作为挡箭牌，来抵挡来自林彪、江青两方面的压力。一九六六年底，随着整个形势的恶化，贺龙的处境也愈加困难，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数次被抄。国家体委的造反派日夜纠缠，逼得贺龙东躲西藏，无处安身。在这种情况下，周代表组织出面建议贺龙暂停工作，搬到西郊新六所去休息，表示"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关于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自己家中加以保护一事，被中共宣传成他在文革动乱中保护贺龙的佳话。其实，真实情况并不如此，应该说，并不是周主动去"接"的，而是贺龙"谏宫"的结果。根据大陆官方出版的《贺龙传》说，贺龙搬至新六所后，造反派立即追踪而来，扬言要前来揪斗贺龙。

为此，贺龙的妻子薛明曾三次向周告急，但都没有得到答复。在下得已之下，贺龙决心返回东交民巷的家中，坐等被揪。在路过中南海时，贺龙觉得应该向周报告一下，就临时决定去了西花厅。当时周不在家，他的秘书经请示后，贺龙夫妇便留在西花厅暂时住了下来。

贺龙夫妇的不请自来，对周恩来来说是一个"烫土豆"。但在当时情况下，无论于公于私都无法把落难的贺龙推出门外。据知情者说，贺龙与周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总理，贺龙今日有难，我这次是来求你来了！在贺龙看来，四十年前，国民党清党后，正是中共最困难的时候，周代表中共请求他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如今自己有难，周理应搭救。周本人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而且眼下贺龙确实无处可去，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硬着头皮，把贺龙暂时收留在自己的家中。

在此期间，周恩来大妇对贺龙大妇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不过却敬而远之，竭力避免谈论贺龙本人的问题。因为向深知这件事在政治上的利害，知道贺龙有一肚子的委屈，急于找他倾吐，而周恩来却不愿为此得罪林彪。周的这种回避态度，让贺龙感到相当失望和伤心。当时他每天站在窗前，盼着周恩来回来，渴望能够有一个机会向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说说心里话，申辩一下林彪加在自己头上罪名，希望为他说句公道话，而周却始终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

后来真正导致贺龙大难临头的，是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毛出于发动"全面夺权"的考虑，在政治上需要林彪的支持，因而在贺龙的问题上开始改变态度。有了毛的默认，林彪立即升高了批贺的调子。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说：贺龙是个土匪，几十年来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经常请客吃饭，拉拢干部，在各军区、各兵种都有他的人，是反毛主席的。他到处夺权，是个"刀客"。而且林彪还亲自出面找周谈话，向他摊牌。在这种情况下，周权衡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只好对不起贺龙了，屈从林彪的压力，把贺龙从家中交出来。不仅如此，周本人还奉命扮演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代表中央找贺龙正式谈话，实际上是宣布在组织上对贺龙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这一幕，大陆官方的《贺龙传》这样写道：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遗育，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有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贺龙的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在他被周恩来送到西山象鼻子沟军委前指所在地，名为"保护"实则失去人身自由以后，当年派遣熊贡卿充当说客前往对贺龙进行劝降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之子晏章炎写信给中央文革，把这件事翻

出来，指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这正好给了林彪人做文章的由头，立即批转周、江等人，并指派空军组织人"调查"。

本来弄清这件事情并不难，贺龙处决了熊贡卿一事，中共领导层中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当年湘鄂西中央局为此事写给中央的报告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身为中共资深领导人的周恩来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不过当调查组按照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上报以后，他却没有出面为贺龙辩护，相反还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附和了叶群的提议。据中共文献报导，熊贡卿是贺龙的救命恩人，他在当年贺龙刺杀湖南军阀事发后出手援助，使得贺龙从法场上逃下了性命；而贺龙在文革中又死于熊贡卿一案，真可以说是天网恢恢。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正当贺龙在囚禁之地天天望着通向山下的小路，眼巴巴地盼着周恩来兑现许愿而接他出去的时候，中央在九月十三日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立案审查。而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作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无论人们可以找出多少理由来为周恩来辩护开脱，诸则贺龙平日重用的某人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的"历史问题"，从背后捅了一刀，让中央一时真假难辨，但周在贺龙后来被迫害致死的问题上，是难辞其咎的。"

事实上，周恩来本人心里是非常清楚自己是欠了贺龙的账的，后来在他病重的时候，强撑着一定要去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当人们再三劝阻时，周表示：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我不能不来啊！并在贺龙的遗像前先后连连鞠了七个躬，又做了一场秀。

第 24 集－周恩来和陈毅，谭震林划清界限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4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在"二月逆流"事件周恩来是怎样紧跟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划清界限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文革历史中的"二月逆流"事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的。自从 1966 年十月间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林彪的提议，发出《紧急指示》后，军队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样蜂拥而起，成立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踢开中共党委闹革命，四处串连，中共军队由此日益卷入文革的狂澜之中。

本来，林彪此举是想配合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略部署，并趁机在军中排除异己，结果却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包括国防部等在内的各级中共军事机关不断遭到冲击，就连林彪的亲信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被造反派揪斗，不是被迫东躲西藏，就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闷得半死。一时间，各军区纷纷来电告急求救，叫苦不迭。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常委碰头会，商讨军队开展"四大"的问题。会上，几位中共元帅与江青、陈伯达的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第二天的会议更是吵成一团，会场大乱。会后，叶剑英以军委日常工作

主持人的身份，向顶头上司林彪告了江青、陈伯达的状，把中央文革一干人对军队的指责攻击全部端给了林彪。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事情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深知军方将领和中共地方干部不同，得罪不得，弄不好会逼反。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笼络军队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政治需要，毛不得不出面安抚群情激愤的军方高级将领。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也对中央文革责难军队的作法表了态，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随后，他把江青叫到毛家湾家中，对她大发了一顿脾气，并把跟前的茶几都给掀翻了，喝令叶群把江青赶走，并要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辞职不干了。

林彪的态度转趋明朗，几位中共元帅又趁热打铁，由徐向前登门当面向林彪反映情况，敦促他参与制定了旨在稳定军队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报送给了毛泽东。这样，以毛亲自批准军委《八条命令》的下发执行为标志，军方老帅打赢了二月抗争的第一个回合。

"大闹京西宾馆"的风波，让毛意识到军队与中央文革的关系紧张。为了平息军方将领的不满，善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故作姿态，拿军队意见最大的陈伯达、江青两人"开刀"，提出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江二人，不过只限于文革小组内部范围。

一时间，毛批评陈伯达、江青的消息在党内高层中不胫而走；再加上副统帅林彪也狠批了江青一顿，表态支持稳定军队的措施。这种形势使党内军中的元老们士气大振。他们早就对文革运动的搞法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借毛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起来进行反击。

而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中真正看出毛泽东用心的少数人之一。他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毛批中央文革不过是故作姿态，所以从一开始周恩来就有意识地和党内军中元老的抗争保持某种距离。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会上，军方老帅首先站出来批驳中央文革。叶剑英指斥陈伯达要把军队搞乱。中央文革一干人因为刚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收敛了许多，在会，正处于守势，只是偶尔出来强词辩解。

二月十二日继续开会时，双方斗得更加激烈。这次在会上唱主角的是国务院的两位副总理谭震林和陈毅。素有党内"大炮"之称的谭震林在会前指斥中央文革一干人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并气得夹起皮包，拂袖而去。 接下来，陈毅提到了延安整风，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 ......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接下来，陈毅讲得更厉害，已经超出对中央文革的批驳，直接针对林彪，而且影射毛泽东了。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一上台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在上述"大闹怀仁堂"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严守中立，很少说话，对双方的争论基本上没有参与，也没出来制止。只是在一旁听着。不仅如此，周恩来还有意和会上"出格"的言行划清界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马上向江青作了汇报。为了逃避批评而在家称"病"不出的江青知道已经抓住对手的把柄，马上精神大振，并立即安排张、王、姚二人连夜向毛泽东当面汇报。

陈毅关于延安整风的那段话，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揭了毛在党内一贯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打一派拉一派的老底。在当年的延安整风中，毛正是依靠了刘少奇这一派人为他打天下，斗垮了所谓党内教条和经验两个宗派，才确立了他自己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刘少奇一干人又被他一脚踢开，沦为文革的斗争目标，罪名比当年的王明还大。

被人当众揭了老底，对习惯了被承旨逢迎的毛泽东来说，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其内心的恼怒可想而知。他很清楚，如果下马上采取断然手段，把这次党内高层的反对声浪压下去的话，不仅文革运动会半途而废，而且他本人也将威信扫地，刘少奇一干人也将乘机杀回马枪，在政治上清算自己。

毛泽东在着手反击前，是做过精心的盘算和准备的。这也是他没有急于发作的原因。在毛看来，在党内高层中，有两个人是必须争取的：首先是林彪，其次是周恩来。林彪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只要掌握军权的林彪和他一条心，大局就乱不了，就不怕这些老家伙闹翻天。而争取林彪支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陈毅在"大闹怀仁堂"中影射林彪的那段话端出来，告诉他的接班人地位不稳，在党内军中有很多人不服。

为此，毛泽东在反击前，特意把叶群找来单独谈话，做了工作，说：现在老帅们不听我的，我准备带着林彪到南方去闹革命，打游击，重建一支解放军。为了笼络林彪，毛并特许叶群今后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随后，毛又专门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江青虽然刚刚挨了林彪一顿臭骂，不过她知道拉住林彪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军队和文革小组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关系不能搞僵，一定要搞好团结，共同保护文革大局。为此，她暂时把心里的不快放在一边，执行毛的意图，登门拜访，做通了林彪的工作。

二月十八日午夜，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其中包括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以及代表林彪出席的叶群。会上，毛指责"大闹怀仁堂"的矛头是指向他和林彪的，是为刘少奇、邓小平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是为王明、张国焘翻案，等等。接下来，惯于逢场作戏的毛泽东又故意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

在场的人没有人敢吭声。其实，毛发这样大的火，有相当成分是在做戏，因为不如此就无法压住中共党内强大的反对声浪，文革也将半途而废。同时，毛做得十分老到，有意不点周恩来的名字，把他与党内元老派分割开来。这样对周既是一种拉拢，也是一种警告，让他好自为之。周恩来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虑，表

白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党内元老派的言行是有过斗争的，他特意让王力整理了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并在紧要之处作了若干修改。比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当谭震林准备拂袖而去时，记录稿中原只注明"总理要谭回来"，周本人添加了"拍了桌子"四个字。又如，当陈毅提及周恩来曾在延安整风中挨整时，周除了加上了自己当时的对答："应该检讨，整得对嘛"，还特别注明："陈先挑拨康老，后挑周"。

毛泽东则趁势下台阶，要求政治局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这件事，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就这样，这场文革期间在中共党内高层中仅有的一次集体抗争，在毛泽东的淫威和周恩来的帮衬下，顷刻瓦解，整个形势随之逆转。正是由于周的屈从和退让，逢君之恶，毛才更加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因此周恩来实乃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帮凶。

就是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对周恩来的这种做法也早就存有非议。当年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就对周恩来明知国民经济面临的困难形势，却不敢在会上讲出来，非常有意见，曾当面指他"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两句话。一句是：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拖得那么久。邓小平对周的这段评价并没有点出了周氏在文革期间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表面上好像减轻了文革的灾难，实际上延长并加重了文革的灾难。如果没有林彪，周恩来的支持和帮衬，文化大革命也许不会发生。

第 25 集－刘少奇专案：周恩来的人性是怎样被党性吃掉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5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 介绍周恩来在刘少奇专案过程中，人性是怎样又一次被党性吃掉。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 (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

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追随毛泽东的周只好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开始时，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 "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可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共中央。

不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的材料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 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中共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

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刘少奇的"罪证材料" 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造假开刀罢了。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党性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十天之后，周恩来终于打破缄默，对刘少奇一案正式表态。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执笔起草了由他本人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共同签名上送的报告，把刘少奇所谓历史上三次叛变的"罪行材料"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报告称："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他还在刘少奇被捕叛变"罪证材料"的传阅文件上也批了一大篇话，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回应江青。他写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批注和看法. 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我们要万分感谢林副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声音(语录)广泛地传达到几百万解放军和几亿劳动人民中去。没有几亿劳动人民和几百万解放军战士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如何能够发动这场有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自下而上又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 "

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尽管周恩来在批语中狠狠地踹了刘少奇一脚，所用的语言和江青如出一辙，并且用相当肉麻的言词向毛泽东表态效忠，对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吹捧林彪和江青两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却没有打消毛内心对他的疑虑，因而不想轻易放过他。为此，毛指定由周恩来在随即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关于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报告。这一手十分老辣，把周恩来彻底拉下水，让他为刘少奇一案承担历史责任，以后即使翻案变天，周也是有口难辩。周恩来终于党性克服了人性，为毛泽东火中取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这件事成为周氏在文革中一大罪行。知夫莫若妻，邓颖超曾对中共党内一批总想"扬周贬毛"的老干部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这么搞，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

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应该说，邓颖超在这一点上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知道有些事情在历史上是回避不了的，也无法为自己的丈夫辩白，只能听任历史来评判。

历史总是在不断捉弄人的。毛泽东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剪刀除掉心腹大患刘少奇后，到头来却发现扶植起林彪这样一个更加难于驾驭的对手，这完全打乱了毛原本想通过召开中共九大来巩固文化大革命既成格局的部署。实际上，九大召开之日，就是毛、林两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之时。在刻意营造的"团结、胜利"的表面气氛之下，新的一轮中共党内权力斗争已经悄然展开。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就又被卷入到另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之中。

第 26 集－毛泽东与林彪翻脸之前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6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与林彪翻脸之前，林彪是怎样与毛泽东，江青相互勾结。本次节目的部份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同周恩来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类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他不但打仗精明，曾为打下红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计，对毛泽东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中共建政伊始，林彪就有意不问政事，推说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挂帅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发了"转业费"。当时，林彪曾一度动过到偏远省份当个地方官的念头，随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林彪险些卷进去，更是让他深感毛泽东的翻覆无常。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闭门索居，韬光养晦，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尽量避开政治旋涡以自保待时。

然而，林彪的韬晦之术自然瞒不过毛泽东。作为多年来精心培养，一手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毛当然不会让林彪超然政治，独善其身。在毛的政治盘算中，林彪这颗棋子迟早是要派上用场的，不过当时主要还是针对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一直在韬光养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一旁静观，会议中间，他被毛泽东紧急召上山来，参加批彭斗争。蛰伏多年的林彪在审时度势后，对毛投桃报李，在批斗彭德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对彭大张挞伐，刀刀见血，指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式的人物"，称："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林彪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赏识。会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从隐居走上前台，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看出当时党内已经形成"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的形势后，林彪为了保权固位，带头大捧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采取"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搞起了狂热的造神运动。

其实，林彪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的揣摩和批判远远超过彭德怀、刘少奇等党内高层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辞典中"个人崇拜"的条目旁写道："他自我崇拜，自我

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而毛的反修斗争则是"骂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林彪这种私下里对毛的贬斥，甚至让他涉世未深的女儿林豆豆在震惊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发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未遂。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林彪在 1966 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泽东，唱政变经，为文革的发动造舆论。不料，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给江青的私房信中说了一大篇"黑话"，反指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让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兴。所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连疗养。

接下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由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接班人。对此，林彪一度推辞再三，乃至正式写了书面报告。平心而论，林彪的这种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戏，而是因为他深知毛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无常的缘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结局会很惨，刘少奇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当毛准备让林彪接班的趋势日益明显时，林彪并不大想"骑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边的炉火上烤，为此，林彪一开始并没有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而是有意请了假，在大连疗养。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决心换马，指派汪东兴前去传他的话，让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让周恩来安排专机接他，林彪被勉强拉回来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会堂，毛亲自登门看望，做他的工作。

林彪做了接班人，就开始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摇旗肋战。他一登台就不同凡响，在全会期间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表态坚决支持开展文革运动，说 "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好觉，无产阶级也睡不好觉"。并在十一中全会后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讲开展文革的必要性，强调要"以主席为轴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提出："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过，林彪很快就发现自己所谓"接班人"的头衔只是个虚位，在毛泽东重返第一线、独揽大权的情况下，即不像刘少奇在位时那样握有实权，甚至连周恩来还不如。因为在新的党内权力格局中，决断权在毛，执行权在周，而他不过是一个摆设。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卖力不讨好。毛泽东对他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捧他的讲话抓住不放，不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给江青，白纸黑字，落下把柄，而且专门指派周恩来前来转告，还在党内高层中传阅，弄得不少人都知道。这让林彪着实领教了毛为人的难以伺候，同时看出所谓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两人合开的夫妻店，他虽然贵为"副统帅"，但那只是毛"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不过，林彪对这种状况虽然很不满意，但也不便表示什么。他的对策是称病不出，当甩手的二掌柜，对运动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从不主动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大事不麻烦，小事不干扰"。叶群则把它总结为"三不主义"，即

"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这样既免遭毛泽东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不仅如此，深知毛泽东为人猜忌的林彪还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举动，反对诸如"副统帅"、"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一类提法，乃至郑重其事地写信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声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应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与此同时，林彪又煞费苦心地营造自己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的形象，所谓"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突出主席"、" 主席划圆我划圈"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叶群为林办工作人员立下的规矩，要求"随时提醒首长"，帮助把关，就连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要求既不能抢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叶群又要求林办的秘书在批送文件时，更进一步把原来对毛泽东所用的"请"和"送"等字，一律改为"呈"字，对此，叶群曾说得很明白："首长所处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当然，林彪并不甘心听任毛泽东的摆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讲究实力的，而且看准了正在进行的文革运动正是一次可以浑水摸鱼，扩展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紧跟"的姿态，配合毛斗倒刘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来经营，扩充个人在党内军中的势力。林彪本来在军队就有一个小圈圈，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着"在组织上全面调整"的旗号，排除异己，招兵买马，拉起自己的队伍。

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亲信交底说："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过来一批，保护一批。拥护你的人要保，反对你的人要打倒，中间的人拉过来。"林彪本人就采用这种手法，利用当时北京"五一三"事件后中共军内两大派斗争的形势，一打一拉，压垮了"冲派"，很快便控制了军中的局面：支持林彪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称雄于北京街头，而且扶植起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的以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为嫡系的集团。

林彪在军中拉帮结派的搞法，当然逃不过毛泽东的眼睛。毛对此自然不大高兴，但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暂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同时，鉴于当时军队已成为防止局势失控的中坚力量，于是毛有意让军队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来稳住北京的政局，进而稳定全军。然后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毛对林彪扩充势力的种种作法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在趁乱打劫这一点上，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为了报私仇，让叶群去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 江青还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查抄赵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销毁她当年在上海当三流演员时落在他人手中

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则先是请江青出面保吴法宪、邱会作等手下几员大将，后来又为了整掉杨成武，策动江青去说服当时对杨有好感的毛泽东，同意把他拿下来。事成之后，林彪对江青投桃报李，在宣布打倒杨成武等人的大会上，带头吹捧江青，称她"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决定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升到五级。

狼狈为奸，终究不能长久。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开始激化，毛泽东开始要整林彪了。

第 27 集－林彪和江青开战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7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翻脸之前，林彪是怎样与江青开战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三月发生的"杨、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两大势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双方虽然也有某些龃龉，但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在此之后，尽管仍然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暗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特别是当共同的政敌已经被收拾殆尽，双方大体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联盟随即出现了裂痕。还没有开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头号亲信黄永胜撕破了脸，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文革开始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杨、余、傅事件"后，被林彪亲点进京，接任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毛泽东最初也很器重他，在得知黄参加过中共秋收起义后，更是对他宠信有加，把黄视为自己的亲兵，九大时曾有意让他进入常委。所以，黄一度在政治上红得发紫，锋头超过江青。让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黄永胜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儿来了个下马威，整得灰头土脸。起因是原来军委办事组在写关于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时，要列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等一大堆名字。这样传阅起来很费时间，容易误事。后来军委办事组请示了毛之后，有关军队调动这类事情就不再报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对此大为不满，认为这是黄永胜目无中央文革，在搞"独立王国"。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间的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江青大发雷霆，指着黄永胜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军委办事组搞"军党论"，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对她封锁消息，宣称："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黄永胜、吴法宪停止参加文革碰头会，清理思想，还取消了原定由黄率代表团出访阿尔巴尼亚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这样跟黄永胜过不去，倒并不全是因为黄在政治上的风头超过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其中缘由一直可以追溯前面提到过的在"大闹怀仁堂"之前，林彪斥骂江青的那一场戏。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但

又对林彪奈何不得，于是迁怒于人。再加上当时黄永胜也曾经在军委常委碰头会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江青，后来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江青非要他作检讨。黄永胜在请示林彪后，始终顶住没有理睬。江青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这次，黄永胜进京是林彪亲自点的将，又因获得毛泽东的赏识，所以不大买江青的账，没有上门烧香拜佛。这样，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账新账一起算。

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窝里斗，迫使周恩来又一次出来充当和事佬，将双方往一起撮合。这件事很显然是江青在无理取闹，不过慑于她的特殊身份，除了毛泽东以外，别人根本碰不得，所以当江青对黄永胜大发雌威时，周明知事情的原委，当场也不吭声，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汇报。毛听后表态说：不要理她，让黄照样当团长，率团出访。

有了毛泽东的表态，周恩来心里有了底，于是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叶群到钓鱼台登门拜访江青。到了好一会儿，江青才从楼上姗姗下来，站在楼梯上就向黄、吴劈头盖脸地骂起来，在场的康生、姚文元则在一旁帮腔。 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则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老老实实地听着江青的训话，一声不吭。

周恩来这种明显"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议。汪东兴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周对江青太迁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对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纵容江青"。周明知这是在转述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他既不为自己辩解，也不当真照办。因为以他多年来相处的经验来看，他实在太了解毛与江青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的关系了，所以对毛的话不能太认真，否则就会自讨苦吃。

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毛泽东提议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由林彪来作，指定由陈伯达牵头，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报告。陈伯达本来是属于钓鱼台营垒的，虽然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实际上却是江青的傀儡。为此，他曾多次自称自己是个"刘盆子"，刘盆子是汉朝的傀儡皇帝。陈在文革小组的日子很不好过，江青经常当众揶揄、训斥、羞辱他。为此，陈伯达曾几次被逼得想自杀。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陈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当众讥笑他是"乌笼院"的院长，就连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小字辈"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着江青，"骑在他的头上拉屎拉尿"。

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不得不转向林彪，寻找靠山。而林彪为了挖江青的墙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过叶群利用福建同乡的关系，对陈进行安抚笼络，而且还亲自出面替他讲话撑腰，说："陈伯达是好人，一个书生掌握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处于困境中的陈伯达对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渐倒向林彪一边，成为毛家湾的座上宾。

陈伯达在领受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后，撇开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个人天天往毛家湾跑，同林彪商量怎样写。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林彪本来就是被毛泽东拉下水的，因此对文革运动并没有旷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民富国强，主张报告可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这个想法正好和周恩来不谋而合，陈伯达为此曾私下征求过周的意

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彪更加受到鼓舞。

根据林彪的这一思想，陈伯达拟定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政治报告大纲。陈伯达的稿子一拿出来，便在毛泽东主持的讨论会上，遭到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说这是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报告。毛也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毛否定了陈伯达的稿子，决定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另起炉灶，再写一个比较比较。林彪、周恩来见毛表了态，都不再吭声。

接下来，在讨论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时，陈跳出来反唇相讥，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搞运动。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没想到这一下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大为恼怒，狠狠批了陈伯达一顿，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列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更令毛泽东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陈伯达老往林彪那里跑，认为陈老病复发，又在政治上搞投机，见自己老迈年高，便改换门庭，往林彪那边靠。于是，毛又把历史老账翻出来，指桑骂槐，批陈伯达一贯在他和刘少奇之间搞投机，"脚踏两只船"。最后，毛泽东表示张春桥的稿子"大体可用"，而把陈伯达的稿子退了回去。不仅如此，毛甚于还动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陈排出常委的念头。大半辈子为毛起草和修改文稿的陈伯达见毛原封不动地退回自己的稿子，连看都没看，不禁伤心地大哭了一场，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个乖觉的人，当然能听出毛泽东发这顿无名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虽然不高兴，但由于毛已经明确表态，便不再说话了。不过，他从此记恨上张春桥，多次在私下表示："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来的小记者，他们写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说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台作报告之前，对张、姚所写的稿子甚至连一遍也没有看过。

在中共九大期间，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变本加厉，双方暗中使绊，互相拆台，算计对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报告念得 "结结巴巴"一事，纷纷在文革碰头会上提意见，让林彪下不了台。林彪布置他的亲信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做了手脚，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的选票压了下来。这让"文革旗手 "江青当众出丑。

江青由此对林彪、叶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处处提防。先是怀疑他们在她钓鱼台的住地安装了窃听器，在翻腾了一个够后，索性搬了家。随后又交代秘书把和毛家湾之间来往的文件和电话记录统统保存下来，说："叶群这个人怪点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不多长几个心眼，弄不好就被她给绕进去了。"
和中共公开宣扬的“九大是个团结的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正相反，随着林、江双方的钩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泽东投入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开始支持不住了。

第 28 集—毛骗林彪 周骗吴法宪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8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与林彪公开翻脸前后的周恩来。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毛生性猜忌多疑，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从来就没有真正相信过任何一个人。即使是对自己的"亲密战友"林彪，也始终存有戒心。他一方面同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破天荒地写入党章，另一方面又设法在权力布局中平衡林彪的势力，不动声色地做了这样三件事： 一是借周恩来牵制林彪。在最初的党内人事安排中，除了林彪之外，毛泽东还曾提名周做另一名党的副主席，只是后来被周本人坚决反对掉了。二是有意打破由林彪指挥过的一方面车在军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安排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位大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陈锡联进入政治局，并亲自指定四方面军出身的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成员兼总政治部主任。三是始终不同意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把邓作为他手中保留的一张牌。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这是林彪暗中对毛泽东揣摸多年之后所总结出来的心得，又恰好道出了毛在庐山会议开场后陷入的窘境。实际上，毛的内心恼火并非始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而是在前一天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已经非常不高兴了•会上，除毛本人外，其余几名常委都异口同声地劝说毛出任国家主席。林彪、陈伯达自不待言，就连属于文革派营垒的康生也恳请毛能够出来担任这一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处事谨慎的周恩来也表态支持设立国家主席的主张。为了说服毛，甚至还提出一个设想：今后在接见外国使节等国事活动时，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别人代行。在上庐山后，他还特意请陈伯达准备一下宪法中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不过话说得很活：等一等看看毛主席的意见，备而不用。

这样一来，在设国家主帝的问题上，中央常委内部形成了四比一的局面，毛泽东陷人孤立的窘境，进退两难。让毛有口难言的是，他本人不赞成设国家主席的真实意图不好明说，又找不出更恰当的理由来说服众人。毛泽东几近恼羞成怒，乃至表示：你们愿意要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并且放出这样的话来：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在看到毛泽东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陷入窘境，几乎发作后，林彪决定暂时不再提这个问题，转而在全会上端出张春桥的问题，迫使毛在他本人和张春桥之间作出选择，就像当年对罗瑞卿、贺龙等人曾做过的一样。

在林彪看来，这次应该是稳操胜券-一既然当初毛泽东可以为了拉拢他而抛弃跟随多年的贺、罗两人，就更不会为了张春桥这样一个"小记者"而得罪自己了，况且他已经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作了让步。但是，这一回林彪却打错了算盘，竟不知形势已经迥然不同了。当年毛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对林彪刻意笼络迁就，而现今在毛的眼里，林彪已经成为急于翦除的对象。因此毛的态度也就完全两样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确实是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的约定讲的，对张春桥并没有指名道姓，只是用隐晦的语言，批驳了所谓"迷迷糊糊的思想"，说：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还在幕后对叶群面授机宜，要求军委办事组成员在各组讨论时要表态拥护自己的讲话，同时给叶群规定了发言口径："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林彪并叮嘱在发言中不要点张春桥的名，同时不要扩大打击面，牵涉江青、康生两人，否则毛那里通不过。

随后，在叶群的指挥下，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分头活动，串连了空军、海军、总后的一些中央委员，进行交底和动员。陈伯达则连夜选编了一份《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 从八月二十四日起，全会改变了原定议程，各组转入讨论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叶群、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所在的小组发言，大讲"天才"问题，说"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同时暗示党内目前有股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风，中央有人想把这股风往下吹，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翻历史的案。其中华北组闹得最凶，本来就与张春桥结怨甚深的陈伯达，在从林彪那里得知他的讲话是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后，更是不再有什么顾虑，在华北组的发言中猛攻党内"陆定一式的人物"。同组的汪东兴也不甘寂寞，提出"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八月二十五日，华北组的第二号简报印发全会，提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份简报在全会中点了一把火，各地纷纷仿效华北组，或联名写信，或通过决议，要求揪出"毛主席身边的野心家、阴谋家"。

在这场风波中，周恩来再次显露了善于在政治风浪中游泳的两面派本领。同被蒙在鼓里的普通中央委员相比，对他来说，会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并不全是突然袭来的：周既了解事情的起因--八月十三日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那场吴法宪和张春桥的争论，也完全清楚林彪讲话的矛头所指，而且亲眼看到林彪在讲话前曾和毛泽东单独谈过话。

当吴法宪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全会学习林彪在开幕会上的讲话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仅表示赞成，而且还决定先听两遍录音后再讨论。这在实际上改变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原定议题。当然，这是请示报告过毛泽东的。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对林彪憋了一肚子火的毛尽管对这个提议不悦，但因为这是政治局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便表态反对，只是冷冷地表示："大家同意我同意"。

善于观风的周恩来当即从毛泽东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中，意识到问题并不简单。毛对林彪讲话的态度很难判定，形势可能有变，随即在政治上为自己留了退路。于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的分组讨论中，参加东北组讨论的周对自己的表态发言颇花了一番心思，竭力在政治上左右逢源。一方面，周恩来点出林彪的讲话具

有"针对性"和"纲领性"，表态赞同林彪关于称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甚至还使用了发明权属于林彪而被毛多次删掉过的那三个副词，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毛主席叫我们不要总强调三个里程碑，但客观上就是这样。"另一方面，周恩来在发言中又避免暗示"揪人 "，着重讲"保持晚节"的问题，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圆的余地。

果然，仅仅一天之后，整个形势便由于毛泽东的强力介入而逆转，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华北组的二号简报分发全会后，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十分恐慌，立即由江青带着紧急面见毛，反映全会各组"揪人"的情况。实际上，毛对整个事态了如指掌，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毛之所以同意林彪在全会上作针对张春桥的讲话，并告以"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如果不是有意设下圈套，欲擒故纵的话，那么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地挑拨林彪和江青之间的矛盾，以便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事情竟然闹到这一步，却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中央全会闹翻了天，各大组异口同声地要"揪人"。政治经验老到的毛马上就看出这是林彪在下面搞鬼。他在随后与康生的个别谈话中就点出了这一点，直接把林彪端了出来，说他不当中央主席了，这会让林彪去开，他下山不参加会了。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疑心极大，现在林彪竟然又在他的眼皮底下发难揪人，而且有这样大的号召力，就连许世友、陈锡联这些并不是林彪山头的大军区司令员在林彪讲话后，也都主动上前握手表示，祝贺。这使得毛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这次采取默认的态度而让林彪得手的话，以后他本人势必被架空，完全成为政治上的傀儡。接下来，林彪还会得寸进尺，最后搞到他头上来。

于是，毛泽东决定迅速展开反击。熟谙"先孤立弱小之敌"一类攻伐之道的毛分而治之，先稳住林彪而拿陈伯达开刀。八月二十五日下午，毛紧急召开了有全会各大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严厉批评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把会议的方向搞偏了。毛充分施展了擅长演戏的本领，软硬兼施。会前，他当众握着许世友的手，说我的手都发凉，还能当国家主席？让我多活几天吧。会上，毛泽东又故伎重施，把当年弹压"大闹怀仁堂"的那一套拿出来，以危言相要挟，不过这一次已经不再是"我和林彪同志上井冈山打游击"了，而变成：你们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去闹，…，。再不然，就辞掉党中央的主席!" 并决然表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了。"与会者见毛泽东真的动了怒，说出这样的绝话来，都不再吭声，林彪也没有料到毛竟会如此翻脸，弄得一时措手不及，他虽然有心替陈伯达说话，但见毛的态度这样决绝，没有任何转圆的余地，再加上对私下串连倒张的搞法也有点心虚，看毛已经把他与陈伯达分开，只好舍车保帅，把自己洗刷干净，说他过去与陈伯达没有接触，军队里吴法宪这批人也没有与他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了火。然后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根据毛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并责令陈伯达请假检讨。

这样一来，整个形势急转直下。同处境狼狈的林彪恰好相反，周恩来意外地在这场林、江两派的争斗中成为实际上的大赢家，在政治上的分量赫然加重，一时间

成为会议前台的主角，忙于和各方人物打招呼，做工作；同时也是当时唯一能够缓冲毛、林两人之间紧张关系的人物。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陈伯达只是个替罪羊，这场风浪是由林彪讲话而起的。为了避免把火引到林彪身上，他当时煞费苦心，连夜校阅林彪的讲话直到天亮，仍不放心，又专门为此事写信给康生，说：为使林副主席讲话不发生任何副作用，请你起来后认真读两遍，如需要改动处，请用铅笔改上于午前退代亲收。此举纯属爱护副帅，忠(于)党，忠于领袖，以此共勉，暂勿告人为恳。"

随后，周恩来又劝说吴法宪争取主动尽快写出检讨，为林彪讲话承担责任。他对吴说："现在要保护副帅，这是由副帅讲话引起的。法宪，你出来作个检讨，承担责任，不然就要搞到副帅头上了。" 并给他出主意说，在检讨中要重点写自己对林彪的讲话"理解错了"。

周恩来是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在毛泽东展开反击后，他随即调整了以往的策略，开始同林彪一派拉开距离，并有意洗刷他本人与这场风波之间的干系。为此，周在追查中示意吴法宪应该在政治局决定全会讨论林彪讲话的问题上替他讲几句话。吴法宪果真照做了，把责任担了起来。不仅如此，周还一再要吴法宪出来证明他当初曾经批评过黄永胜不愿留守北京，非要上山这件事，以便让毛知道他并没有上林彪的这条船，事先并不知情，而且是有过斗争的。

此外，周恩来还设法补救他过去对张春桥一直比较冷淡的态度，刻意在一些场合当众表扬张、姚两人，说他们这回姿态高，照顾大局，不计较别人的误解，事后还主动在发言中讲了维护林副统帅的好话。与此同时，周要求林彪这一边也这样做，对张春桥抛弃成见，把双方往一块撮合。八月二十九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氏曾经连续三次给主持会议的林彪写条子，希望他在讲话中表扬张春桥、姚文元几句，以利团结。但林彪根本不予理睬，令他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林彪这样做并不是存心驳周恩来的面子，而是冲着毛泽东而来的。与周的为人不同，林彪个性倔强，从不轻易认错，而且也是中共党内少数敢于当面顶撞毛的人。他早就对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朝秦暮楚深为不满，这回更是觉得受到毛的欺骗而心气难平。在林彪看来，这是毛预设圈套，成心整人。先是在他讲话的问题‘欲擒放纵，诱骗自己上钩，然后又翻脸不认账，大兴问罪之师，抓住不放。

更让林彪气愤的是，毛泽东为换取他对抛出陈伯达的支持，在八月二十五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前的单独谈话中还继续哄骗他，佯作公允，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说对张春桥、姚文元烧一烧可以，但不要烧焦，现在要降温了，压缩一下空气。甚至还表示：张春桥这个人再看他两年，两年以后我不干了，交给你处理。而实际上却明显偏护江青那一边，将张、姚他们轻轻放过。而对响应支持林彪讲话的人却严厉追究，非但陈伯达被老账新账一起算，就连还没上山的黄永胜也成了被追查的重点，同时却又放过了同样跳得很高的汪东兴，显然是在存心和他过不去。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对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气，但又不好当面对毛发泄，只好给主

持追查工作的周恩来、康生两人脸色看。相对而言，林彪对周还算比较客气，对康生就更不给面子了。比如，当康生向林彪汇报说，这次会议是"吴法宪造谣，汪东兴点火，陈伯达起哄，陈毅跳出来"时，林彪当场给顶了回去，说：吴法宪我了解，从一军团到四野跟我几十年，没有发现他造过谣。并在私下里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

对林彪的消极对抗，毛泽东装聋作哑，继续按照既定方针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不过，开始时毛泽东曾一度苦于找不到做文章的合适题目。因为如果拿造成全会混乱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开刀的话，那么就会首先整到他自己身边的汪东兴头上，该简报所摘登的汪东兴的发言，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超过陈伯达。毛为此对汪大为恼火，却不好拿他来开刀。因为这样一来就背离了主攻方向，他本人也脱不掉失察的责任。不过，汪东兴在痛哭流涕之后，马上戴罪立功，揭发出陈伯达私下选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件事，为毛解决了这个难题。

经过三天考虑，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的这份论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了《我的一点意见》，对这位"天才理论家"大张挞伐，宣称陈伯达和他"共事二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有意稳住林彪，把他与陈暂时分割开来，声称"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 云云。随后，全会围绕学习《我的一点意见》，转入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这时，毛泽东已经动了在政治上与林彪分道扬镳的念头。知情人说，当江青在叶群登门求见后，跑到毛那里为她求情，结果挨了毛的一顿训，要她"在关键时刻头脑要清醒"，"屁股别坐错了位置"。与此同时，毛开始不动声色地对此作出部署，找人谈话，寻求当年被他打入冷宫的军中老帅们的支持，他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一天深夜召见了叶剑英，吹风打招呼，希望他能支持批陈的决定。

为了给林彪吃定心丸，惯于玩弄权谋的毛泽东还在写完《我的一点意见》后，专门找林彪谈了一次话，刻意进行安抚，然后又大摆迷魂阵，当面向林彪许诺自己准备交班，说：张春桥这个人要再看他两年，现在远是保留他吧。两年以后我就不干了，把班交给你，由你主持工作。

在全会转入批陈以后，周恩来成为一个大忙人。他连日同党内各方人物频繁接谈，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既要劝说点火闹事的人作出检讨，又要做众多中央委员的思想转弯工作，还要分出身来，轮流参加各组的讨论，掌握引导会议，防止发言走火。 九月六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草草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批准了国民经济计划等报告后闭幕。会上，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和林彪的沉默寡言恰成鲜明的对照。

第 29 集－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整林彪的王牌(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29 集。在这一集我们

向大家 介绍毛泽东怎样在批陈整风中准备拿掉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以及周恩来的作用。 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毛已经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然后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有意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 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 11 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症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毛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犯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四个伟大' (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

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不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周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同时毛泽东改组了北京军区，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并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周恩来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转达，并亲自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批文的通知。与此同时，他又约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如何进行检讨，"变被动为主动"，以便争取尽快了结此事。

周恩来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作检讨，以他自己在历史上几次犯路线错误但仍得到毛泽东挽救的事实，现身说法，表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的，但"一旦觉悟了，就有了对反党分子王明的阶级愤慨而坚决批判揭发"。在他的引导下，黄永胜等人随即在会上作了检讨，并写了书面检查。周随后给毛写报告，肯定他们的检讨是"沉痛的"。

毛泽东继续抓住这件事情做文章。他一方面对黄永胜等人的检讨批道："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传话给周恩来，提出要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给大家说一说。"这就是随后

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由来。

可以说，毛泽东此举是一箭双雕：既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问题公之于众，又可借机把火烧向林彪，迫其出来检讨。于是，这个前往北戴河劝说林彪的差事便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

在庐山会议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林彪虽然因为在政治上翻了车而弄得有些灰溜溜的，但因为毛泽东给他吃了定心丸，特别是"两年以后交班"的许诺，多少让一直为接班人地位不保而惴惴不安的林彪松了一口气。因此，林彪在情绪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说，林彪下山时"情绪还是很高，和过去一样，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林彪起初还是想向毛作个检讨，私下里把这件事了结了。为此，林彪曾让他的秘书代为起草个检查。不过，林彪很快便发现情形不对，毛泽东发动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明显是冲着他来的，非但所谓"两年以后交班"的许愿是一张空头支票，而且就连他本人载入党章的接班人地位也难保。毛对斯诺"四个伟大""讨嫌"的谈话更是明摆着针对他的。在这种情况下，深感受到愚弄的林彪心里对毛的怨恨可想而知。

为此，当毛泽东让林彪见斯诺，他拒不接见，还以颜色，并私下对家人发泄对毛的不满，揭毛的老底，说："今后再也不随便讲话了。讲话都要有根据，不然你好心好意拥护毛主席，还会犯拥护过头的错误。"并愤愤地表示："什么路线，就是毛线。就是以毛划线。什么讲老实话，他(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当然，林彪对毛泽东只能背后骂，在表面上继续采取"主席划圈我划圈"的对策，以不变应万变。这时，鼓动造神运动的林彪大概才品尝到了吹捧毛泽东的苦果。面对毛在政治上步步紧逼，他陷入了和当年刘少奇一样的困境，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不过，林彪拿定主意，不管毛如何旁敲侧击，都一概装聋作哑，绝不公开站出来检讨认错。因为林彪心里很清楚，毛现在正苦于找不到废黜他的借口，如果一旦公开认错，那就正好落入了毛的圈套。

在这种情况下，充当说客的周恩来的北戴河之行自然无功而返。林彪在泛泛地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所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后，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不过，林彪在与周等人小范围的谈话中还是多少作了一点自我批评，承认自己也"犯错误"，是个"炮筒子"，"讲话有气，脱口而出，放了炮"，被陈伯达"利用"了。与此同时，林彪也为自己的讲话作了辩护，转弯抹角地暗示他的讲话是经过毛的，说这些话"见到主席我也讲过，后台讲的话，搬到前台去讲"，" 毛泽东对林彪拒不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极为恼火，认为这是在向他公开示威，但一时又不便对林彪发作，于是迁怒于黄永胜等人。毛在随后听取周恩来关于北戴河之行的汇报时，当面指着参加汇报的黄、吴、李、邱，疾言厉色地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在此之前，毛还对主要由林彪手下人马组成的军委办事组采取了"掺沙子"的措施，指派纪登奎等人参加进去。毛泽东这种在政治上步步紧逼的举措，除了陡然升高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前夕的紧张气氛外，并没有慑服林彪，相反却使他更加认为这是毛在存心整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检讨与否，结果都是一样的。于是，林彪索性横下一条心，硬顶到底，决不上钩。他一方面给连连告急的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吃定心丸，要他们稳住；另一方面又不加掩饰地对调子越来越高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表示不满。在毛泽东对周恩来就这次会议安排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一反以往对毛毕恭毕敬的姿态，只是让秘书写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的字样。至此，毛、林之间的失和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第 30 集－林彪要周宇驰“救救我们一家”(.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林彪为什么会要周宇驰“救救他们一家”。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传到北戴河后，给了林彪当头一棒。林彪本来预计毛动手的时机可能选择在十月一日之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会上，为此曾派叶群在八月上旬以检查乳腺癌为名返回北京，分别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密谈，互相通气，商讨对策。叶群向他们说，许多迹象表明，毛这回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提出要在四届人大会前及早做工作，向毛请愿，要他兑现拿掉张春桥的承诺，若毛不答应，再向毛示威，求得解决。

不料，毛泽东却提前下手，而且把本来应该首先在中央常委内部解决的问题，直接捅到下面去，四处点火放风，措辞用语甚至超过了当年整刘少奇时的分量，大有要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味道。尽管毛在南巡谈话中并没有把门完全关死，但林彪认定那只不过是毛的花言巧语而不愿再相信他了。事实上，毛所谓"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的说法不过是虚晃一枪，如果毛真有此意，根本不会在此之前一直对林彪避而不见。

据知情人说，林彪是通过不同的渠道获知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最初的想法一度是什么也不做，哪里也下去。他对叶群、林立果说；"不想活了"，摆出一副准备坐等挨整的架势。在此之前，林彪还交待身边的人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那几天，林彪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看到，林彪频频与叶群关起门长时间密谈，商量对策，叶群进进出出，眼睛都哭肿了。

林彪之所以最初萌生听天由命的念头，是由于他在评估形势后，深知即便在政治上豁出去了，和毛泽东拼死一战，也是凶多吉少。而且他此时已经看出了毛所玩弄的惹战激将的把戏，知道一旦自己有所反抗，那正是毛所求之不得的，正好坐实了毛强加给他的所谓带领军队造反的罪名。再加上林彪本人长期以来一直病病

怏怏，对政治和人生都已经厌倦，所以事到临头，一度萌生一死了之的念头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林彪并没有斩断尘缘，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如果听由毛泽东摆布，在政治上遭到整肃的话，势必株连全家。这是身为人父和一家之主的林彪所于心下忍的。在文革中因为老子倒台，儿女们流落街头，境况悲惨，这种情况已经看得太多了。况且叶群在知道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点了她的名后，惟恐毛首先拿她开刀，已经失魂落魄，整日哭求林彪带着全家躲到国外去，像王明那样当寓公。林彪被缠得心烦意乱，甚至一度表示了同意，但因林立果的反对而暂时作罢。

与叶群不同，林立果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既不同意林彪坐等挨整的消极态度，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折腾，一旦被关起来，用不了两三个月就会像刘少奇一样被折腾而死；更反对叶群的主张，不甘心临阵脱逃，而渴望与毛泽东一争高低。为此，林立果力主动用他所掌握的"联合舰队"，主动出击，同毛拼个鱼死网破。九月七日下午，林立果在和其姐林立衡的谈话中曾透露了这一想法。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在回忆录《尘劫》一书中详述了劫后重逢时，林立衡回忆当时姐弟两人谈话的情况：

林立果说："反正形势对首长(指林彪)非常不利，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说不定有一线希望！我想再看看形势发展，实在不行就跟一组(毛泽东代号)硬干！或者到广州立中央，再不行就上山打游击。首长带兵多年，军队威信高，到时把一组两面派老底全兜出去，把他干的坏事公诸天下，号召全国声讨。总会有办法的。

林立衡反对他冒险念头。林立果大发牢骚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一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说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反！首长(指林彪)忍耐那么多年，还是避不过。你就甘心眼睁睁看着首长挨整?!"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劫后余生的林立衡极力回避其父林彪在企图谋杀毛泽东的责任，而把它说成是林立果一人所为。实际上，这个主意即便是林立果首先提出来的，但最后的决心还是只有林彪才能去下。林立果纵使再胆大妄为，也不敢在谋杀毛这样的问题上自行其是，拿全家人的性命来赌博。显然，没有林彪的点头，林立果是不敢擅作主张的。

而曾经是几十万大军统帅的林彪在这紧要关头却显得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由于对手是当时被人奉若神明的毛泽东。林彪既无法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途径从正面应战，在几种应变的非常手段中也找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避免自己身败名裂、累及家人的选择。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深感毛逼人太甚的林彪只好横下一条心，转而同意林立果提出的对毛先下手为强的主意。尽管林彪明知这是一招险棋，但在紧急之中，也就只好铤而走险了。

应该说，林彪的行动是为了自保而被逼上梁山的。关于这一点，林立果在九月七日下午试图说服林立衡的那次谈话中有所透露，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今天早上，

把周宇驰(林立果的"联合舰队"参谋长)从北京找来商量，说服了首长。首长抱着老周，哭着说："我一家老小都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九月八日，林立果携带林彪所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潜回北京，紧急策划部署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然而，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一手早有所防备，毛一向深居简出，行踪诡秘，让人难以捉摸。南巡前，他已经从担任过他的机要员、其丈夫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谢静宜那里得知，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联合舰队"，正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行前，他只把此行的大体日程安排告诉了周恩来一人。南巡途中，毛更是处处加强了戒备，对行程严格保密。为防止林彪，毛泽东在向各地党、政、军头头吹风交底的同时，已经预先打了招呼，公开点出了"军队造反" 的问题，说：这几年我犯了个错误，过去军队被彭德怀、黄克诚抓去了，如今又披林彪、黄永胜抓去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了；并直截了当地警告说："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军队造反了。"

对于一些历史上属于林彪山头或是和黄永胜有渊源的大军区，毛泽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法，做分化瓦解的工作。比如，毛曾当众敲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另一方面，毛又刻意笼络他们，称"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 (指他们曾是红一方面军的)。"并指挥他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他们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这一手十分老辣，有效地挖了林彪阵营的墙角，打乱了他的部署，导致原有的打算完全落空。毛此举震住了中共党内军中林彪的势力，令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乃至倒戈一击，转而向毛反映林彪的问题。其中引起毛泽东警觉的主要是这样几件事：

一是在南昌时，当时任江西省党政军第一把手、同林彪有很深关系的程世清曾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周围的一些反常情况，其中包括周宇驰来南昌活动和找他谈话的情况，以及林立衡曾警告他的家人以后少同林家来往，说搞不好是要杀头的。
二是在杭州时，空五军军长白宗善暗中派人向毛传话说，有人并不欢迎毛到杭州来，并暗自装备飞机，要毛多加小心。

三是在毛下榻的刘庄，工作人员中有人把陈励耘暗中布置向陈汇报毛每日活动情况的异常举动悄悄报告了毛。

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存有很大的戒心，在一路上处处提防，在接获不同渠道反映的种种可疑情况后，尽管还只是一些蛛丝马迹，但已经让正在杭州逗留的毛感到来者不善，隐伏凶兆。据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在杭州逗留期间情绪越来越不安，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毛意识到自己进了"贼窝子"，于是当机立断，就在林立果携带林彪手令赶回北京的九月八日晚上，决定缩短行程，尽快返回北京。

毛泽东对自己的行止滴水不漏，甚至就连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同时，毛又故布疑阵，把他的专列调来调去，有意对外界制造十一前夕才准备返回北京的假象，两天后又突然离开杭州，取道上海赶回北京。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布下的这一迷魂汤，在很大程度上迷惑了林立果一干人。本来，策划谋杀毛的行动就是铤而走险，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障碍和难题。由于多年来中共造神的结果，毛早已成为当时整个社会顶礼膜拜的偶像，人们在思想内心存有任何一点对毛不忠的想法都已是大逆不道，更不用说对其直接下手了。再加上毛的行踪无常，住地又戒备森严，更使得谋杀行动难上加难。

在这种情况下，林立果手下虽然从九月八日夜里开始，经过两天两夜的密谋策划，设想了各种行动方案，但始终找不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与会的"联台舰队"骨干成员虽说都曾宣誓过效忠林家父子，但事到临头，大多数人还是胆怯心虚，互相推诿，强调客观困难，没有人愿意出头。

面对重重困难和部属的畏难退缩，就连主持行动的林立果也一度动摇起来，在立即动手和继续等待时机之间委决不下，只好通知了第一线指挥的江腾蛟"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但是，这样一来，正好中了毛泽东的缓兵之计。几乎就在林立果下令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九月十日下午，毛突然从杭州启程转道上海，并且下令不要通知当地负责人。到上海后，毛又一反以往下榻在顾家花园的惯例，留在专列上过夜。

返回北京前，毛泽东为了掩人耳目，又使用了"金蝉脱壳"之计，指定造反派出身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洪文代表他在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王洪文又把林立果党羽、第四军政委王维国拉上作陪，而毛本人却不辞而别，悄悄离开上海，命令沿途铁路全线绿灯，昼夜兼程北上，于十二日午后返回北京。

返回北京后，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进城，而是先在丰台车站召见了北京市党政军头头，察探动向，又对他们大谈了一通庐山会议上的斗争，并说："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在确定京城以外确实没有异动后，毛吩咐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集工兵进驻南口，以防不测，然后才返回中南海寓所。

第 31 集－林立衡的告密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1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林立衡的告密和周恩来怎样配合毛泽东故意打草惊蛇，给林彪最后一击。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九月十一日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的电话后，重新展开部署时，已经失去先机。更令事情无可挽回的是，王维国虽然在中午陪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时就已经得知毛泽东已离沪北上的消息，但害怕林立果让他出面动手谋害毛，所以直到晚上毛的专列即将驶出江苏的地界后了通风报信。这样，当林立果接获毛北上的消息时，已经是九月十一日夜里了。这时，毛的专列已安然通过苏州至无锡之间的硕放铁

路桥一-这里曾被认为是比较理想的动手地点，即将进入山东境内了。至此，谋杀毛的计划整个落空。

问题还不止于此。更令叶群、林彪胆战心惊的是，毛泽东突然中断在外地的巡视，赶回北京，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走漏了消息。一旦追查起来，肯定纸里包不住火，非但他们罪责难逃，而且还势必会把林彪牵扯出来，全家都会被送上断头台，落得比刘少奇一家人还惨的下场。自知闯下大祸的叶群、林立果母子二人此时已经乱了方寸，张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在这生死关头，叶群、林立果当然不敢擅作主张，只好据实禀告林彪，一切由他最后拿主意。

很显然，如果说林彪在此之前还可以以静制动的话，让毛泽东去伤脑筋向党内外解释废黜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毛只要公布尔彪企图谋害他的事实，就很容易请君入瓮，让 "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这种情况下，个性极强，从不服软的林彪索性一不做二下休，破釜沉舟，作困兽之斗。他决定立则转移到广州去，同时设法带上手下的几员大将。这是林彪在毛泽东南巡讲话后，和叶群、林立果商量出来的一条退路，并为此做了各种准备。林彪之所以选择南飞广州，是因为广州军区是当年四野的老班底，黄永胜又经营多年，而且地理位置机动，远离北京，背靠香港，在政治上可进可退。

林彪的打算是坐镇广州，先静观毛泽东下一步的动向，如果毛逼人太甚，执意要往死里整人，就和他彻底摊牌，先谈判，后动武，迫使毛停止找碴整军队的批陈整风运动。如果谈不成，就在广州立即召开军队师以上干部会议，揭露多年来毛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举事讨伐毛的暴政，并且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

然而，这一反叛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就胎死腹中。原因是内部出了"叛徒"。泄露了事机的不是别人，而是林彪的爱女林立衡。在林家中，林立衡素来受到林彪的钟爱，却与她的母亲叶群的关系很紧张，一直在精神上受到叶群的虐待。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叶群所生，甚至以死来抗争叶群对它恋爱婚姻的干涉。在林立衡看来，林彪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本来只是有些"误会"，事情闹到这一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叶群从中坏的事。

因此，林立衡认为确实应该好好整一下叶群，同时希望其父林彪能够同毛泽东好好谈一谈，解开彼此之间的心结。以后林彪可以退出政坛，像朱德一样在家赋闲养老，保住政治上的善终。基于这种想法，林立衡曾激烈地反对林立果打算刺杀毛的计划，认为这样做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给林彪乃至全家惹上杀身之祸；至于割据南方或流亡海外更是异想天开，自毁名节，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林立果一意孤行，根本听下进任何劝告，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只好在暗中展开了保护其父林彪的行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林立衡当时和事后都一直认为整个事情虽然打着林彪旗号，主谋却是叶群和林立果二人。早已病病怏怏、疏于政事的林彪并不完全知情，在很大程度上被母弟二人所摆布。至于她本人当时之所以没有敢告诉林彪，是因为这件事非同小可，担心林彪的身体经不起这样

的刺激，再说也没有掌握真凭实据，所以才一直犹豫不决。不过，林立衡相信只要能设法把林彪留在北戴河，哪也不去，就能挫败叶群和林立果二人的图谋，最终保全父亲的名节。为此，她在私下里遂向林办的工作人员打招呼，把他们动员起来监视叶群的行动，准备万不得已时出面敦促中央保护林彪的安全。

九月十二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发现叶群情绪反常，整日坐立不安，不断到林彪别墅进进出出，关起门来密谈。更令她疑窦丛生的是，叶群一面四处放风说准备到大连去，另一面却又匆匆忙忙地强行为她举行订婚仪式，在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等到林立果当晚从北京匆匆赶回北戴河后，林立衡随即又通过林彪身边的勤务员窃听到叶群、林立果试图劝说林彪出走的只言片语，并且了解到林立果已从北京带回一架三叉戟专机。她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 "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向中央作了汇报。

林立衡的这一举动，完全打乱了由林彪下决心、林立果策划的南下广州的反叛计划。不过，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举非但未能保住林彪的名节，反而在政治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从背后捅了自己的父亲一刀，迫使林彪在仓皇之中乘机出逃，落得个机毁人亡的下场。

当然，仅仅是林立衡的举报还不足以导致林彪这样的结局。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已经在政治上转向的周恩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坐镇北京指挥，贯彻执行毛的意图，故意打草惊蛇，导致整个事态急转直下，给了林彪致命的一击，把他逼上绝路，酿成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自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后，周恩来的政治态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试图扮演和事佬的角色，极力弥合毛、林之间的裂痕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则放弃了这种努力，不再企图左右逢源，而是明显倒向毛泽东一边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不满林彪不听劝说，执意硬顶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看出了毛剪除林彪的决心已定，这件事绝不会轻易了结。毛、林之间势必有一场恶斗。

周恩来在审时度势后，非常清楚双方的实力悬殊，林彪显然不是对手。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站在失败者一边的周氏自然站到了毛泽东一边。周选择跟毛走，而不帮助在治国方针、政见相同的林彪，是和他一贯"西瓜傍大边"的为人有关。周恩来的这种态度，使政治上的天平更向毛泽东一边倾斜，使林彪陷入更加不利的处境。对周这种随风倒的作法，林彪很不满意，曾对他手下的几员大将传话，指周历来如此，为人圆滑，没有原则，在政治上摇摆不定，靠不住，要他们提防。林彪还在家中对中美和解一事借题发挥，表达对周的不满，讥讽他借此大出风头。

然而，对毛泽东来说，周恩来在政治上倒向自己一边，却是事先料定的结果；毛虽说对周在党内斗争中总是左右逢源这一点很不以为然，但他相信只要自己能够牢牢掌握大局，在同林彪的摊牌中占据上风，在政治上摇摆不定的周就会自然倒向他这一边。

为此，毛泽东在南巡前，就已经预先做了争取周恩来的工作，向他交了底，两人在政治上形成了某种默契。南巡途中，毛更是不断派专人将自己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记录送给周，让他了解最新的动向。

对毛泽东的这种关照，周恩来自然心领神会，预先知道了毛在政治上的底牌，将会有大的动作来解决林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决意默契配合，鼎力相助。八月上旬，他因陪同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而需离开数日，临行前，特意写信给毛，表示："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海容转告。"

十二日返京后，周恩来又立即赶到毛泽东的住处面受机宜。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正是在与周这次密谈后，才最终定下南巡大计，在党内军中制造倒林舆论。两天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外地巡视，而周恩来则坐镇京畿，帮助毛掌握局面。他所主持的四届人大各项筹备工作，已将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排除在外。

更能表明周恩来此时政治态度的，是他一改在中共九大时当众赞扬林彪是井冈山会师的"光荣代表"的说法，而对一幅准备对外公开发表的题为《遵义会议》的油画作了批示，指出该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的作法，"是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

毛泽东离京南巡后，周恩来按照预先的约定留守京城，着手展开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同时随机观变，密切注视着毛、林双方的动向。像前述叶群以"检查乳腺癌" 的名义从北戴河回京后，周特意打电话到毛家湾"问候"。当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周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 并让秘书转告他的问候，说：她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这期间，周恩来曾再次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不过，与四月间的那次北戴河之行相比，这次更多的已是虚应故事，并暗中查探林彪的动向了。与此同时，周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同毛泽东保持联系，互通信息，从汪东兴、华国锋等人那里了解毛的最新意图。

第 32 集－林彪专机爆炸之谜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2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林彪专机爆炸之谜。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九月十二日晚十时许，周恩来接获了林立衡关于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的报告。当时他正在人大会堂主持讨论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对此，周最初是有点半信半疑。他原先就被告知林彪这两天有动身去大连的打算，是计划内的安排，为此他还特意传话，让林彪好好休息，在十月一号前返回北京。此外，他对叶群和林立衡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就有所耳闻。在这种情况下，林立衡的报告未免让人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一个堂堂的副统帅怎么可能被自己的老

婆和儿子所"劫持"呢?万一弄错了，就不好收场了。不过由于事关重大，周不敢马虎，随即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紧急处理这件事情。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想弄清情况，特别是林彪本人的态度。他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林彪大概已经听到风声。不过，林彪家里竟然闹出乱子，出现这等咄咄怪事，还是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为此，他一面命令警卫林彪住地的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密切注视，有情况随时报告，一面亲自打电话给林立衡，盘问她这样报告有什么依据?

但是，林立衡有难言之隐，不便把她所知道的情况和盘托出，只是一个劲地强调林彪的安全"有问题"，要求中央采取措施，确实保证他的父亲不出问题。周恩来这时显然更关心的不是林彪的安全问题，而是林彪本人的意向，于是吩咐林立衡："发动所有的人，想一切办法摸清首长(指林彪)的态度，立即报我。 "

随后，周恩来根据林立衡提供的线索，着手追查林彪座机的下落，很快便发现在北戴河的山海关机场果然停候着一架三叉戟专机，而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然也不知情，这令周开始感到其中确有问题。联系到林彪在党内斗争中一挨批就消极的为人，这次在毛泽东的紧逼下很可能出事。为防不测，他随即以"安全"为由，下令这架据称是夜航试飞的专机马上返回北京，不准带任何人回来，但是，北戴河方面稍后却又报称：飞机发动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无法立即返航。

这种谎报，自然蒙骗不过周恩来。由此认定其中有鬼，证实了林立衡的报告。不过，由于林彪是载入党章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周自然不会擅自采取行动。据知情人透露，周在接到林立衡的报告后，除了在他本人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外，周随即报告了毛泽东，提出自己去一趟北戴河，找林彪当面谈谈，摸清他的真实思想，最后争取他一下。但毛没有批准。

当林立衡通过中央警卫团报告林彪的动向后，急于洗刷自己与林彪关系的汪东兴马上报告给毛。因此毛在第一时间便知道了林彪后院起火。这对一直苦于抓不住林彪多少把柄的毛泽东来说正中下怀，通过汪东兴直接指挥北戴河警卫军队的行动，遥控事态的发展。

从直接听命于汪东兴的中央警卫团后来并末尽力拦阻林彪出走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意图的影子。尽管当时林立衡苦苦哀求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饰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林彪留下来，北戴河的警卫部队也为此做了几种应变方案的布置。然而，后来他们却没有像张向林立衡所保证的那样，全力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

正因为如此，直到九月十二日晚，林彪、叶群和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林立果三人关起门来长时间密谈时，林彪还不想走这条路，不理睬叶群建议到香港去遥控指挥的央求，只是独自落泪。据当时撞见这一场面的林彪身边的公务员说，当时林彪流着泪表示："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然而，就在叶群和周恩来通话后，以为毛泽东已经下令前来抓人的叶群慌作一团，担心再不走就走不了了。于是立刻把当时已经服下安眠药准备睡觉的林彪叫起来，紧急商量对策。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林彪来说，投奔苏联实在是一个痛苦的决定，行前内心很矛盾，在去留之间摇摆不定，甚至在出逃途中还曾一度萌生打退堂鼓的念头。据知情人透露，九月十二日午夜，林彪在乘车驶往山海关机场的途中，曾经命令随车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这位警卫秘书。

李文普最初曾向上面反映了这一情况，但遭到专案组的训斥，随即被单独关押起来交代问题。迫于政治压力，李后来只好改口，回避了林彪曾下令中途停车这一情况，而把它说成是在听到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他本人要求停车，以换取保留他的党籍、军籍和不株连家人的宽大处理。据说李文普在私下里曾对来人表示"现在不到时候，到时候我是要讲话的。"恐怕要到那时，有关林彪出逃的更多真相才会大白于天下。

在与叶群通话后，周恩来断定其中肯定有鬼，立即下令封锁停候在山海关机场的林彪专机。不过，他做得很老到，事先为自己留下了转寰的余地，以"保护林彪安全 "为名行事，还故意拉上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联合下达命令。而且周本人没有出面，而是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林彪可能夜航，夜航不安全，不要夜航：林彪到机场时，要林彪直接给他去电话。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闯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共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这样的结局，使得周松了一口气，连忙赶到人大会堂毛的住处，向毛报告这一消息。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

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完全破碎；而且毛也在政治上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多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求稳住文革的败局。在北京，人们开始传播把毛称为“老头子”的不利于毛各种小道消息。

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关于这一点，如果中共档案中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泽东的报告是真实的，此说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

一位知情人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有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作了上述改正"

有可能，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中共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更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另外中共为什么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

第 33 集－周恩来为什么号啕大哭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3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分析介绍林彪死后周恩来为什么号啕大哭， 以及周恩来怎样配合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演戏。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林彪死后周恩来号啕大哭的事情，纪登奎是这样回忆的：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 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李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

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

周恩来是一个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痛哭失态的。

周恩来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大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 林彪的出逃，让周做了不少亏心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易张。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生产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又无法解决中共的统治危机。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改变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进行有限度的改变。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

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中共党内军中的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中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 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毛提供了进一步做戏的机会。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 0 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和夫人出席。然后，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表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说：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等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他还在一些场合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十分肉麻。

第 34 集－毛交权让周大小便失禁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4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 分析介绍毛泽东昏厥后，周恩来当场大小便失禁，以及毛要周恩来自揭老底的情况。 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处处小心谨慎，尽量表现对毛泽东的忠心。但一向相对稳定的毛、周关系开始亮起了红灯。疑心极重的毛对周的猜忌日深，在政治上处心积虑地整治他，使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由于林彪事件，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已经成了笑话。毛泽东灰头土脸，“精神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绝服药。加上参加陈毅追悼会，“受了风寒，导致病情恶化，由肺炎转成肺心病，全身浮肿，整日昏昏沉沉，出现心力衰竭的现象，曾一度昏厥过去”。“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得车来”。当毛泽东从昏厥中醒来后，作了交权的安排：“毛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以往毛在考虑他的接班人时从来就没有把周算在内，开始是刘少奇，在刘下面，毛考虑的是林彪和邓小平，一直在他们两人之间搞平衡，先是在党内不断放风，让邓当总书记总揽全局，在反右运动中扮演要角。后来对邓跟着刘少奇跑大为失望，才用了林彪。 这次毛泽东在病中突然交权，让周恩来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诚惶诚恐而难以从命。

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周实在太了解毛嗜权如命的为人了，如果不立即对这件事作个斩钉截铁的表态的话，今后恐怕就要大祸临头了。

实际上，江青已经为这件事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咬了周恩来一口，责问为什么要逼毛泽东交权。为此，周在毛的病情转危为安后，特别郑重其事地让负责警卫毛的张耀祠带话给毛，说："等主席精神好一些时，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谨慎，还是在劫难逃，遭到毛泽东越来越大的猜忌。本来，以毛喜欢独揽大权的个性而言，是绝不会轻易让权的，特别是在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急于挽回文革败局之际。因此，毛这次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如果不是因为确实感到大限已到，阎王爷在向他招手的话，那么便是在有意虚晃一枪，试探周的态度，在政治上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正是在这段缠绵病榻的日子里，毛泽东为自己陷入的困境找到了解救之道，那就是决计利用尼克松访华的机会，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掩盖文革的破产。这正是毛本人后来回心转意同意接受治疗的原因所在。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的病情大为好转，身体逐渐康复。这当然是和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心病还须心药医"的缘故--因为通过尼克松访华，使毛盘算已久的"联美整苏"的构想如愿以偿，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的视线，为文革的败局挽回了一点面子。这样一来，毛泽东总算从林彪事件的重创上缓过一点劲来。

然而，毛泽东刚刚在政治上渡过难关，随即就对他在病中向周恩来交权一事感到后悔。虽说周本人马上就推掉了，但此举毕竟在实际上承认了周作为自己接班人的地位。而且与林彪不同的是，周本人握有实权，掌控着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万一周在政治上存有异心，将会比林彪更加难以对付。

平心而论，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为人，不至于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经过林彪事件的重创后，原本就生性猜忌的毛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总是担心别人怀有二心。这种心情，随着毛发现周在林彪事件后党内外的威望大增而他自己一落千丈时，愈发强烈起来，成为毛的一大块心病。

当然，毛泽东并不准备将周恩来一脚踢开，因为他毕竟一贯忠顺，况且又刚刚帮他在政治上渡过难关。这样做，未免让人感到有过河拆桥之嫌，再说以后整个国

家内政外交的工作还是要依靠他来做。因此，必须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既要设法抹掉曾向周交权这件事，又要尽量做的不露痕迹，以免让人认为他反复无常，出尔反尔。为此，毛泽东在大病初愈后就开始用心思，寻找机会，设法了结这块心病。

这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有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做文章，在党内高层中当众抹掉曾向周恩来交权这件事。为此，他以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训"为名，点名让周在大会上现身说法，自揭历史上曾几次反对毛泽东的老底。在会议中间，毛泽东单独找周恩来谈话，专门谈了一通"党内路线斗争的教训"，拐弯抹角地示意周在大会上围绕建政前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问题作一发言。江青随后在政治局会议上干脆把话挑明，指明要周联系个人实际，"多讲点历史事实"。

大概是连毛泽东自己都觉得这样做有些过分，不得不软硬兼施，对周恩来进行笼络。他知道文革中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伍豪启事"问题一直是周的心病，便主动提议周在会议上也对此作一专题报告，澄清事实，以此来换取周恩来的合作。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突然让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重翻几十年前陈年老账的用心，是在"古为今用"。实际上，深知伴毛如伴虎的周在林彪事件后，就已经预感到今后他与毛的关系会变得更加难处。他很清楚，毛泽东从来没有在政治上真正信任过他，想整他也不是一朝一夕了。虽然几十年下来总算大体上相安无事，但那是因为他长期以来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的缘故，从来没有在政治上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

然而，林彪事件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恩来在无形之中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取代了以往刘少奇、林彪的地位。对于眼下政治上的险境，周本人非常清楚。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刘、林二人分别曾是毛泽东长期以来政治上坚定的盟友，最后尚且遭致杀身之祸，更何况曾在历史上几次反过毛的他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暗中为自己的处境提心吊胆，变得疑心很重，处处小心戒备，以至于竟闹出在陪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往上海访问途中飞越长江时，不相信专机机长的解释，怀疑自己所乘的飞机正在飞往海外的事情来。

在和毛泽东单独谈话后，周恩来知道他的预感已经成真，毛的猜忌日深，正在用心思来对付他，如果不尽早打消毛的这个念头，事情就会越闹越大。在此之前，他刚刚被确诊为膀胱癌，急需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不过，为了打消毛泽东对他的疑忌，周还是把手头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准备大会上的发言。开始，周恩来只写了一个提纲大要，但是江青一定要他清理思想，具体"联系实际"，为此，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箱倒柜，查找资料，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准备发言稿，再一次对当年的历史老账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

据周身边的人说，周恩来写得很辛苦，整日伏在案头，很少起来活动。这期间，他的精神压力很大，既要清算批判自己，又要揣摩上意，忧心劳神，每天连胡子

也不刮了，饭也吃的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子都穿不下了。

提纲写完之后，周恩来心里仍然不踏实，不知这样写法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在把发言提纲送毛过目的同时，他又专门附了一封信，表示自己愿意像当年延安整风那样，清算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毛泽东的意图就是让周恩来当众自揭历史老底，并不大在乎具体写的如何。在得到毛的同意后，周连续用了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题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发言.

当然，周恩来非常清楚光是检讨历史老账是过不了关的，还必须说出毛泽东真正想听的话来，那就是他不配作为毛的接班人。为此，周专门在发言末尾当众声明：" 我觉得由我来谈谈前六次路线斗争，更着重说说对我自己犯过的路线错误的个人认识，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须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第 35 集－毛泽东对周恩来江青癌病的不同处理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5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当医生们发现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时，毛泽东要医生们"要保密，不要开刀"的四条指示。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 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细叙述周恩来的病况，强调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言。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医生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人员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毛泽东和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行。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时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专家们仍然三缄其口。大陆中共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就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而 1956 年江青得子宫癌时，毛亲自在颐年堂内同医生们讨论江青的病情，说："方法的选择，由你们决定。生了病只能听医生的，没有别的法子啊。" 当时定下来，由俞葛峰大夫陪同江青，去苏联进行钴六十放射治疗。毛并请医生们在颐年堂吃了一次饭。江青的癌症被完全治好。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就是在中共党内也将无法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的问题说一句公道话，致使贺龙死亡一事一直心里有愧。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搞出来的，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整死。

周知道文革运动伤害大量无辜，而党内各级干部首当其冲，被拆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是一个重新整合中共高层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众多的老干部一旦重返工作岗位，就会在政治上成为一股与文革派相抗衡的力量，这样就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件事时并没有贸然造次，而是处处注意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行事。他尽量扩大毛参加陈毅追悼会这件事的影响，为解放干部营造政治气氛。这年四月间，陈正人、曾山这两个靠边站的部长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在不到半个月内相继死去，其中曾山虽然曾经帮毛泽东在红军内部打 AB 团，杀人无数，但仍然在文革中受打击多年，在与老友重聚时，因一吐心中的愤懑，过于激动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

由于陈、曾二人当年曾参加过中共井冈山时期的活动而为毛所熟识，这就使得周恩来抓这件事情更加师出有名。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中共老干部作了体检，军队系统对军以上人员也照此办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牛棚"或外地的"五七干校"赶回来参加体检的，并且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利用林彪事件后一度分管的新闻宣传工作，为解放干部造舆论。四月中旬，他布置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重申党的干部政策的社论，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不过，周在做这件事时十分注意分寸，兼顾政治上的平衡。 比如，在这篇社论中，被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广为引用的强调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段话，其实原文并非完全如此，而是经过删节的。这段经过周恩来本人把关审定的整句话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新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周恩来圆滑的为政之道，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在如何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煞费苦心，竭力避免触动文革本身。周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实际上，他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就已经开始在做了。

周恩来深知批左是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问题，很容易犯忌，触到毛泽东的痛处。为此，他十分注意设法保护自己，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把诸如" 极左思潮，就是形'左'实右"，"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一类话装点其中，尽量让人抓不住把柄。而且尽量打着毛的旗号行事。

毛泽东起初迫于形势，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他很清楚批极左这把火迟早走会烧到文革头上来的，即使是像周这样躲躲闪闪的搞法也不行。当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便亲自出马，在政治上刹车了。

毛泽东虽然深居简出，却对外界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很快就觉察出周恩来号召批判极左思潮所包藏的用心，企图不动声色地扭转国内政局的方向，对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改弦易辙，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曾把他这种内心的隐忧向

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谈过，表示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毛之所以在林彪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周恩来批极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主要是因为当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作出某种限度的松动。现在，毛自觉已经渡过难关而决心在政治上刹车了。

当然，毛泽东是个惯于玩弄权术，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老手。在反击周恩来所主导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件事情上，他最初并不想亲自出马，而是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嫡系一-以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

第 36 集－周恩来突然从批左变为批右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6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怎样违心地跟随毛泽东，突然从批左变为批右。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上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虽然周恩来只是想对毛的文化大革命做一些小的调整，但是当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在外交部批极左的讲话后，向张春桥、姚文元这两位文革派大将表示：不赞成批判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认为这样搞，将会批到邪路上去。

自命为是"主席一条狗"的江青在拱倒林彪之后，自以为立了大功，见周反而坐收渔翁之利，内心忿忿不平。特别是见周奉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权力越来越大，成为妨碍她问鼎最高权力的绊脚石，因而必欲将其扳倒而后快。

现在既然毛泽东已经有了这个意思，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岂有不大干之理？于是，围绕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很快便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

双方的攻防较量最初是围绕一九七二年“十一”社论而展开的。这年九月间，周恩来为了推动批判极左思潮，布置"两报一刊“十一”社论起草小组要加进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起草社论的执笔人吴冷西在社论中加入了"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一句话。尽管其中的提法写得很谨慎，批左和批右兼顾，而且还把批右放在前面，但是，张春桥、姚文元由于毛泽东已经向他们交了底，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去了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句。不仅如此，张、姚二人在此之前还根据毛的意图，向人民日报社吹风打招呼，强调批左不要过头，公开和周恩来唱对台戏。

张春桥、姚文元在“十一”社论问题上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令周恩来感到来者不善，知道背后肯定大有名堂。为了避免把事情闹僵，狡猾的周氏随即采取了模糊的做法，在最后审定“十一”社论稿时，把"批判极左思潮"这方面的内容改头换面写入社论，诸如"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等等。

但是，在毛泽东幕后指使下，在政治上批左还是反右的交锋已经势所难免，周恩来即使再擅长妥协应付之道，也还是无法息事宁人，阻止江青一干人奉旨展开的反扑。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七二年秋冬之交，双方之间的交锋愈演愈烈。先是《光明日报》在十月初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当面交代而写的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已经得到毛交底的张春桥明知这是代表了周的意见，却布置手下的人调查该文的"出笼背景"，并一语道破天机，称："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有多大多硬，就是要批!" 上海《文汇报》随即展开了对周文的批判。

接着，《人民日报》在十月中旬刊登了一整版专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这是该报理论部王若水等人根据周恩来几次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而组织黑龙江省写作组等撰写的。文章一出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江青等人对此大为光火，原因在于这几篇批左的文章词锋犀利，切中要害，而且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的后院着了火-一《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竟然被周恩来挖了墙角，公开和他们唱起反调来。

为此，江青一干人轮番上阵，气势汹汹地对人民日报社大兴问罪之师。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一口咬定这几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的抬头"。江青更是指桑骂槐，借批该报社之机，点出背后有人"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人民日报社被责令在内部开展"反右倾回潮"运动。

周恩来尽管对此很窝火，但由于投鼠忌器的缘故，不便和他们公开冲突，而是捺着性子与之周旋。以至于在这期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一向表面上彬彬有礼的周氏竟然为了自己的鸡蛋炒饭没有放盐这样的区区小事，当众发脾气，对他的保健医生张佐良拍了桌子。

这年十一月底，周批示同意了中联部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请示报告。江青等人抓住该报告中提出要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大加责难。

周恩来在随后讨论这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妥协让步，同意删掉中联部和外交部报告中的"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字句，但仍设法把毛泽东近年来有关反对大国主义等含有批左内容的批示和他本人在使节会议上的讲话纪要列为会议学习文件，以便在实际上继续保持会议批左的基调。对此，江青等人虽心有不甘，但已经失去了大闹的由头，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暂时作罢。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出面介入了双方的争执。不过，这一回并不是因为江青等人搬救兵，而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批林的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而且明白点出：周恩来主张要"批透极左思潮"，而张春桥、姚文元则强调"不要批'左'批过了头"， 以及在批极左的问题上，上海《文汇报》已经不止一次地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了，"情况似乎有点像批《海瑞罢官》的时期"。

王若水写这封信的本意是想为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主张摇旗呐喊，同时对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责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大反"右倾回潮"表示不满，希望毛泽东给予支持。但此举却适得其反，在政治上帮了倒忙。一直在幕后观战的毛这时已经看出姜还是老的辣，张、姚等人贯彻他的意图虽然很卖力，却根本不是周恩来的对手，而且批左的主张在党内大有市场。如果他本人不亲自出马的话，是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的，而拖延下去的话，只会让周恩来浑水摸鱼，做更多的手脚。

为此，毛泽东诀计利用王若水的来信展开回击，彻底封杀党内批极左的声音。他随即把江青找来，进行交代布置，让她传话给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提议"解决一下"王若水信中所提的问题。

毛泽东故意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种意见，借以观察周恩来的态度。但是，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早已从毛亲自介入这件事的本身和方式上意识到山雨欲来，毛准备收紧批左的空间。很显然，批左与文革本身有不少抵牾之处，即便是再小心翼翼地在两者之间走钢丝，也还是会难免触到毛的心病。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立即采取顺守之道，在批左的问题上全线退却，并刻意降低姿态，设法为自己转圜。当江青提出先在内部"统一认识"的建议后，周随即附和，表示同意。

周恩来这种不战自退的作法，使得江青等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无法按照预先的计划，与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眼见在事关文革命运的关键问题上，党内文革派发动的几次反击都被周恩来的太极软功所化解，作为后台老板的毛泽东心里着急上火，不愿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决心施展他的淫威。十二月十七日，在政治局开会后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找来，名为"谈话"，实际上是让两种意见对簿公堂。

但是，由于周恩来早已不再吭声，张春桥、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泽东的面前造次，因此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独角戏。根据张、姚二人整理的谈话记录，毛在这次谈话中围绕国内形势和批林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点出"批极左，还是反右"的问题，明确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并断言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整篇谈话的矛头，很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提出的"要批透极左思潮"而来的，不过还是给周本人留了点面子，并没有直接点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已经对周高抬贵手，不再找他算账了，实际上，毛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暗露杀机，在海阔天空的漫谈中，放出"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这样的话来。这句似乎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所隐藏的真实含义很快便显露出来。仅仅半年之后，周恩来便厄运临头，而事情恰恰是从毛向周所主管的外交工作开刀而起的。

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中共党内斗争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不过，周恩来毕竟是个善于在政治上随风转舵的老手，既然毛泽东已经

明确表了态，他就赶紧跟着转，在批左的问题上偃旗息鼓，转而贯彻落实毛批右的指示。

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召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成员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批林彪"极右"实质的谈话精神，谈话中，周与文革派一干人大张挞伐的态度有所不同，承认他本人八月间在外交系统的讲话"有可能有不恰当的地方"，同时也为自己作了辩解， 说："极左思潮要批透，我是讲外交，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 王若水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当时这样的一幕：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可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

就这样，一心要在政治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凭借他的威权，轻而易举地挫败了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试图对文革调整的努力。国内的形势随之逆转。按照毛所定下的调子，一九七三年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忌，而反右则在报刊宣传中连篇累牍，不绝于耳

第 37 集－苏联核战争威胁下的对美握手言和(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7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方热线电话的话务员大骂柯西金后，中苏关系恶化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边缘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对美握手言和。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同毛泽东称之为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在对苏关系走投无路后，才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影响。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寰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共以一百多万中国青年的生命为代价，和美国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共是自愿参加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的，中共打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号，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红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

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失去了进占台湾的机会。

相比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中共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苏联这种损人利已的作法，让中共认清了这位共产党"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机会，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两个共产党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共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共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发毛，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两条战线作战。外蒙古的苏军坦克成了毛的心病。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国的外交战略，改变同时打两个敌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抗苏联的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共自身的压力。

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共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共"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共在与美国讨价还价

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 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一九七 0 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秩序荡然无存。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也知道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自焚。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共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 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的温和派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 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 随即把电话挂断了。于是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同时毛的暂时稳住中苏关系，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计划也破产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又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一场核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共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在国内进行了大疏散，“深挖洞，广积粮”，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同时给自己准备了多处万无一失的防空洞。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抓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急切地要抓住尼克松摇动的橄榄枝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积极行动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第 38 集－尼克松访华前中美苏的三角关系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8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以及尼克松访华前中美苏的三角关系。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共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并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大陆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毛泽东要抓住尼克松的橄榄枝，对美握手言和的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中共的新

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大陆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共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苏联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尴尬处境，利用越南首脑胡志明去世的机会同中共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共政权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和胡志明两人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方面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中共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回中国，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毛泽东在考虑到三角关系的平衡后，改变了主意，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接连采取行动表示诚意。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博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共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 0 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

差不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中共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 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 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修改，将原稿中的中共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 135 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

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为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营造气氛。二月十八日尼克松向国会提出就任后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尼克松在报告中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联手起来主宰世界或结成敌对性的联盟来反对两个共产党大国中的一个。

在二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中美会谈中，美国方面则在会谈中口头同意了在北京举行高层级会晤。

一九七０年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向中共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大陆。

在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美国记者斯诺进行了长谈。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毛还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

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信息传给美国。表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一日，周恩来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

接下来是，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尼克松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对大陆的贸易禁运。 接着，中共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表示，中共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的文件，并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同时，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由于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尼克松访华前期，作为东道主的毛泽东突然大病一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迷。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本人逃过了有生以来的一次暗杀行动。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文化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完全破损，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克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在治疗问题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经常商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夺。" 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终于在离尼克松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共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克松，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周恩来。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共外交的主角，但是西方新闻界仍然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把脱离文革冬眠状态下的中共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而忽略了中共首脑毛泽东的存在。给周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尼克松在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第 39 集－周恩来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39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临终前，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行事小心翼翼，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毛泽东的大忌。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另一方面是由于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是毛争取的对象，在毛打击对手时的关键时刻，一直配合默契，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坐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毛泽东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

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忿忿不平。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萌生了要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改变文革以来中共的一些政策走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多对毛抬出王洪文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要求会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周恩来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立即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如仍有错误，请即指正"。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部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

而且火气很大。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着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语录。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指责《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 "放屁一通!"，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

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又把外交部和《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毛说："都说此文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在中共的词典中，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姬老爷(指姬鹏飞)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 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可以看出的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周从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 "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检查。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成员，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 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 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指责，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泽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但是，毛泽东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中共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可惜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中共高层在这次会议上的表演的文件已经被掩灭了。

第 40 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批周会议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让邓小平出席批周会议立新功。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对周恩来的批斗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谋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一个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共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批斗，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辛格这样写道：197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 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这一次，毛泽东不想让周恩来为他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

对此，中共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中共官方极为尴尬的黑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其后 邓小平获得重用的原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周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上帝正在睡觉"。由于毛泽东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敢去打扰。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 "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 "，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一开始，周恩来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说："美国以苏联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痛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

江青在会上一会儿说周"左"，"是霍答"，"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要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周急了，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议的人员名单，除了让中共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参加以外，还特别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于是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

第 41 集－邓小平批周取得毛的信任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1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想利用邓小平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和毛对邓小平的考验。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仅如此，毛泽东还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提法，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明白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泽东的意思。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事情只会越闹越大，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的下场。于是，周恩来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的调子，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和中共的历次内斗一样，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为了自保，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周身上泼脏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并狠狠踹周一脚。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也并不陌生，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同样的角色。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经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往日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政府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陆定一，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是因为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太深了，一损俱损，害怕批毛批到自己头上。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政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出名，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头头。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中共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跟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中共建政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批周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 "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他的发言切中要害，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就这样，邓小平取得了毛的信任，回到了中共的领导层。

第 42 集－王海容说毛"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揭开周恩来面具(42)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2 集。批斗周恩来的中共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毛泽东初恋情人的女儿)、唐闻生背黑锅，说王、唐二人整总理。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这番话来。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圜的余地。就在他对周

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特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得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

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要说就是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这就是中共伟大领袖的真实嘴脸。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却无处申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敢吐露，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牛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应为人民大会堂)，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下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的病情也明显加重，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却因批斗周恩来而拖延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周恩来尝到了和刘少奇被批斗时同样的苦果。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罢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至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一九七四年新年伊始，大有第二次文革之势的比林批孔运动在中国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同九年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次又是毛泽东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合伙上演的双簧戏。

对于这场运动的锋芒所指，普通老百姓开始大都感到茫然不解，但在当时的政治核心中却不是什么秘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过是把一个多月前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内容直接捅向了社会。

其实，发动这场运动的玄机，在发表的中共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献词》中就已经隐晦地透露出来，宣称"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要求"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而这正是把毛泽东在半年前谈话中批周的那四句点睛之语改头换面地端了出来，即："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

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中国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第 43 集—毛周对邓小平的争取及毛警告江青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3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怎样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争取。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文革倾注了他全部的政治资本，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遗产，一旦文革被否定，就是在中共党史上他也会留下骂名。这成为熟读史籍中人物传记的毛晚年最大的心病，为此食不甘味，夜难成寝，绞尽脑汁寻找解救之道。

毛泽东急于安排后事，用邓小平取代周恩来，完成权力布局中的换马。为此，他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格局：让左派保卫文革的成果，让右派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左派的头领非江青莫属；而右派的领班，毛则选中了邓。

毛泽东让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同时也没有放弃通过这场运动来伺机更换周恩来的打算。毛借口周恩来已经罹患癌症，需要另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管事。实际上是毛对周极大的戒心而预先作出的防范，是自感已经老迈多病的毛对自己死后安排的一部分。江青正是在了解毛的这个心思后，才敢露骨地搞"批林批孔批周公" 的。

但是毛泽东又担心江青无法担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担子，为此，深谙权谋的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安排了一个使党内左派和右派各得其所的权力布局：让左派"抓革命"——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让右派"促生产"——维持国家日常生活的运转；最后由他本人来掌舵，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

邓其实早就是毛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之后，毛泽东就指定邓小平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党、政、军日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虽然身为党内第三号人物兼国务院总理，却不得不事事向邓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请示汇报工作。

不仅如此，邓小平甚至还在事关周恩来政治浮沉的问题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后，周因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问题，并有意让柯庆施取而代之，于是主动向中央提出了辞职请求。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赞成由柯来取代周。中央政治局常委为此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意见挽留周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但毛那里也需要有人去为周说情，后来是邓小平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出面起草了建议周继续担任总理的会议纪要报送毛后，这场风波才算告一段落。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后即开始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为此不断放风造舆论，这其实是一石两鸟之举：一方面在政治上安抚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同时，另一方面暗中祭出的一招防范周恩来的杀手。林彪事件后，就在毛本人威信一落千丈之际，却发觉文革中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在党内外的声望大起，而且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中共中央无人制衡。

由此，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戒心妒意日深，以至萌生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念头。在毛看来，无论是从个性、能力还是与他本人的历史渊源来说，邓都是能够在政治上挟制乃更取代周的合适人选。

以周恩来多年来对毛泽东为人的了解，当然明白毛让邓小平复出的用心所在。不过，善于在政治上争取同盟军的周氏自信能将邓团结争取过来。周很了解邓的为人个性，虽说他是毛安在身边挟制自己的人，但已经看出邓与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兼容，一旦复出，反倒会在政治上助自己一臂之力。

所以当毛在陈毅追悼会上透露出重新起用邓小平意向后，周立即示意陈毅的家人把毛的谈话内容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造舆论：而且还有意当着江青等人的面，对外宣传毛的这一意图，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林彪想把邓搞成敌我矛盾，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等，尽量扩大这件事的影响。

江青当年配合林彪在倒邓的问题上出了大力，现在虽说毛泽东为邓说了话，但她为此结下的心结却不是那么容易解开的，对毛的决定不大买账，不断找借口阻挠。而周本人也不愿意逼得太紧，得罪江青。因此，邓复出这件事一波三折，进展缓慢。从毛泽东最初发话算起，一直拖了一年多也没有真正落实下来。

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疑心这是周恩来有意拖着不办，但又不便明说，因为毕竟没有抓住什么把柄。一九七三年三月，就在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邓小平复出问题之际，惯于"借古喻今"的毛有意向周氏推荐读《史记》中的《郑庄列传》，特别称许其中"太史公曰"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以此来暗中敲打周不应对在政治上落难的邓小平坐视不管，而应对当年旅欧勤工俭学的老友援之以手，这样才对得起几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是个聪明人，马上便领会出毛泽东此举所含的用意。他随即抽空读了《史记》的有关章节，并在随后给毛的信中表示要让邓更上一层楼，出任政治局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共八大后党的总书记)，但被邓所婉拒。

尽管如此，邓小平重返权力核心的速度和方式都是极不寻常的，仅仅凭毛泽东的一席话，就从一般的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种情形在中共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即便是在共产国际扶植王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时，也还是经过了六届四中全会的手续。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打算。

一九七四年三月，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召开在即。主管这件事情的外交部绕过周恩来，由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直接向毛本人报告了此事，探询对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的意见。本来，各国出席这一届特别联大的多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照理中国也应派周恩来参加，然而毛却属意让邓小平率团前往，由乔冠华做助手。

毛泽东通过这一举动，向外界施放"抬邓排周"的信号，暗示周恩来的总理职位即将不保。毛在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同时，又叮嘱王海容、唐闻生不要讲是他的意见，可以由外交部写个报告送上来。这样既可不露痕迹地按照毛的意图行事，又可借以观察周的态度，以决定下一步运动的搞法。

周恩来当然不清楚毛泽东在背后所搞的名堂，不过凭其多年的政治经验，不难判断出外交部不和他通气，肯定是有来头的，很可能就是毛本人的意思。虽然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人流露过，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周恩来更担心的还是这一安排的背后所隐含的政治信息，有意超身事外，既没有表现出有任何情绪，也不查问外交部为什么绕过他，同时抓得很紧，毫不耽搁，立即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并在随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加以讨论。

令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出来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搬出种种理由反对这一安排，坚持要外交部撤回这一报告。江青这样闹，是因为她很清楚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出访活动，而是一次在政治上的亮相，事关由谁来接替周出任总理一职的问题。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想让邓小平摘了桃子。由于江青的执意反对，政治局的多数人大都保持沉默，会议最后议而未决。

这种局面让毛泽东相当尴尬和恼火。本来，他希望在排除周恩来后，由江青为首的左派和邓小平领头的右派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通力合作，共同稳住文革的大局，却没有想到江青竟然反对。不过，由于需要依靠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毛对江青这样闹，一开始还是表现得相当克制。他让张玉凤传话给周：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一直在守时待机的周恩来看出改善一下自己政治处境的时机已到，正好可以借这件事做点文章，毛泽东在抬邓的问题上迁怒于江青，就会多少缓和一下对他的压力。于是，周立即表态拥护毛的决定。另一方面，行事老到的周也没有刻意亮出毛的旗号紧逼江青。他在表态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的同时，又尽量给江青留下面子，提出："我建议，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与此同时，周还在下面做了工作，分别向政治局其他人打了招呼，告以这是毛本人的意见，希望不要跟江青一起闹。

这样一来，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完全孤立起来。就连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都不再跟着附和。对此，江青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气急败坏地又吵又闹，声言"保留意见"，要政治局"再研究、考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从幕后出来进行干预，解决这个问题。他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要她"小心谨慎"。

从这以后，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有了某种变化，尽管继续让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冲锋，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但却对江青开始有意疏远。而江青和邓小平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第 44 集一毛用“服从大局”拖延周治病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4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要周恩来在住院治病问题上“服从大局”，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就在中共批斗周恩来会议的同时，周恩来病情急剧发展，已经到了大量尿血的地步。本来在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周就已经再次出现血尿，但是相应的治疗措施却因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拖延下来。会上，周挨批斗围攻，心情极坏。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病情明显恶化，以至到会议后期，要频频上厕所，每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出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结束而收场。还没有等周恩来喘过一口气来，批林批孔运动就又铺天盖地而来。面对其势汹汹的倒周势头，周本人虽然在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却不得不强撑病体，为自己在中共政坛上的生存而苦战。多年来的过度劳累和忧惧被打倒的心理压力，终于使周恩来体内一度得到控制的癌瘤大发作。

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上旬开始，周恩来每日尿血多达一百多毫升，不得不住进三零五医院接受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是，手术后的效果却不理想。没有多久，他体内的癌瘤便再度复发，而且来势很猛，伴以大量血尿，最多时每日达二百多毫升。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明显垮了下来，人已经很虚弱，饱受病痛折磨。周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回忆录中详述了当时的情况。他在书中写道：由于肿瘤迅速长大、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使排尿发生困难。起初，小的血块堵塞，解小便时稍用力还能排出去，但较大的血块不容易从尿道排出，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

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

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要周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顶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中共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四人帮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等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自一九七一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 "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在当时的年代，对毛泽东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说：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要求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捅里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瞞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周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时，汪不以为意，又传达毛的旨意，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这一回，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拖延，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更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着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达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党、政、军、

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 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按同样的口径，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

张春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每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在中共体制下，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从毛泽东的摆布。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对这一点心中有数，知道从起初对他本人隐瞒病情，进而阻拦检查到后来不准做手术，全都是毛的意思。然而，建立中共党内保健制度并且一直帮助毛迫害别人的周对毛这样的决定既感到无奈，又不敢违拗。终于自食其果。

这期间，由于失血过多，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随时可能休克，但是为了执行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住院治病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首脑后再说。周恩来只好靠输血坚持工作。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终于住进了三零五医院，当天便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手术过程中，医疗组的专家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血尿也很快消失。

然而，两个月后，周恩来便又开始尿血，而且日渐增多。经专家诊断，确定为癌瘤在体内转移。八月十日，周又不得不做了第二次手术。这对周氏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在此之前，他还曾抱有希望，而现在则知道自己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在回答外国访客的询问时，故作幽默地表示："好了就好了，好不了就了啦。"

与面对死亡的内心恐惧相比，此刻更搅扰周恩来心绪的还是政治命运未卜，不知能否在有生之年不被打倒，这是周氏晚年一直念兹在兹，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事情。然而，眼下却并没有迹象表明这场冲着他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有收兵之势。充当打手的江青虽然在邓小平出国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但在批周的问题上却依然动作频频。

就在周恩来住院前后，江青一干人所控制的舆论宣传机器继续大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矛头所指呼之欲出。海内外有关周氏地位不保的风言风语满天飞，不少人都为他的政治命运而担心。有的外国访客甚至当面

询问这个问题。对此，周恩来既不能承认，也无法断然否认，只好顾左右而言它，按照毛的口径，谈一番在政治上批孔的大道理搪塞过去。

周恩来的忧虑并非自寻烦恼。一九七四年六月间，就在江青四处放风批"党内大儒"之际，毛泽东又一次把他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那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重磅炮弹。这九篇文章是毛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九篇党内通信，是他对当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王明博古和周恩来联手整他的总清算。

这些文章是他内心郁积已久的怨愤情绪的大渲泄。文中对党内教条、经验两派左右开弓，严词挞伐，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把王明、博古等人批得狗血喷头。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为教条宗派"跑腿抬轿"，充当"帮凶"。

在这次修改中，毛虽然删去了周的名字以及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但是整篇文章的锋芒所指还是让人一望而知。当然，毛泽东是个开展政治斗争的老手。他知道一旦把自己当年批周的文章抛出来，不啻是第二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由于毛感到有些力不从心，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事

第 45 集－贺龙惨死的材料让邓颖超坐立不安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5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贺龙惨死的材料让邓颖超坐立不安和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公开批判周恩来。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早在一九七三年春，也就是毛泽东发觉周恩来打着批极左的旗号，企图对文革进行调整以后，就开始考虑批周的问题了，选择的"石头"便是延安整风时毛写的这九篇文章。当时，毛让人把文章找出来，印成大字本，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其中包括毛的侄子、后来在政治舞台上一度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毛远新，甚至准许他把其中涉及批周内容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

正因为毛泽东事先已经向毛远新交了底，所以毛远新后来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宣称："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批林批孔斗争，一个是解决九次路线回潮问题，一个是解决十次路线没有解决完的问题，能不能归结到十一次路线斗争，可不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现在还很难说。"其中"九次路线"指的是刘少奇的问题，"十次路线"是指林彪的问题，而"十一次路线"则是隐指周恩来的问题。这在政治核心圈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江青在一九七三年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就已经点明了。

毛远新的上述言论道出了毛泽东在是否抛出周恩来的问题上踌躇未决的心态。毛深知周恩来是一个比刘少奇、林彪更难缠的对手，他在党内军中有众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而且为人处世一贯见风使舵，十分圆滑，让毛抓不到把柄。

于是，毛决定离开京城这块喧嚣之地，赴南方休养一段。这是毛在党内斗争中作出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当年发动文革，向刘少奇展开攻击前就是这样做的。

七月中旬，毛泽东在离京前夕专门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知道江青在贯彻他批林批孔的意图上锋芒太露，触犯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人，临行前必须设法调解一下这个矛盾。老于权谋的毛有意让江青为自己背这个黑锅。会上，毛在肯定批林批孔运动成绩的同时，不痛不痒地批评了江青，要她注意克服自己的毛病，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也不要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并且当众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谈话中，特意提到了九篇文章的事，称：文件我收回了，而且烧了，不要了。其实，这不过是毛在故意放风，迷人眼目，因为他得知有人把他修改九篇文章这件事悄悄告诉了周恩来。实际上，毛一直没有打消抛出九篇文章批周的念头，甚至一直到周恩来死后，毛本人已经重病缠身，无法直接阅读的情况下，他还叫人把九篇文章整个念给他听了一遍，并作了若干修改。

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活不了多久了。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平反的动作，把责任推给林彪，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所谓的"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改善自己形象的机会。

事实上，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中共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替罪羊。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摆脱了困境。

然而，当杨成武被整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杨，并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口号。

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画龙点睛的是 "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 当谈到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易死亡周恩来说， "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这是我的失职。杨易的事情

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背负就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周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周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准并修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就是在纪登奎的心目中也打了不少折扣。

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和林彪一起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仍然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合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是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但是，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了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摸不准毛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抱病主持了为中共建政二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周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 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中共党内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招待会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使他认识到，公开批周会激起强烈的反弹，导致天下大乱。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已经年老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暂时搁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 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 46 集－毛的"抬邓排周"的部署被破局(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6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王洪文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以及毛的"抬邓排周"的部署是怎样被破局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中共十一之后，毛泽东提出筹备召开拖延已久的第四届人大的建议。一生提倡斗争哲学的毛一反常态，发出"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在筹组四届人大时，明显把周恩来晾在一边，既没有让他过问有关人事安排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表态是否由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是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摆出准备在政治上重用邓的架势。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引发了中共党内高层内部激烈的争斗。江青本来就因反对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挨了毛的批，而对邓窝了一肚子火，这次见毛如此倚重邓，更是觉得难以咽下这口气。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冲突，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风庆轮事件"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大陆生产的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借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做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

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中共官员"崇洋媚外"，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所有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建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也将邓小平一军。因为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来也不会高兴，有可能趁势把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而邓小平觉得事情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 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 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围攻。邓小平终于和江青等人吵了起来。最后是李先念出来打圆场后，邓小平才离开了会场。

散会后，江青立刻在钓鱼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果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的不满和戒心，把邓和周放在一起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争吵后，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却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由于毛已决定在批周的问题上暂时偃旗息鼓，结果御状没有告成。毛泽东并非不想把大权交给党内文革派，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此创造条件，只是因为江青太不会搞权术，又不懂经济，不会管理政府机构，实在有点扶不起来。如果真的把权交给他们，非天下大乱不可。对于江青这样折腾，毛有些恼火，因为这不仅打乱了

他对今后权力格局的部署，而且还会使他为政局营造安定团结气氛的打算落空。在毛看来，周恩来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人，不打自倒，不必干脱裤子放屁的蠢事了。

为此，毛泽东决定表面上抬举邓小平而压制江青，并让周恩来介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监管王洪文。而毛本人利用这种两派对峙、互相牵制的局面，在幕后进行操柞。毛在听完王洪文的汇报后，当面教训了他一顿，要他跟邓小平搞好团结，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有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

两天后，毛泽东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做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所谓的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

这样一来，周恩来又再度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中心人物而忙碌起来。实际上，他在医院中确实如江青所说，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静下心来养病。当政治局会议为"风庆轮"事件发生争吵后，他即分别找各方谈话，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鉴于江青是有备而来，闹到毛泽东那里已势所难免，而毛的态度则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决定利用自己相对超脱的地位，暗中助邓一臂之力，用"哀兵"之道打赢这场官司。

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在底下做了工作。他一方面向邓小平打了招呼，叮嘱他在陪毛泽东见外宾时不要为此事干扰毛，回来后慢慢解决；另一方面，他把"通天"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医院，向她们介绍整个事情的经过，着意替邓讲话，拜托她们向毛传话，周说：经他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了解，邓并非像江青宣传的那样扬长而去，而是李先念把他劝止的。邓走后，张春桥说，他早就知道邓要站出来。江青也说她是有意问邓，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看来他们都事先准备好了要整邓，邓小平已经忍耐很久了。

毛泽东指定周恩来主持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使得周有了某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随即连日在医院里约集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找人谈话，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各项安排大体落实后，周恩来又连夜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工作的进展情况。

这是周恩来自六月份住院动手术后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从信中的字迹和内容可以看出，他为了写这封信是用了不少心思。周恩来显然是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把他推出来主持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不过是因为一时在政治上摆不平的权宜之计，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对他的疑虑。为此，他在信中颇用了一番心思来表白自己，从信的一开始，周就主动对毛本来是敲打江青不要搞"上海帮"的话表示要引

以为戒，到有意识地强调人事安排名单中"关键在于中青年干部"，乃至信的末尾刻意表示"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的那段话，无一不是出于这样一番用心。

此外，周恩来在信中对邓小平和江青两人在总参谋长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周也尽量不偏不倚，在表态支持毛泽东提议的同时，又照顾江青的面子，为杨成武说了话，指出这是"为党培养一个得力干部。如打起仗来，第一副总理与总参谋长还不是一回事，在主席领导下配合工作。"

周恩来这种姿态，相形之下，让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显得更加咄咄逼人，不知收敛。这令毛泽东感到既难堪又恼火。毛需要江青在政治上充当他的打手，但十分恼火她把需要刻意笼络，用来制衡周恩来的邓小平得罪了，而让周从中做了好人。这使得毛精心安排的"抬邓排周"的部署破了局。

第 47 集－中共四届人大前后的周恩来

各位听众你们好，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7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报告中共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以及毛怎样对待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毛泽东的敲打，迫使江青不得不有所收敛，从而帮助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排除了一大障碍。尽管如 此，周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他太了解毛和江青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他在主持其事时尽量在表面上做到不偏不倚。比如，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时，周恩来认为老干部的名额太少。不过为了避嫌，他并没有单独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有意把它和其他类需要增补的代表名额一并提出，其中包括"红卫兵"(即造反派)代表。周恩来对其他如建议增补的代表名额都提出了具体数字，唯独对老干部的增选名额不提出具体数字，建议由政治局"考虑斟酌后加以决定"。

中共官方的出版物在述及这件事情时，担心损及周恩来的形象，有意回避了他在提出增加四届人大代表中老干部名额的同时，也提出增加红卫兵代表名额这一点。在酝酿拟定人大和国务院机构的人选名单时，周恩来更是煞费苦心。鉴于江青一边对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部长人选争得很厉害，周恩来在和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等人商量后，决定不让教育部，而文化部和体委则可作些让步，由他们去搞。十二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经由周恩来审阅后基本上定稿，人事安排问题也在党内各方争斗后搞出来三种方案，供毛泽东拍案定夺。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周恩来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发展，大便里出现潜血。这让医疗组的医生们十分着急，建议马上进行检查治疗。

这样一来，使得原定准备周恩来和王洪文一道向毛当面报告四届人大筹备情况的长沙之行成了问题。为此，叶剑英十分着急，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如果不能成行，会给江青他们可乘之机，整个安排就可能生变。素来关心周氏病情的叶剑英在和

党内其他元老商量后，也不顾周恩来的病情，对医疗组表示：暂时不能提及周恩来大便里出现潜血，以确保长沙之行。

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护送下，乘专机飞赴长沙。周恩来已经看出毛泽东这次钦点邓小平、张春桥二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第一、第二副总理的用心所在，是有意在中共党内权力格局中制造一种让邓、张二人互相牵制的局面。尽管一心想当"理论权威"的张本人并不大愿意做国务院的事务性工作，周明白毛这种对邓既重用又暗中防范的两手，说到底还是在政治上对邓不大放心，怕他翻文革的案。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深知最犯忌的，莫过于让毛泽东怀疑他和邓小平在政治上联手了。因此，周在向毛汇报人事安排的设想时，对涉及到邓的职务安排极为小心，要让毛去作最后决定，也决不往高里说，让毛起疑。比如，在邓小平党内职务的调整上，周恩来就颇用了一番心思。毛泽东在提议邓担任第一副总理时，并未明确他在党内的职务。由于邓当时还只是政治局委员，而张春桥已是政治局常委，所以邓的党内职务至少也应该是中央常委或者更高。周恩来在汇报时以"请示"的口吻向毛泽东建议："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这里 周把常委放在先，副主席在后。既提出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

周恩来对邓小平暗中相助的同时，却对张春桥使出了杀手。将他在历史上有严重问题一事向毛泽东当面奏了一本。实际上，早在文革之初，周就从陈伯达那里对张有历史问题有所耳闻，但由于江青一直扣压张春桥的档案而未得其详。批林批孔运动中，自庐山会议后一病不起的康生突然坐着担架到周恩来那里专门谈这个问题，表示对张的历史问题"很不放心"，要他向毛报告。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贸然行事，因为他早就知道毛泽东不想追查张春桥历史问题的态度，所以按兵不动，把这件事压了下来，直到这次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才又把它端了出来，以此来反制江青推张春桥出来当总理的图谋。

周恩来这样做，是因为他非常清楚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能量和行情，张不仅是"四人帮"中摇羽毛扇的人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认为是懂得他思想真传的人，甚至有意让他接班，林彪就为此栽在他的身上。因此如果不趁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之际，把张的老底揭出来，就会坐失良机。即使毛仍然不愿处理这个问题，继续庇护张春桥，至少也能起到阻止他更上一层楼的作用。

不过，周恩来深知此事十分敏感，弄不好反而会惹起毛泽东的疑心和反感。因此，他并不急于自己出面，而是先让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报告这件事，然后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毛的单独谈话中才提出这个问题，并还把康生抬出来。而且周只是"点到即止，并没有多讲。"

对毛泽东来说，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他早就从江青那里知道这个情况，但却不想深究。这种态度和他当年大整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判若两人。不过也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在毛的眼里，所谓"历史问题"可大可小，一切以政治上的需要为转移，张春桥正是毛手中用来对付党内外翻案势力的一员大将，眼下

正是用得着的时候，又怎么会临阵斩将呢？所以毛并没有理睬周的报告，相反还把举报此事的康生数落了一顿，说：他历来极左，在延安时期就这样。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还有意抬举张春桥，以保持和邓小平之间的平衡。他在称许邓"人才难得"的同时，也对张春桥表示赞赏，说他"有才干"，并亲自提议张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一职。用这种"掺沙子"的办法，暗中对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的军委预作防范。可见历史问题在中共只是党内斗争的工具。同样腐败问题在目前也成为了中共新一轮党内斗争的工具。

对于江青，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要"一分为二" ，既对她在政治局内部热衷搞"四人帮"小宗派和插手组阁的作法进行了批评，同时又肯定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不过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对周恩来本人，毛泽东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做出评论，而是借用邓小平的话说他"办事细。"，在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后，毛又劝周"安心养病"，不要老闷在医院里面，经常出来走走，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对毛泽东这番话的用意，周恩来心知肚明。所谓"办事细"，其实是反话正说，含着敲打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毛病。对此，周马上就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又在最后一次主持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会议上当众检讨自己，说：细，固然。细，抓小不抓大，有时候就要因小失大。现在我病了，小的抓不起来了，大的也抓不起来了，但还可以想一想。病有好处呢，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吧!"

总之，周恩来的长沙之行在政治上大有斩获，争取毛泽东批准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对张春桥的状虽未告准，但是原来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却在毛面前明显失宠，被责令写检查。表面上，毛对周的态度有显着的改善。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周恩来在长沙期间的心情格外的好，甚至在闲暇之余还有兴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的生日那天，周还自己掏钱请了两桌客，为毛祝寿。

一九七五年元旦过后，刚从长沙返京的周恩来又主持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原来并没有准备召开这次全会，完全是为了给邓小平重返权力中枢补办组织上的手续，才临时决定召开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开幕。周恩来抱病出席了大会，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而进行了一年多的评法批儒斗争戛然而止，被指为"党内大儒"的周恩来逃过了一劫，不过周的身体却完全垮了，他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第 48 集－毛对邓小平疑心大起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8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在批"经验主义" 问题上的内斗，以及毛是怎样对邓小平疑心

大起的。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四届人大开过以后，周恩来非常知趣地按照毛泽东的意思，继续留在医院里，让邓小平放手工作。而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思、列宁书本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叙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

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毛泽东要求全国学习马列理论的真正目的，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有怨言，认为这将使批林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当。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内斗中败阵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大批“经验主义”。

三月一日，在所谓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的时候，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威"身份，大批"经验主义" ，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中共全军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张春桥在讲话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讲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扫除" 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深得毛思想的真传。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张春桥和江青拒不向中共新的当权派低头。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当权派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张春桥虽然对共产党认识不清，但对中共的法院和新闻报导制度还是很清楚的，张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对照今日，中国大陆的亿万富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

中共高干及其亲属，中共当政者还真是不仅有权而且有钱。而席卷中国大陆的退党大潮正表示了中国人民对中共这个钱权结合的利益集团的唾弃。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 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留苏派王明教条统治的帮凶。

江青一干人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内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

江青等人还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毛眼下还要利用邓挟制周恩来，而毛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也可以砸向邓小平搞整顿所依靠的中共党内军中老人，这样一来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然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一伙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邓小平本人在内的中共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人。

另一个原因是邓小平知道毛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医生们根据毛的病状，推断毛只能活两年。又考虑到江青等人在军队里没有基础，毛死后，文革派一定是树倒猢狲散，于是邓在政治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

不过，邓小平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邓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不同意这样搞法。

毛很清楚江青批"经验主义"的用意，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

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人，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有所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面进行了干预，制止江青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走入幕后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 还攻击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十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攻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江青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检讨。会后，江青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 0 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另外，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出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周恩来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邓小平在复出前曾保证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恩来、邓小平二人靠得很紧，这不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第 49 集－请神容易送神难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49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怎样开始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邓和叶如果只批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就引起毛的警觉，因为邓若是真的倒向周一边的话，非但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的反文革势力将如虎添翼。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他一开始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共产国际扶植王明统治中共的那段历史，在批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如下：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江青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带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周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批"经验主义"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

周恩来并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乐观，反到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周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知道，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中共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机会大闹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人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小平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的问题，对中共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了不被抓辫子，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由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老家伙，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

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给邓表演的机会。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中共党内兵家的必争之地。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判，甚至拍了桌子。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注意掌握分寸，主要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

在邓小平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有人敢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是叶剑英出来呼应邓小平，对江青的批评，说"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王洪文在会上作了一个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江青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曾加负担。"

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毛开始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毛泽东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则表示自己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周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个姿态，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讨，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张，随便乱讲话……"。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进行了规劝。周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团结她一道工作等等。

第 50 集一毛评《水浒》一箭双雕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50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毛泽东以评《水浒》为名，批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个投降派，以及周为邓小平接班进行造势。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当毛泽东看准邓小平确有反骨，想翻文革的案后，就下决心批邓。选择的题目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把邓和周放在一块打。

目前大陆官方的论着多把一九七五年中国政局逆转的起因，归咎于这年十月前后毛远新向毛泽东的"挑拨性汇报"，并竭力淡化毛本人评《水浒》谈话的政治含意，把它说成是"四人帮"的"借题发挥"，以开脱毛的责任。这完全是倒果为因，过分抬举了江青一干人。

实际上，毛泽东才是整个事情真正的主谋，不仅评《水浒》运动是其精心策划、一手导演的，而且就连毛远新接任他的联络员也是整个部署的一部分，是他觉察出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往周恩来、邓小平那边靠得太近而采取的掉换措施，就像当年文革发动前夕启用汪东兴接替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样。

自从邓小平在各行各业大张旗鼓地推行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在冷眼旁观。当时，毛之所以没有马上出面干预，是因为眼下正需要借助邓来整治文革后的乱局，重建统治秩序，正如当年大跃进栽跟头后，不得不容忍刘少奇出来收拾残局一样。不过，毛心里非常清楚，邓小平这次又旧病复发，搞起"白猫、黑猫"那套实用主义来。虽说是打着"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却与文革的主旨格格不入，只能是一时的权宜

之计，长此以往的话，势必否定文革，动摇根本。这是毛不能听任不管的。

随着整顿的全面展开，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疑心越来越大。七月间，邓建议公开发表毛在五十年代写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毛一眼便看出这是邓企图打着他的旗号，为搞"白猫，黑猫"的那一套造舆论，所以并没有同意，让邓碰了一个软钉子。

其实，毛泽东对邓小平搞"全面整顿"有所保留的态度，当时在中共党内高层中，像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都已经觉察出来，曾婉言相劝，但邓本人却自恃有毛的支持，根本听不进去。 后来批邓的起因，固然是因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清华大学刘冰等人告迟群、谢静宜的信而起，但这只不过是个导火索。

例如，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应该解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认为把登"反共启事"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们是不公道的。然而，挖出这个"叛徒集团"正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 。又如，邓小平曾利用陪同外宾参观访问上海的机会，有意识地对当时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马天水做工作，向他透露了毛泽东近来对江青的批评，并点了张春桥的名，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企图挖"四人帮"大本营的墙角。结果邓却弄巧成拙，反而被马天水出卖，将谈话内容密报王洪文。正在多方收集材料准备反扑的江青立刻让王洪文把这次谈话整成材料，用特大字抄写，报送给毛泽东，并加了批语，指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这些动作，无疑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认定邓确有反骨，所谓"永不翻案"靠不住。其后一向善于揣摩上意的康生也以重病之身出来向毛进言，指邓"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度遭到冷落的江青更是趁机频频求见毛，告邓四处造她谣的状。她对奉命代见的张玉凤大倒苦水，除了骂邓外，还对毛动之以情。此后毛不但不再提和江"分道扬镳"，而且还出来袒护江青。

到了八月中旬，毛泽东批邓的决心已定，但选择什么题目来做文章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近两年来他本人曾说过邓小平太多的好话，言犹在耳，因此需要在政治上有一个造舆论，转弯子的过程。惯于借古讽今的毛很快便找到灵感，决定从评《水浒》的题目下手。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夜读中向陪读的人发表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要点是：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中共官方对毛泽东评《水浒》的真实意图避而不谈，把它说成是随意而发，只是对古典文学的一般性评论，在政治上并无所指。这里姑且不论毛素以 "古为今用"的专家自诩，称赞或否定历史上的人物，在现实政治中必有所指，更何况连毛本人都不否认这一点。

据王海容、唐闻生说，他们曾当面问过毛泽东评《水浒》有什么深意?毛当时只是笑，不作正面回答，说是看鲁迅看的。毛之所以故作这种莫测高深状，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因为当时他对王、唐二人已经存有戒心，不愿挑明罢了。

其实，只消从整个事情的运作过程中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名堂。在毛泽东深更半夜发表评《水浒》的谈话后，姚文元闻风而动的速度异乎寻常，显然是有人打了招呼，几个小时以后就写出了报告，称毛泽东对《水浒》所作的评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建议印发下去，组织展开对《水浒》一书的评论。而毛马上就批准了他的报告，在两三天内就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整个过程显然是台前幕后串通一气，绝不是什么"无心插柳" ，而分明是"有意栽花"。

毛泽东评《水浒》、批"投降派"并不是仅仅针邓小平一人，而是一箭双雕，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放在一块打。毛不能容忍邓的地方不仅在于认为邓有反骨，企图否定文革，而且恼火他在复出后同周恩来合流，在政治上抱成一团。所谓"宋江投降"、"让人招安了"就是指的邓这一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因为在毛看来，邓小平不过是党内外复辟翻案势力在前台的急先锋，而周才是幕后真正的主帅。所谓"投降派 "便是针对周恩来施放的冷箭--既影射了周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这件事，又隐指他在外交上搞"右倾投降主义"。实际上，早在一九七三年底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曾当众评过《水浒》，对周旁敲侧击，用宋江接受招安来影射对美外交"右倾投降"。这次不过是又故伎重施罢了。

毛泽东评《水浒》的举动，使周恩来心情沉重，无法静下心来接受治疗。他知道此举来者不善，局势即将大变，于是在毛谈话的第二天，便与邓小平单独长谈。随后又找王海容、唐闻生摸底，并让身边工作人员找出《水浒》一书的各种版本、《鲁迅全集》中《评金圣叹》的文章以及内参中反映各地学习情况的材料送阅，揣摩毛的意图，了解各方动向。

周恩来对他已经病成这样，毛泽东还不肯放过他，备感寒心。他对前来探视的蔡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说："我周恩来决不是投降派！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工作的!

周恩来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觊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

于是，周恩来在病床上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举荐邓小平。并让邓颖超向邓小平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留中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速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出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征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罢休的，今后是凶多吉少了

第 51 集－戏尽人生的周恩来

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 51 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一面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一面在临死前还唠叨“东方红”歌词的第二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毛泽东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跟共产国际王明跑的老账是打不倒周的，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顶多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毛泽东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周。文革初期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共高层也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

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象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扩散得更快。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并没有点名。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对号入座。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 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天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和恐惧交织，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已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共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据

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

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还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时的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枯槁，整个人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人的身形。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